

中华梳篦六千年

杨晶著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出版

美从头上起步

上下数千年梳篦自身的演变轨迹

纵横数万里不同人群的审美情趣

举世独步的风貌 丰富多彩的内容

探索美的历程

ISBN 7-80047-613-8

9 787800 476136 >

定价：6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梳篦六千年／杨晶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12
（紫禁书系／李文儒主编）
ISBN 7-80047-613-8

Ⅰ．中… Ⅱ．杨… Ⅲ．古代生活用具－研究－中国 Ⅳ．K8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287 号

中华梳篦六千年

著　　者：杨　晶
图片提供：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等
责任编辑：徐小燕
装帧设计：李　猛
出版发行：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117378　010-85117596　传真：010-65263565
邮箱：ggzjc@vip.sohu.com
印　　刷：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4.5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00 册
书　　号：ISBN 7-80047-613-8/J · 284
定　　价：68.00 元

中华梳篦六千年

杨晶 著

紫禁城出版社

目录



序 ..... 张忠培 004

美从头上起步 009

扑朔迷离的名称 015

历代典籍的定名 016　出土文献的称谓 017　本文拟定的名称 022

形形色色的种类 029

古朴端庄的骨牙角类 030　轻巧秀雅的木竹类 050　温润光泽的玉石类 072
灼灼生辉的金属类 082

各式各样的造型 093

引领风骚的长方形 094　绵延不绝的扁方形 097　独树一帜的鱼尾形 103
别具一格的六边形 108　流光异彩的亚字形 110　蔚为大观的马蹄形 113
洋洋洒洒的箕形 120　欣欣向荣的半圆形 123　后起之秀的弓形 127
气象万千的联背形 130

多姿多彩的装饰 135

细致入微的琢刻 136　神工鬼斧的镂雕 144　妙笔生花的彩绘 149
巧夺天工的模压 154　匠心独运的镶嵌 159　五光十色的盛具 161

纷至沓来的用途 181

以栉为冠 182　以栉为饰 189　以栉为具 197　以栉为喻 206

源远流长的历程 211

浑朴的时代 212　斑斓的时代 215　大同的时代 217　奢华的时代 219
敦厚的时代 221

探寻美的尝试 225

主要参考文献 229

序

张忠培

据考古发现得知，中国人迟至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梳子。篦子的出现较晚一些，但至迟在距今2500年前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了。同时，由梳篦引申出来的词句，早已见诸古代文人的笔下，如“栉风沐雨”、“鳞次栉比”等等。可见，使用梳篦的历史源远流长，梳篦自身及其引申出来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一文化认识却长期处于感触的自发阶段。直到本世纪开始的时候，杨晶献出了她的《中华梳篦六千年》，才开始迈出了这一混沌的认知阶段，使人们能够比较清晰地见到梳篦及其体现的文化在6000年间的流变。

自己知才能让他人知。杨晶对于梳篦自身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的认知，也经历了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在考古发现中，梳子屡见不鲜。人们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往往停留在现代人对梳子认知的水平上，关于梳子的文化谱系及其与社会结构演变的关系，不仅缺乏认识，也无探讨的兴趣与动力。浙江海盐良渚文化M30中一件玉背梳子的发现，触发了杨晶的灵感，使她面对早已注视并心存疑惑的被学界普遍称为“冠状饰”、“垂幛形饰”的玉饰件，豁然开朗，认为这些玉饰件当是复合式梳子的玉质梳背饰。这样的感悟，是一般考古学者都能做到的，但杨晶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此为切入点，全面地检讨了良渚文化的墓葬，从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一是玉质梳背饰都位于墓主人的头部；二是这些玉质梳背饰仅见于当时显贵人物的墓葬中；三是玉质梳背饰的造型与良渚文化神面纹头上所戴的冠状饰物相似。她根据这些现象认为，当时流行“插梳以饰”的俗尚，而这种“插梳以饰”的玉背梳子是良渚文化贵族的标志物。杨晶又以这一认识为立脚点，全面梳理了考古文献中所载的史前时期的梳子，写成了《史前时期的梳子》一文。这是中国史前考

古学中首篇关于梳子的研究论著，并已有了系统的论述。

杨晶并未满足于史前时期梳子的研究。在完成《史前时期的梳子》之后的两年，她翻阅了大量的考古文献及其相关的资料，契而不舍地寻找、搜集夏代至清朝年间的梳篦材料，并予以系统地整理。在形成了框架较为系统的认识后，又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这本《中华梳篦六千年》的专著。2006 年 2 月，杨晶将已基本成型的这一著作送来审阅，并请我提出修改意见以及为之写序的时候，她仍沉醉于如何完善这本书的思考之中，以至于未露出成功时一般人常常洋溢出来的喜悦。我读了这一基本成型的著作时，随手划出应予以注意的地方，并写了修改的意见，但随着这一著作的阅读，激情愈益高涨，读完之后，仍不能止。迅即于 2 月 18 日给杨晶写了一封信，说这是一个专题的首创研究，基本上实现了深入浅出的目的，同时还指出了修改时应注意的要点（见附信函）。我所以要给杨晶写这封信，与其说是要告诉她我对这一著作的意见，倒不如说是急欲遏止自己读这本著作所产生的激情。

我当然要给这本书写序。这不仅因为杨晶是长期跟随我的学生。除了在《北方文物》工作的几年外，她自 1978 年进入吉林大学之后至今，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们之间已有近 30 年的交谊。尤其是她做了我的助手之后，她处事的态度愈发坦诚而直白了。我喜欢她的这种坦诚与直白。我所以要给这本书写序，也不只是如上所说，而是她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从中发现了课题，完成了《史前时期的梳子》，进而又追寻材料，嗅出来材料的芬香，找出了材料呈现的内在联系，即时、空、人、物之间的内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关系，产生了见识，写出了这本著作。我当然喜欢这样的治学方式。我之所以要写这个序，还因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某些文物及其相关的知识已成为市场经济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之际，既懂得瓷器又熟谙玉器的杨晶，虽然具备了投入市场经济的资本，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仍保持了学者的纯洁和文人的品格，以淡泊、宁静的态度，执着地追求学术的真谛。这不是快乐吗？这不是享受吗？关于快乐与享受，人们自有不同的说法，但我的体会是，学者的快乐和享受是那些迷恋于金钱与权势的人所永远感受不到的。我认为，不因金钱、权位所动而宁静、执着地追求真理的人愈多，这种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有希望的社会。

《中华梳篦六千年》是一本专著。这本专著从不易被人们关注的小小的梳篦入手，由梳篦的质地、形态的演变及其与人、时、空的关系中，爬梳出长达6000千年中国文化的谱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见微思著，从而成为一部以梳篦论史，透梳篦见人，代梳篦说话，将梳篦说活的专史。此外，还需指出的有如下几点：其一，梳篦，尤其是梳子，至今仍是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故这本著作的主题，贴近生活，贴近大众；其二，这本著作不仅考察了梳篦的历史，更阐述了梳篦所反映的美的流变，可以这样认为，读者阅览这本著作的同时，随之也将享受着梳篦所表述的美的历程；其三，《中华梳篦六千年》虽是以考古学的层位学与类型学的方法研究梳篦发展历程的专著，但为了使一般的读者能够读懂乃至对其产生兴趣，作者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总是从大众的角度，尤其是从考古学外行者的角度考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反复审视，修改行文，尽量避免使用生硬的专业术语。例如，这本著作摒弃了考古著作中常见的将研究资料划分类、型、式的传统作法，而努力使用既保持分型、分式的科学涵义又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来展开这本书的写作。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相当成功，导致出创新的效果，使《中华梳篦六千年》成了深入浅出的专著。

在关于科学、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一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被“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种方针所统治。这是一个就低不就高的方针，由于它倡导的提高受普及所制约，故不能推进、提升科学与文化的水平，同时也由于它在低层面上进行普及，故更不能因普及而提高大众的文化与科学的素质。近年来，我力举摒弃这一方针，主张在提高的前提下进行普及，或可谓之深入浅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提高的普及中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科学的素质。同时，有了这样的普及，才能创造出提高文化与科学水平的整体环境。杨晶的这本著作，实践了我的这一追求。我相信《中华梳篦六千年》这本深入浅出的考古学专著，将会在提高人民群众审美情趣、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以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的企盼！

2006年7月5日于小石桥

附信函：

杨晶：

就已写成的现在的情形来看，毕业的优点是多导的，也存在不足。

优点是：1.已跳出了一般考古论著之"待资料"划分年代、分型、分式的套式，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在这形式下，既包含了原有的内容，又包含史学与美学的基本要求，可说是在"史"与"美"上下了功夫。2.在保持科学性的前提下，注意了可读性、欣赏性，如何对待普及与提高，由来有争论。我都一直主张：在提高的前提下，进行普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民族的素质。但这样就要深入浅出。这是一个难题的首创研究，如何在实现深入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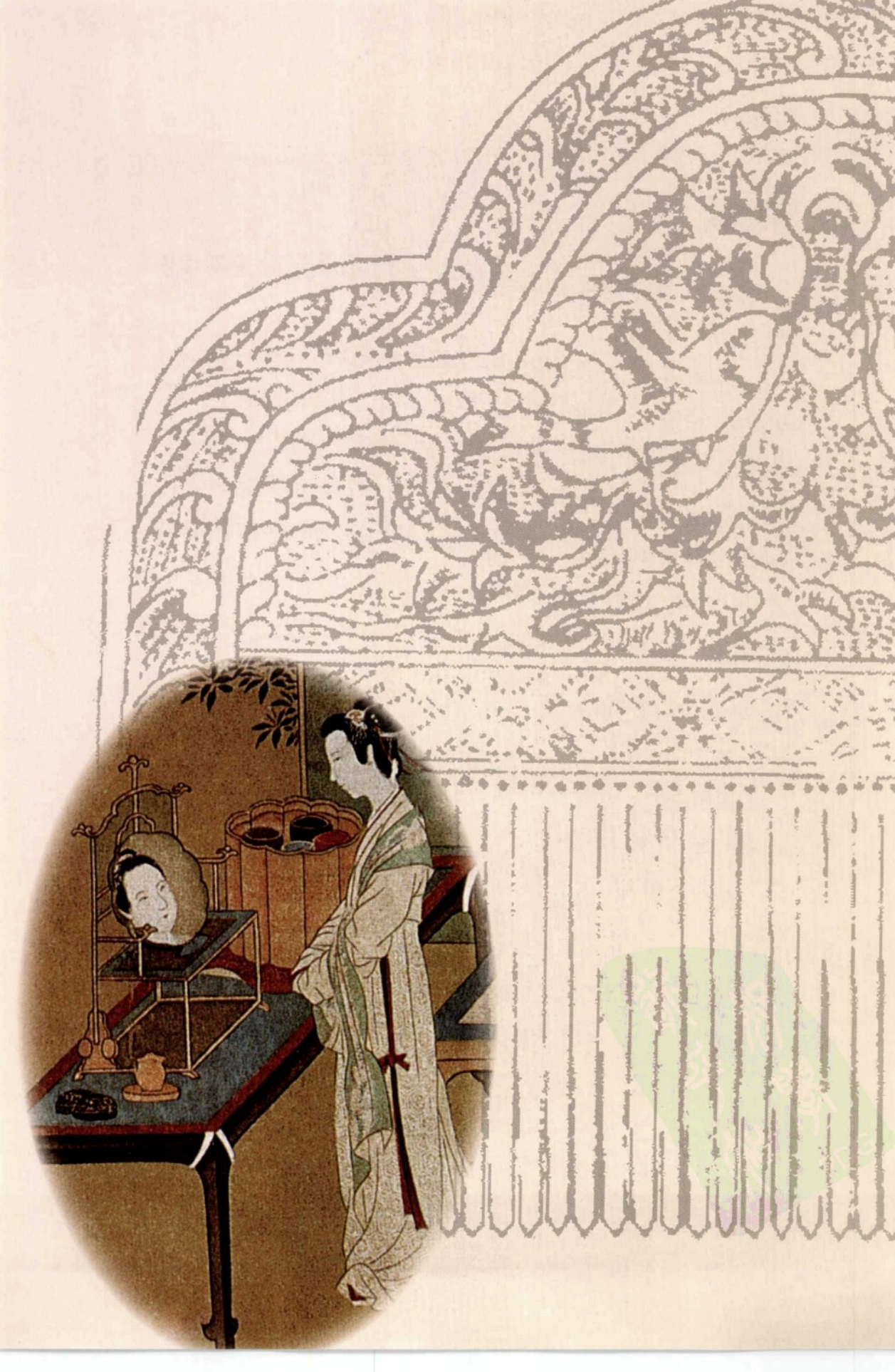
缺点是：在疏理材料的行之有效、论点表述与论证，还有待深入。

我的希望：这是一部简史，又是关于服饰的美的历程。生活史、服饰史社会史如何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更充实地表现出来，让人们更得益。这是一，其次，一定要认真地把好排图与图版。

你先看一下我在原稿中动的笔墨，以后我们再细谈一次。

张志忠。6-2-18

2005年





美从头上起步

《孝经 · 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据说上古贤帝舜曾制定"五刑"，其中最厉害的为"大辟"，就是砍去头颅。如果失去头颅，生命将不复存在，因而这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刑法。当然，不仅是头颅，就连头发一般也不肯轻易剪掉，只有罪人才被人剔去一部分头发，作为刑罚。这样一来，保护和装饰这颗六阳魁首就成了古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们头上的衣着饰物，通常被称作首服。首服用于装饰人类自身，最直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美感和自己的快感。古人十分重视首服，因为它不仅可以美化自身，也可以作为一种身份等级的标识。提及古人的身份等级，令人最先想到的应当是冠。冠是有身份的人共用的首服，小孩成年时即须行冠礼。举行冠礼是古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所以《仪礼》的第一篇就是《士冠礼》。关于举行冠礼的目的，《礼记 · 冠义》云："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仪礼 · 士冠礼》阐述："弃尔幼志，顺尔成德。"《说苑 · 修文篇》进一步说明："冠者，所以别成人也。"对于行冠礼的人而言，表示他已经告别童年，正式跨入成年人的行列，从此这个孩子就是有名字的成年人，并开始肩负起成人的责任，而社会也须按照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使他的言行举止合乎于礼仪规范。正是由于这种俗尚，当时贵族社会中把是否戴冠视为"礼"与"非礼"的界限。

甲骨文中有"  "这样的字形，其形状颇似一把梳子。陈邦怀先生在《殷代社会史料征存》一书中，将此字释为"冕"字的象形。冕，通冠。依刘熙《释名 · 释首饰》的解释："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白虎通 · 衣裳篇》谓："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发者也。"据《仪礼 · 士冠礼》胡培翚正义引《开元礼义鉴》称："古者以先韬发而后冠帻卷梁。"可知最初的冠，应是用来固定头发的。据此，笔者曾在《史前时期的梳子》一文中提出，史前时期大多数插在头上的梳子当系冠饰的一种，而等级社会中的冠冕制度，实乃缘于头冠之饰[1]。

考古发现的资料表明，人们最早是用笄来固定头发的。在浙江余姚河姆渡

[1] 杨晶：《史前时期的梳子》，《考古与文物》2002 年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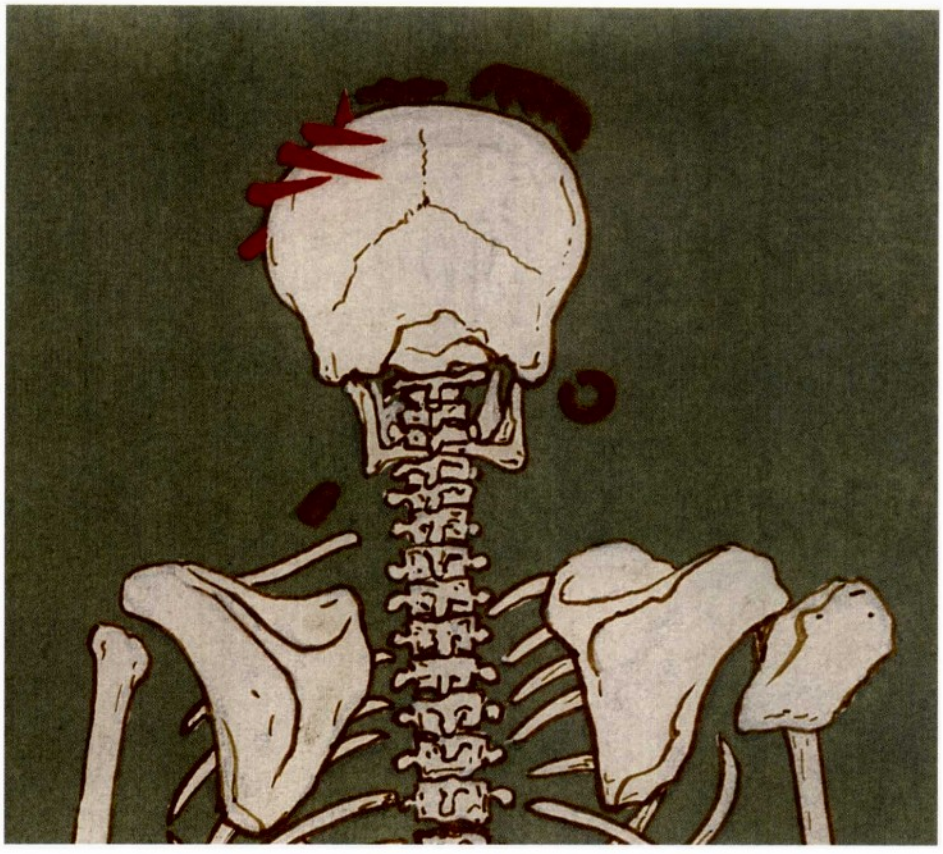
[图1] 骨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堆积中，曾经发现了多件骨笄〔图 1〕，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年代，大体在距今 7000 年左右[1]。在江苏常州圩墩墓地 M11 中，出土了五件骨笄，这些骨笄均置于死者的头部〔图 2〕，这座墓葬属于马家浜文化的遗存，其年代大约在距今 6000 年以前[2]。史前时期的骨笄，大都呈扁长体，用动物的肢骨磨成，一端平齐，另一端为钝尖，以便于插在头发上。史前时期人们头上的美，已从这些用兽骨琢磨出来的骨笄中起步前进了。

与此同时，在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和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还出现了用动物肢骨、牙齿制作的梳子。这些年代较早的梳子，均呈竖式长方形，一般只有 4 ～ 5 枚粗齿，梳齿较长，齿缝较稀，其稀疏的长齿很像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2〉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 年 2 期。



[图2] 骨笄出土状况—江苏常州圩墩M11

是将几支骨牙笄组合在一起，这种造型特征显然便于束发，而不利于梳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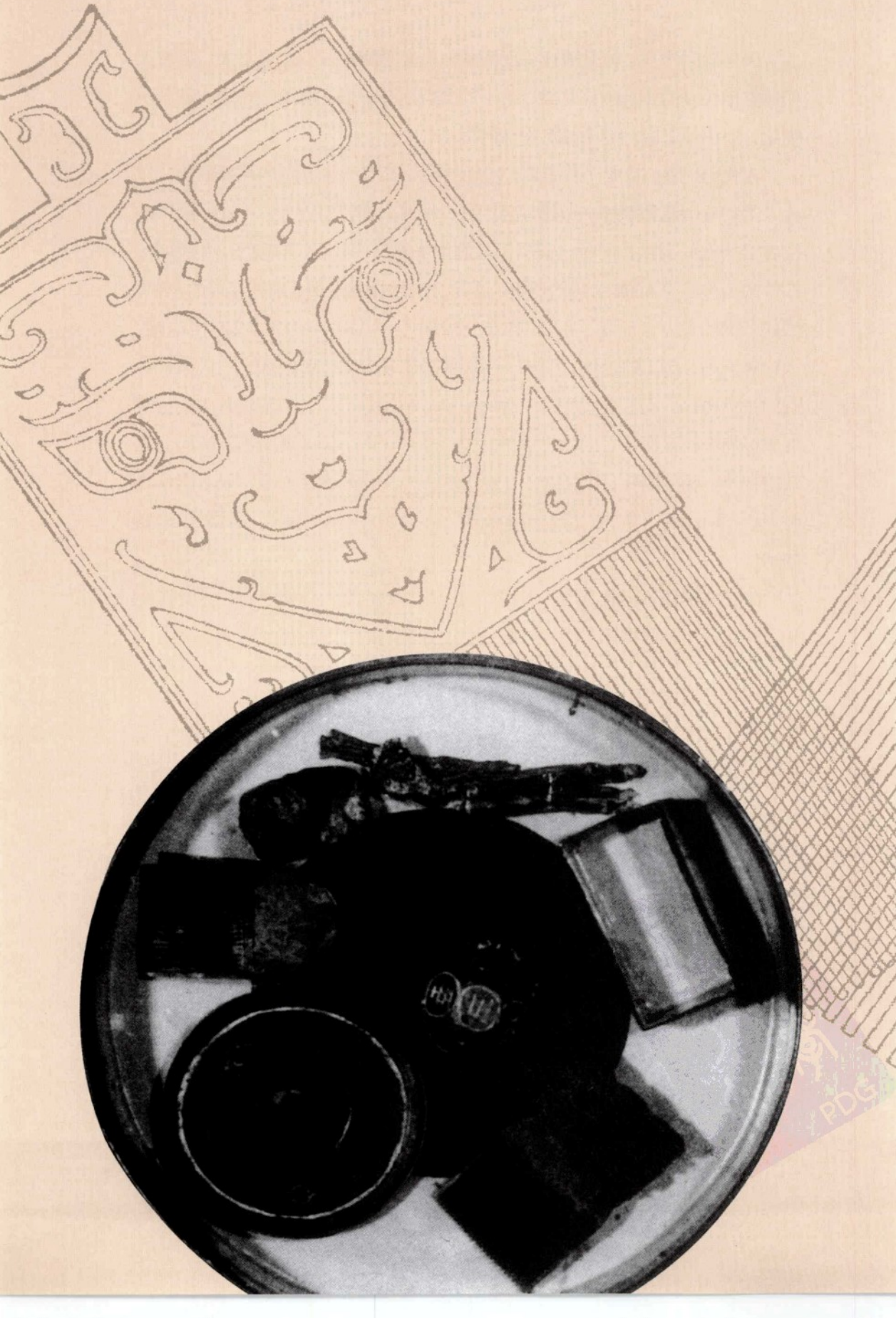
关于梳子的起源，王仁湘先生在《中国古代梳篦发展简说》一文中指出："梳子起源的时代至少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如果说在此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了的话，那目的只在为了不让散乱的头发妨碍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时的'梳子'应当就是人的五指。……最初的梳子就是仿照人手做出来的。"[1] 史前时期墓葬出土的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放置在人骨的头部附近，而这些梳子往往只有稀疏的粗齿，其形制大都不利于梳发，因此笔者认为，史前时期的梳子，固然拥有梳理头发的功能，但更为重要的功能应当是以固定头发为初衷的，从造型上来讲，最初的梳子很可能是源于笄的。由于梳子被长期广泛地使用，虽然其固定头发的功能在一个较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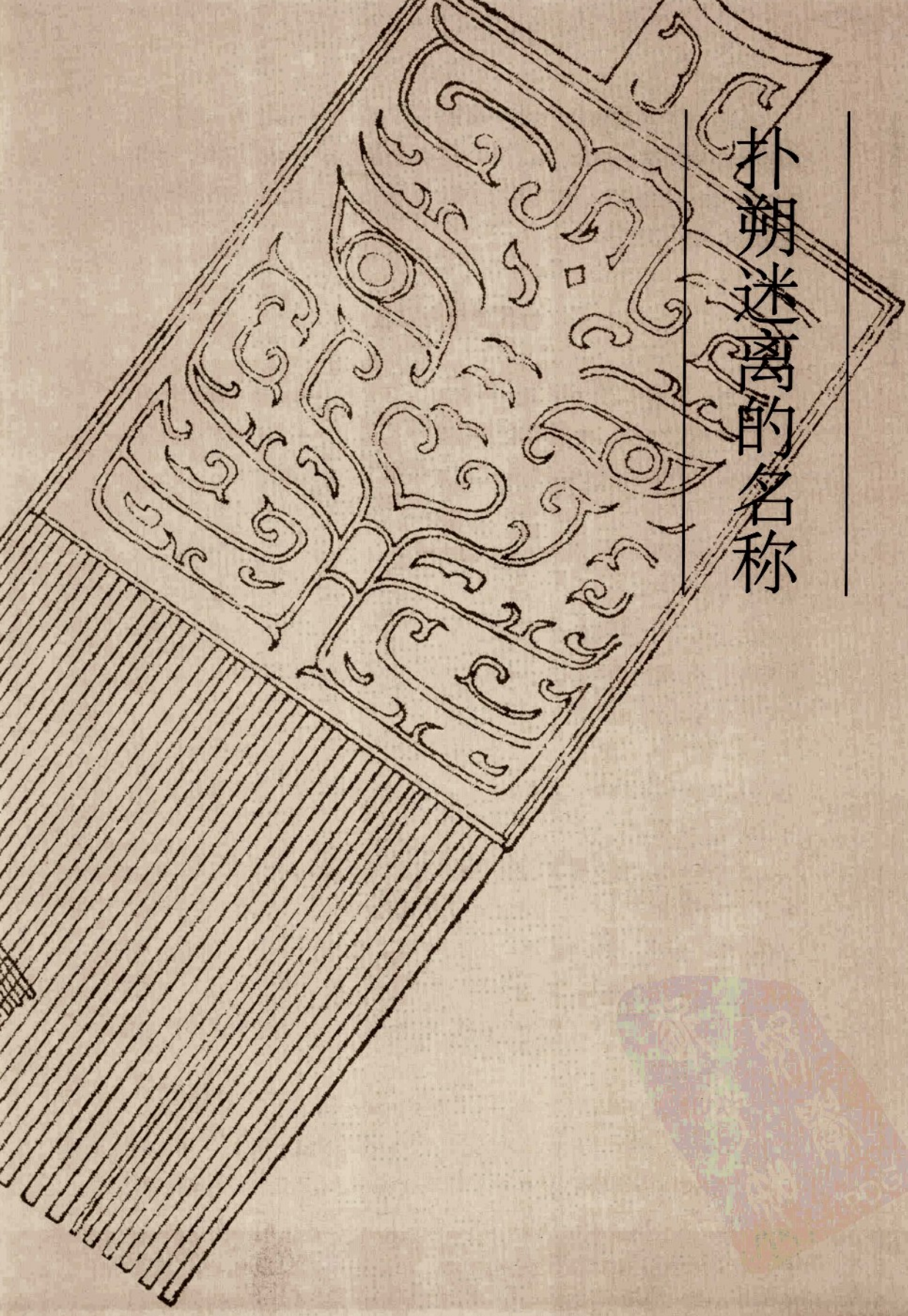
[1] 王仁湘：《中国古代梳篦发展简说》，《湖南考古辑刊》(4)，1987年。

的阶段里始终存在，但是梳理头发等其他方面功能也日益显现出来。随着人们对整理头发的要求越来越高，梳子的齿数逐渐增加，梳子的功能亦进一步细化，还出现了专门用于除垢保洁的篦子。

古代的梳篦，既是一种重要的首服饰物，又是一种必备的梳理用具。作为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综合产物，梳篦以独特的方式，不仅记录了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人们审美理念的变化。自梳子问世以来，在中国至少已有 6000 余年的历史。由于分布地域的辽阔，地理环境的差别，气候条件的多变，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由于文化的滥觞，人口的流动，历史的延伸，促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这些因素对我国古代梳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一件件看似简单的梳篦，它们的传承和衍变，却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变化、风俗变迁，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水准，显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精神面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除了文献典籍记载之外，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大量古梳篦遗物，以及社会和民间保留下来的梳篦实物，本来就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梳篦文化史。





扑朔迷离的名称

梳篦在历代典籍和出土文献中虽有记述，但大多只言片语，简略不详，以至于连名称也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探索梳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我们只能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主要对先秦至两汉时期梳篦的称谓略作讨论。

历代典籍的定名

《周礼 · 考工记》中已有“刮摩之工：玉、榔、雕、矢、磬”的记载，又有“榔人”的记载。据先秦典籍写成的《礼记 · 内则》亦记载：“榔从笄总。”据清人段玉裁的注解，《考工记》中的榔字，就是櫛之古字。

司马迁的《史记 · 匈奴列传》中记述：“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故集解徐广曰：或作“疏比”也。索隐案：《汉书》作“比疏一”。《汉书 · 匈奴传》中确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锦袷、长襦各一，比疏一。”《史记》中的“比余一”，《汉书》作“比疏一”，而余、疏，据清人段玉裁的注解，皆即梳子。

关于疏〔梳〕、比的区别，《仓颉篇》云：“靡者为比，麤者为梳。”《释名 · 释首饰》曰：“梳，言其齿疏也。数言比，比于梳，其齿差数也。比，言其齿细相比也。”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谓：“櫛，梳比之总名也。从木节声。”“梳，理发也。从木疏省声”。“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凡比之属皆从比”。又谓：“篦，导也。今俗谓之篦。从竹，卑声。”还谓：“笓，取虮比也。从竹匕声。”清人段玉裁注解，疏者为梳，密者为比。比、篦，古今字。统言则比，亦梳也。虮者虱子，云取虮比者，比之至密者也。而比之尤细者曰笓，今江浙皆呼篦笓。

三国时期魏张揖所作的《广雅 · 释器》称：“梳、枇、笓，櫛也。”清人王念孙疏证，櫛之言節也，其齿相節次也。榔与櫛同；疏比，与梳枇同。

在先秦时期的典籍里，已经有了榔字，即櫛字。在两汉时期的典籍中，又出现了梳、比〔枇〕、篦、笓字。《说文解字》不仅注明了櫛、梳、比〔枇〕、篦、笓各自的名称和字义，还指出了梳、比〔枇〕之间的关系。《广雅》则

进一步阐述了梳、枇、篦之间的关系。

出土文献的称谓

在一些竹木简牍、石刻、帛书等出土文献上，通常记有物品的名称、数量、大小和质料等方面的内容，实为古代墓葬随葬品登记的清单，故而被称作“遣册”或“衣物疏”。这类出土文献之中也有关于梳篦的记述，有的内容还可以同随葬的梳篦实物相对照，现举要论述如下。

湖北江陵望山 M2 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一座楚墓，墓主为女性，系楚国王族邵氏家族的成员[1]。墓中出土竹简 66 枚，编号第 129 号竹简的简文为，“二即”。即，当读若椔，而二椔，当为二栉。

湖北荆门包山 M2 为战国晚期的楚墓，墓主为楚国的高官左尹邵龙[2]。该墓出土竹简 448 枚。其中编号第 551 号的简文为，“四椔，一篓”。椔即栉，篓即竹笥；四椔为四栉，一篓为一竹笥。第 552 号的简文为，“一樠梴”。樠即缋，梴即梳。据《周礼 · 考工记》的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也。”可知缋梳，当为饰有花纹的梳子。该墓的边箱中出土一件长方形竹笥，其内正好放置素面梳篦一对、透雕梳篦一对，那对透雕梳篦上还镂刻有云纹和凤纹〔图 3〕。这四件同放在一个竹笥中的梳篦，应与第 551 号和第 552 号两枚竹简上所记的内容相符。

湖南长沙 M167 是一座战国晚期的楚墓，出土竹简 42 枚[3]。其中一枚竹简的简文为，“一齿屬”。据研究，屬，从齿，今作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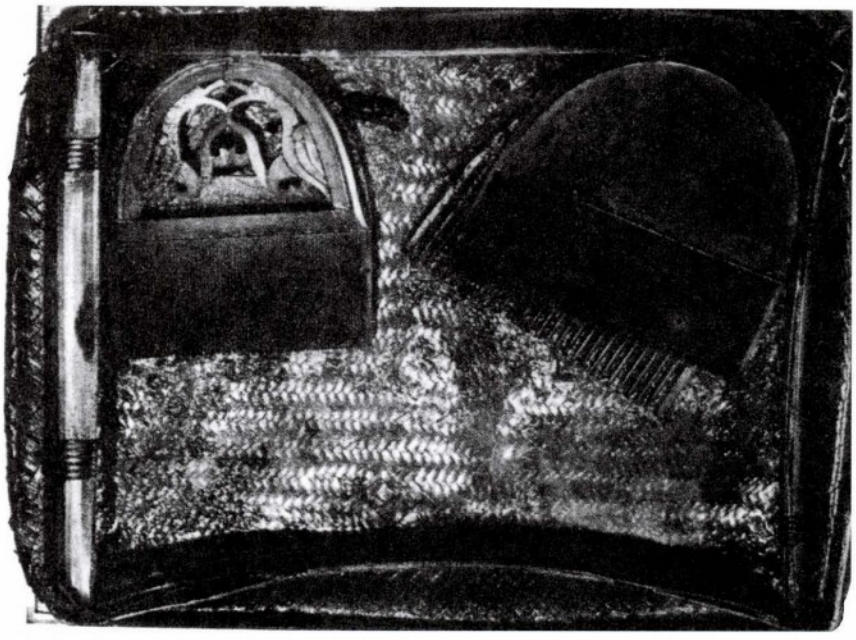
湖北江陵凤凰山 M168 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墓主名遂，生前为五大夫，下葬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墓中出有竹简 66 枚，均出于边箱。第 43 号的简文为，“木杼一”。发掘者认为，杼即梳，墓葬头箱中编号为 168：74 的木梳，与简文的内容相符[4]。将杼认定为梳，无疑是正确的。可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3〕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 年 4 期。



[图3] 木梳、木篦出土状况—湖北荆门包山楚墓M2

是，该墓的竹简出自边箱，与简文内容相符合的出土物大都也出自边箱之中，譬如，与第 39 号简文“角单一只金足”内容相符合的漆樽〔编号为 168：224〕、与第 42 号简文“坐案一”内容相对应的漆几〔编号为 168：254〕等实物，均出自边箱。以往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汉代墓葬随葬品的放置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与位置对号入座的。据此，笔者以为，与第 43 号简文内容相符的实物，不应在头箱之中，而应在边箱之中。换句话说，该墓边箱 123 号漆奁盒中所出土的木梳，即编号为 168：123 — 2 的木梳，才应是与简文内容相对应的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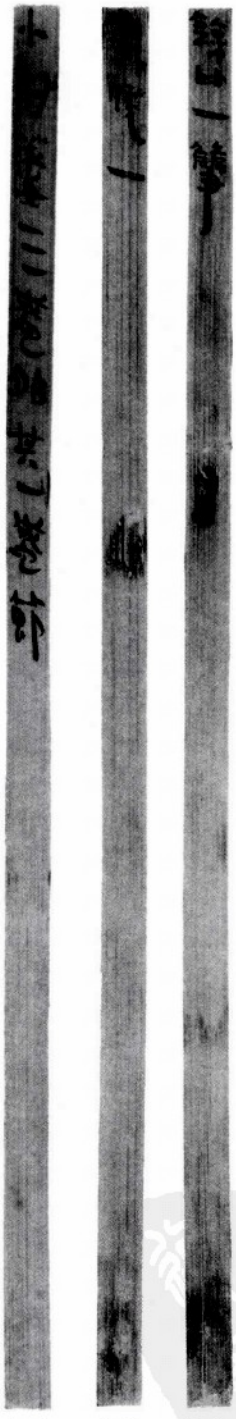
湖北江陵凤凰山 M167 也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墓主为一老年女 性，墓中出土 74 枚木简，系一卷内容较完整的遣册。第 10 号木简的简文为，“女子二人持耧枇绣大婢”。“耧枇”。即今之“梳篦”二字。在该墓随葬的木俑中，发现了手持梳篦的女俑各一件，应与第 10 号木简的内容相符。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墓主为第一代軑侯利苍之子，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①]。墓中出土竹简 402 枚。第 263

①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号简文为："小付篋三，盛脂，其一盛節。"節，即栉。第 321 号简文为，"象镜一"。第 323 号简文为，"疏比一双"〔图 4〕。疏比，即梳篦。该墓出土了一件双层六子漆奁，漆奁分为上、下两层，在奁的下层放置有六个小盒，圆形小盒二件、长方形小盒二件、马蹄形小和椭圆形小盒各一件，其中马蹄形小盒内盛装木梳、木篦各两对，圆形小盒内盛装黑色化妆品〔图 5〕；在奁的上层放置有角镜一件、角梳篦各二件、木梳和木篦各一件〔图 6〕。因此，漆奁下层的梳具，应与第 263 号简文的内容相对应；而漆奁上层的梳具，当与第 321 号和第 323 号这两枚简的内容相对应。

湖南长沙马王堆 M1 也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墓主为第一代軑侯利仓的妻子，可能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以后的数年[1]。墓中出土竹简 312 枚。第 236 号简文为，"疎比一具"。疎为疏之异体字，疏即梳；比即枇，后来作篦；疎比，即梳篦；一具即一套，或者一副。在该墓北边箱的一个五子漆奁中，内盛装木梳、木篦各一件，似与这枚简的内容相符。第 237 号简文为，"欠比二枚"。欠，即次字，也即栉字。第 238 号的简文为，



[4-1] [4-2] [4-3]

[图4] 竹简
1.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的第 263 号竹简
2.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的第 321 号竹简
3.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的第 323 号竹简

[1]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 197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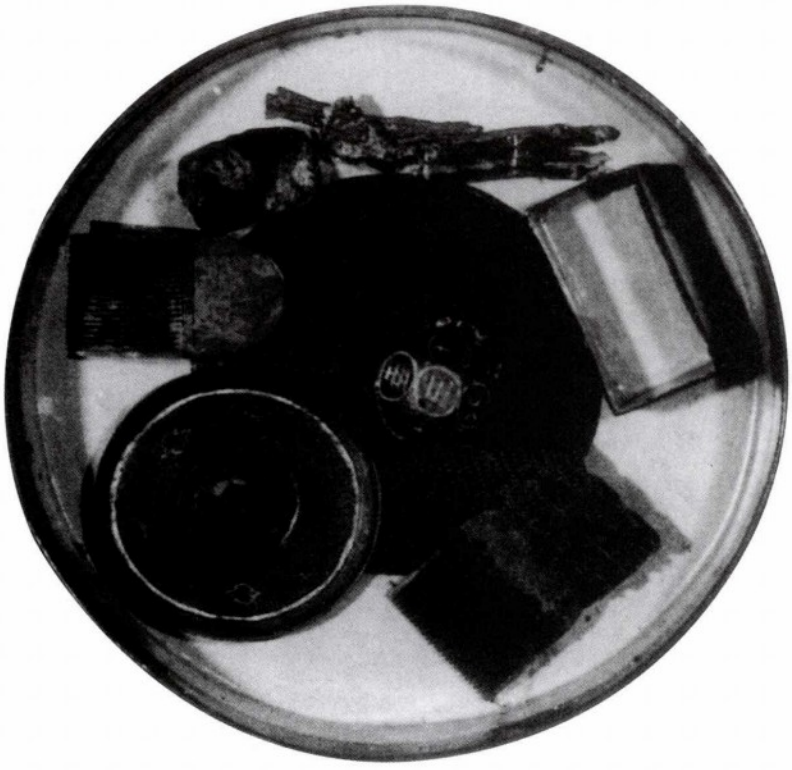


[图5] 梳篦的出土状况〔奁下层〕—湖南长沙马王堆M3

“象疎比一双”。在该墓北边箱的一个九子奁漆中有一马蹄形小漆盒，小盒内盛装两对梳篦，其中一对为木质梳篦，另一对为象牙梳篦，似与这两枚简的内容相符。

湖北云梦大坟头 M1 为西汉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名速，其身份被推定为县丞之类的官吏。该墓的头箱中出土木牍一件，木牍的第三列八行 7 的内容为，“豫疎一具”。发掘者认为，墓内出土的一件木梳〔编号为 52：1〕，与木牍内容相符[1]。然而，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竹简，“一具”，应为一套，或者一副之义，并非是指一件。这里显然缺失了“比”字。实际上该墓头箱内编号为 52 的器物乃是一件双层彩绘圆奁，其中盛装了包括编号 52：1 在内的四件木质梳篦，而这四件梳篦，从尺寸与规格来看，应属于大、小各一对才是。尺寸

[1] 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图6] 梳篦的出土状况〔查上层〕—湖南长沙马王堆M3

较大的一对，木梳高 9.2 厘米、宽 7 厘米；木篦，高 9 厘米、宽 6.4 厘米。如此看来，与木牍内容相对应的，并不是一件木梳，而应为成对的梳篦才是。

《居延汉简甲编》中收录的第 302 号简文为，“疎比一具”。于豪亮先生已经指出：疎字当为疏之误字，疎比即是疏比[1]。那么，疏，即是梳；比，即是篦；疏比一具，即是梳篦一具。

江西南昌东湖晋墓出土了一件木牍，其上记有“故刷一枚，故练细栉二枚，故絮粉□一枚，故面脂一□”等文字[2]。该墓为夫妇合葬，木牍出自男棺，在男棺中随葬了两件木梳，应与木牍所记的内容相符。

湖南长沙晋墓出土一方石刻，为周芳命妻潘氏的衣物券，其上记有“故栉父母一双，故铜镜一枚，衣具一，故刷一枚”等文字[3]。

〈1〉 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考古》1961 年 8 期。

〈2〉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 年 6 期。

〈3〉 李正光：《长沙出土晋墓墓志》，《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1 期。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79TAM383是一座北朝时期的墓葬，墓主为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下葬于北凉承平十六年〔459年〕。墓中出土了一件帛书，为彭氏的随葬衣物疏，其上有“故梳一枚”等文字[1]。这里的“故”字，当为故旧之意，“故梳”，即为旧梳。墓内随葬一件木梳，应与帛书的内容相符。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TAM48是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件文书，为延昌卅六年〔596年〕一佛教徒的衣物疏，其上有“剪刀尺具，针梳具”等文字[2]。

早在东周时期的竹简上，已有了“櫛”、“即”〔櫛〕之字，以及“栉”、“厔”〔梳〕之字，但这些字的写法尚不统一。在汉代的竹简和木牍上，除了“杼”、“秩”〔梳〕字以外，出现“比”、“枇”〔篦〕字，而且往往是“欠比”〔栉比〕、“疎比”或“疏比”〔梳篦〕连称，并配成“一具”或者“一双”以及“二枚”，而与之内容相符的梳篦实物通常也是成对出土的。在汉代以后的出土文献中，才出现了“櫛”字和“梳”字。

本文拟定的名称

根据清代朴学大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段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櫛同櫛，今简写为栉。栉，既可谓梳比的总称，也可单称梳为栉，或单称比为栉。疎、疏同梳，其特征为齿粗且稀疏；比同枇，今称作篦，其特征为齿细且密集；箆，当属比类，也即篦类，作为篦之中最至密的一种，乃是专门用于取虮的。

梳篦的字义，文献中已经释明。不过，关于梳篦在粗细与疏密方面的具体差异，上述的历代典籍和出土文献之中都没有详细的记录。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中引《实录》云：“赫胥氏造梳，以木为之，二十四齿，取疏通之义。”赫胥氏造梳，虽为传说中事不可尽信，但至少表明古时梳子的齿数，有的可多达24枚。为了弄清梳篦的齿数与疏密问题，我们先将可与出土文献相对应的梳篦实物，汇入下表，进行分析。

〔1〕 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年9期。

〔2〕 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年4期。

出土梳篦与出土文献对照表

出土地点	出土位置	梳篦质料数量	梳篦特征	梳篦尺寸〔厘米〕	简牍或帛书的记述
荆门包山 M2	置于北室的竹笥内	木质 4 件	均马蹄形 素面一对 透雕一对	素面： 433-1 齿 26 枚 高 7.9 宽 8.4 433-2 齿 96 枚 高 8.2 宽 8.3 透雕： 433-4 齿 22 枚 高 8.2 宽 7.1 433-3 齿 76 枚 高 8.5 宽 6.9	四椰，一篋
江陵凤凰山 M168	置于边箱圆奁中	木质 1 件	马蹄形	123-2 齿 12 枚 高 8.7 宽 5.6	木杼一
云梦大坟头 M1	置于头箱双层圆奁的上层	木质 4 件	均马蹄形 大小各一对	大 52-1 齿 16 枚 高 9.2 宽 7 大 52-4 齿 78 枚 高 9 宽 6.4	豫疎一具
长沙马王堆 M1	置于五子奁内	木质 2 件	均马蹄形	一件齿 21 枚 一件齿 60 余枚	疎比一具
长沙马王堆 M1	置于九子奁内	象牙 2 件	均马蹄形	一件齿 20 枚 高 8.8 宽 5.9 一件齿 47 枚 高 8.8 宽 5.9	象疎比一双
长沙马王堆 M3	置于六子奁下层的马蹄形盒内	木质 4 件	均马蹄形	159-11 ①齿 19 枚 高 7.7 宽 4 159-11 ②齿 19 枚 159-11 ③齿 66 枚 高 7.8 宽 4.4 159-11 ④齿 64 枚 高 7.5 宽 4.9	小付篋三，盛脂，其一盛節
长沙马王堆 M3	置于六子奁的上层	木质 2 件	均马蹄形	159-6 齿 19 枚 高 7.8 宽 4.4 159-6 齿 60 余枚 高 7.9 宽 4.5	疏比一双
吐鲁番 79TAM383		木质 1 件	箕形	齿 34 枚高 5.5 背宽 7.5	故梳一枚

据上表所列，东周时期的梳篦，均为马蹄形，其齿数稀疏者，齿数 22 ～ 26 枚，其密度在 1:3 左右，即在 1 厘米的宽度中平均只有 3 枚齿；齿数细密者，齿数 76 ～ 96 枚，其密度在 1:11 左右，即在 1 厘米的宽度中就有 10 枚以上的齿。汉代的梳篦，亦均系马蹄形，齿数稀疏者，其齿数一般为 10 ～

30 枚左右，其密度在 1:4 以下；齿数细密者，其齿数一般在 50 枚以上，其密度在 1:8 以上。北朝的梳子，属于箕形，齿数达 34 枚，密度为 1:4.5。

根据考古发现，自东周时期以来，有的一墓出土一疏一密两件梳篦，有的一墓出土一疏二密或二疏一密三件梳篦。不管是一墓出土两件的，还是一墓出土三件的，这些梳篦在形制或规格上大都比较接近，往往可配成一对、一双、一副或者一组使用。因而，我们有必要再对不同时期出土成组梳篦的典型遗存进行考察。

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共有 34 座墓葬同出一对梳篦，均为马蹄形[1]。稀疏者的齿数，一般 20 ～ 30 枚，少数只有 10 余枚，其密度大都在 1:4 以下；细密者的齿数，一般 70 ～ 100 枚，其密度大都在 1:10 以上。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共有 38 座墓葬同出一对梳篦，均为马蹄形[2]。稀疏者的齿数 15 ～ 28 枚，密度在 1:5 以下；细密者的齿数 63 ～ 100 枚，密度均在 1:10 以上。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 M295 出土二疏一密三件木质梳篦，均放置在一件竹笥之中〔图 7〕。这三件梳篦形制相同，均为马蹄形，背部较薄，一件高 8 厘米、宽 7 厘米，齿 17 枚，密度 1:2.4；一件高 7 厘米、宽 5.8 厘米，齿 19 枚，密度约 1:3；一件高 7.2 厘米、宽 6.3 厘米，齿 63 枚，密度为 1:10。

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地有 6 座墓葬同出一对梳篦，均为马蹄形[3]。稀疏者的齿数，多为 10 ～ 27 枚，密度在 1:5 以下；细密者的齿数，多为 48 ～ 96 枚，密度在 1:6 以上。

山东诸城杨家庄汉墓为一座男女合葬墓，在女性棺内出土一件三子奁，内盛二密一疏三件木质梳篦，三者的形制雷同，皆为马蹄形[4]。一件高 6.2 厘米、宽 4.5 厘米，齿 13 枚，密度约 1:3；一件高 6.4 厘米、宽 4.6 厘米，齿 29 枚，密度约 1: 6；一件高 6.3 厘米、宽 4.6 厘米，齿 56 枚，密度约 1:12。

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一对象牙梳篦[5]，两者均为半圆形，规格大小略有差异。一件高 3.8 厘米、宽 6.8 厘米，齿 34 枚，密度为 1:5；另一件高 4.1 厘米、

[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4] 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汉木椁墓》，《考古》1987 年 9 期。
[5] 赵平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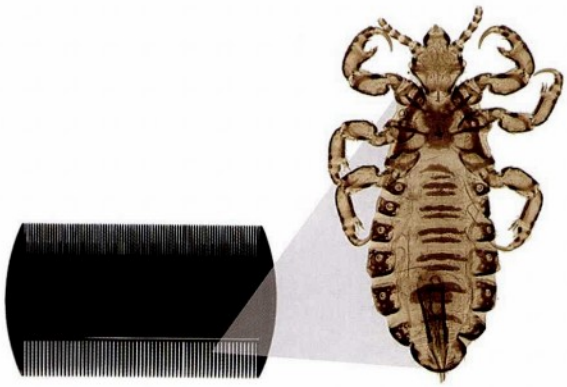
[图7] 梳篦的出土状况—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295

宽 7.4 厘米，齿 42 枚，密度约为 1:6。

上海松江明墓出土两件木梳[①]，均为扁方形，惟大小不同。大者，高 6 厘米、长 17 厘米，齿 53 枚，密度为 1:3；小者，高 4.2 厘米、长 13 厘米，齿数不详。

上述的几处典型遗存所显示的情况，与上表所显示的情况，可以说是大致相同的：即不同时期的梳篦，齿数虽不尽相同，但在疏密度上却较为接近。这样一来，根据出土的梳篦实物，结合历代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本文将密度在 1:5〔包括 1:5〕以下的称作梳，而将密度在 1:6〔包括 1:6〕以上的称作篦。至于箆，乃是用来取虮的，应属于篦类之中齿数最细密者，而虮为虱子的卵，其长度，一般在 1 毫米左右，故将箆的密度拟定在 1:10 以上，因为只有这样的密度才能够达到除去发中虱虮之目的〔图 8〕。

①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市松江区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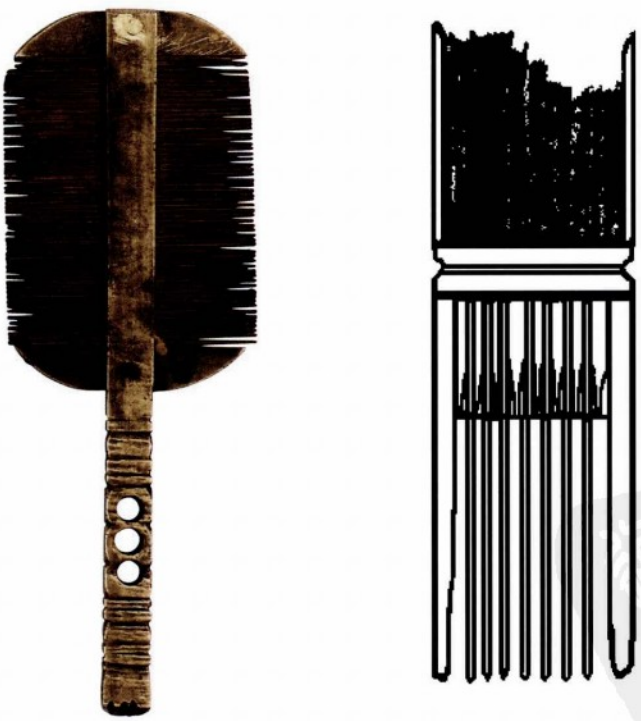
[图8] 篦子和虱子〔放大图〕

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将一般的梳篦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为背部，俗称“握手”，而背上所添加出的部分，大者称为背饰，小者称为钮饰；下为齿部，齿间的空隙称为齿缝〔图 9〕。

一般的梳篦，上端为背，下端为齿。可是还有一种梳篦，上、下两端或左右两端皆为齿，当中为背，其两端的齿正是通过中间的背联成一体的，加之两端的齿数和密度也不尽相同，既含有梳的特征，又含有篦的特征，属于名副其实的栉，所以本文将其统称作联背形栉，以示区别于一般的梳篦〔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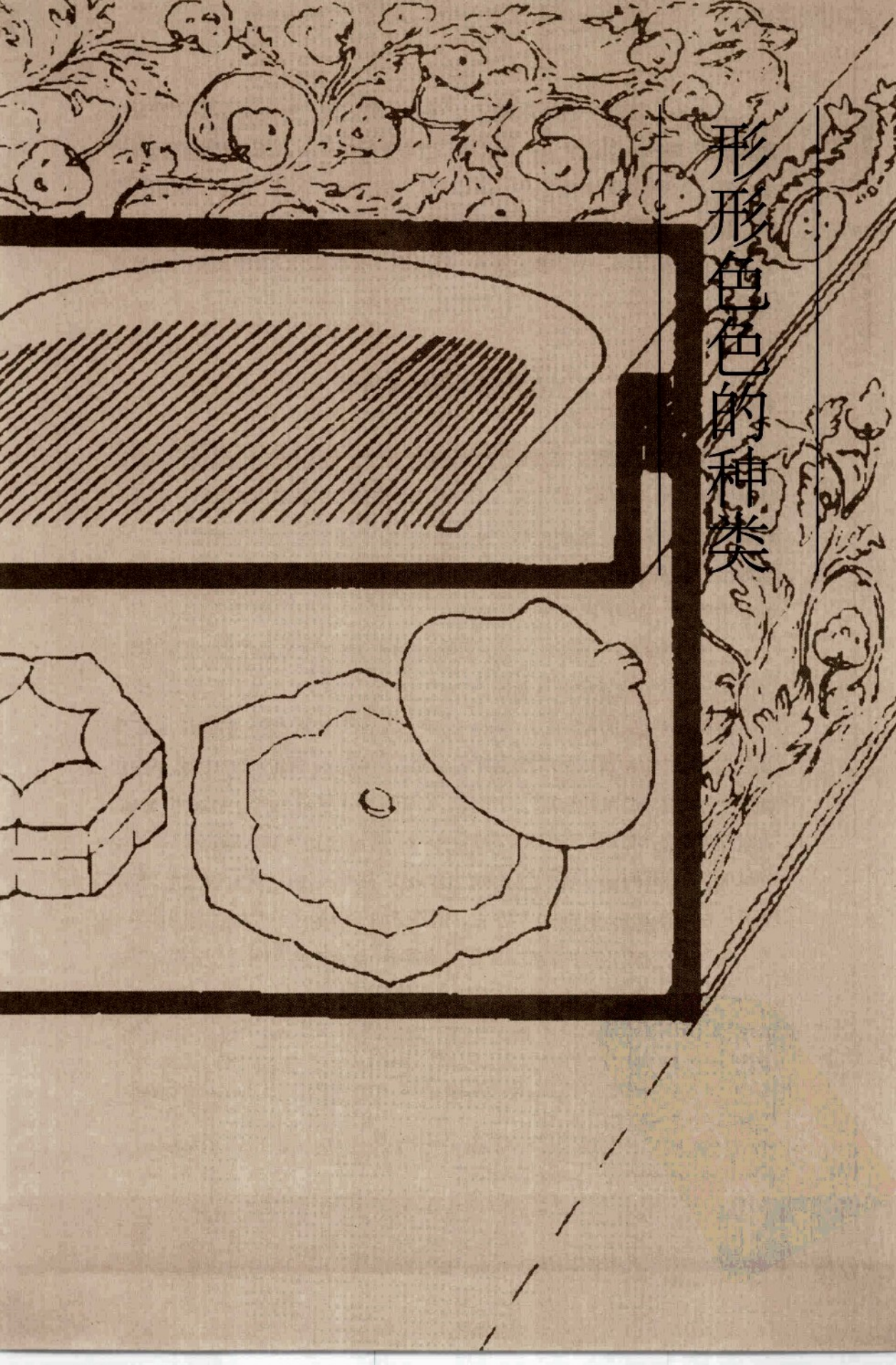


[图9] 梳子各部分的称谓



[图10] 联背形栉





形形色色的种类

《礼记·玉藻》中有“櫛栉”、“象栉”的记载。唐孔颖达疏：“櫛，白理木也。”櫛栉，即白木梳；而象栉，当为象牙梳子。以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制作梳篦的材料有骨、角、象牙、木、竹、玉、水晶、滑石、琉璃、玛瑙、琥珀、玳瑁、金、银、铜、铅、陶、纸等，其种类相当之多。在这些不同质料的梳篦之中，尤以骨牙角类、竹木类、玉石类，以及金属类的梳篦最为常见。

古朴端庄的骨牙角类

骨牙角类的梳篦，一般选用大型动物的肢骨、牙齿和角为原料加工而成，质地坚硬，光洁滑润。骨、角、牙，可谓动物躯体中最坚实的部分，以其制成器具，坚固耐用，庄重古朴。特别是象牙，在各种兽牙之中质厚色美、光洁如玉，堪称上乘佳品。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我国年代较早的梳子，大都是用兽骨、牛角和象牙制作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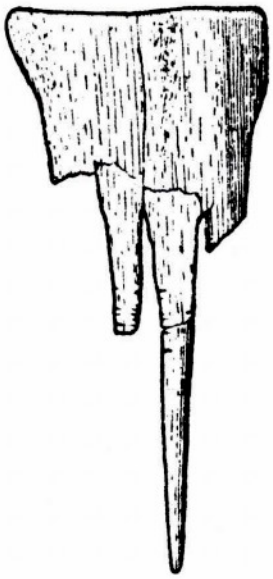
史前时期的骨牙角类梳子，主要见于黄河流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数量较多。

黄河下游地区的骨牙梳子，多见于江苏的北部和山东一带。据报道，在江苏邳县刘林 M2 和 M184、山东邹县野店 M50、山东莒县陵阳河 79M12 和 79M19 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各出土一件骨梳[1]，而在山东宁阳大汶口 M26 和 M10、山东茌平尚庄 M23 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则各出土一件象牙梳子[2]。其中刘林 M2 和 M184 出土的两件骨梳〔图 11〕，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其年代大约在距今 6100 至 6000 年左右，这是黄河下游地区已知最古老的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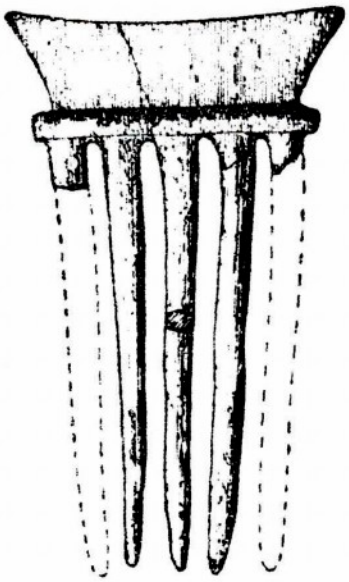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骨梳，见于河南陕县、甘肃东乡和永昌、宁夏海原等

[1]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 年第 1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2 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 年第 3 期。

[2]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74 年；山东省文物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 年 4 期。



[II-1]



[II-2]

[图II] 骨梳
1. 江苏邳县刘林 M2 出土
2. 江苏邳县刘林 M184 出土

地。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 H563 中出土过一件骨梳[1]，该遗址的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过一件骨梳[2]，该遗址的年代属于马家窑文化的晚期。在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也出土一件骨梳[3]，可能属于马厂文化的遗存。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 M25 中亦曾出土了一件骨梳[4]，该墓地被视作一种存续于当地的考古学文化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2›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1984 年。

‹3› 甘肃省博物馆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 年 5 期。

‹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 年 4 期。



[图12] 象牙梳—浙江嘉兴吴家浜M5出土

遗存，并被命名为菜园文化，这种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甘青地区的半山文化。这一地区出土的骨梳，其年代大体都在距今 5000 年前后。

长江下游地区的骨牙梳子，见于浙江嘉兴和江苏昆山等地。浙江嘉兴吴家浜 M5 发现一件象牙梳子[1]，该墓葬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其年代大约在距今 6000 年左右，这是长江下游地区已知最古老的梳子〔图 12〕。江苏昆山绰墩 M73 发现了一件象牙梳子[2]，这座墓葬属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存，在年代上要略晚于嘉兴吴家浜 M5。在浙江嘉兴盛家墩遗址征集到一件骨梳，梳背上镶嵌有两排圆形的小石片，据推测可能属于良渚文化的遗物[3]。

长江中游地区的象牙梳子，仅见于湖北郧县。在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 F6 中出土一件象牙梳[4]，灰白色，倒梯形梳背的中部有两组相对的小孔，当系缀合修补的痕迹。F6 属于屈家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嘉兴吴家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 3 期。

〔2〕苏州博物馆等：《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第一至第五次发掘简报》，《马家浜文化》嘉兴市文化局编 2004 年。

〔3〕蒋卫东：《良渚文化复合件玉器的初步研究》，《第五届中国玉文化玉学江阴研讨会——中国南方地区玉文化研究专题》〔资料集〕2005 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岭文化的遗存，年代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左右。

根据古史传说，我国夏王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21 至 16 世纪，夏人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豫西和晋南一带。现在虽然没有发现至关重要的夏王朝文字资料，但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分布地域以及文化特征等方面，与文献中关于夏的记录有诸多相吻合之处。夏王朝时期的夏人文化应在二里头文化和及其前身的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中去寻找，这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夏时期的骨梳，报道资料较为具体的仅见于河南郑州洛达庙遗址，而郑州洛达庙遗址就是最早发掘的一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该遗址 H316 的灰坑中出土了一件骨梳[1]，制作得比较精致，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遗存。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在距今 3800 至 3500 年左右。

商代的骨牙梳子，主要发现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河南郑州一带，在夏代属于夏王朝统治范围内的重要地区，到了早商时期，这里已经成为商王朝统治的畿内之地。关于郑州商城，有的认为是成汤灭夏立都西亳所在，也有的认为是“仲丁迁于隞”之隞都遗址，目前虽无定论，但作为盘庚迁殷以前的王都之一，则在学术界并没有太大的争议。郑州商城遗址已经出土了多件骨梳，这些骨梳大都出自制骨作坊附近，制作得较为精细[2]。在郑州商城东墙北端外侧的白家庄 C8M3 还出土了一件象牙梳〔图 13〕。这是一座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墓葬，墓内埋葬两具人骨架，一具为墓主人，在墓室的中部，因腐朽严重已看不出葬式；另一具为殉葬者，在西面的二层台上，人骨架保存尚好，其葬式为俯身葬。象牙梳置于殉葬者的足下，伴出的青铜器有鼎、鬲、斝、罍、觚、爵，还有玉器等随葬品。C8M3 在已发掘的二里岗上层时期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容器数量最多，品种亦最全，其墓主人显然应当是身份较高的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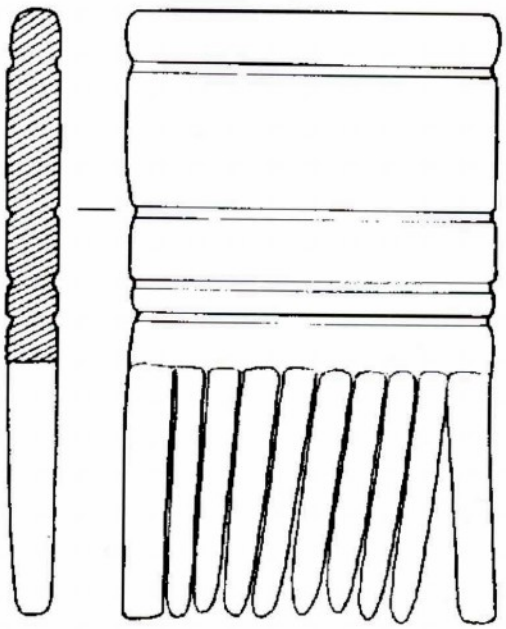
河南安阳殷墟作为商代后期的都邑，既有宫殿区，又有王陵区。安阳殷墟发现的梳子，大都出自王陵区。妇好墓出土一件骨梳[3]，背脊的正中刻一小鸟〔图 14〕。侯家庄 M1003 出土一件象牙梳子，背脊中央有一屋宇形钮[4]。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 年 4 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 – 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4)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



[图13] 象牙梳—河南郑州白家庄C8M3出土



[图14] 骨梳—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其地在商代乃居国之北境，为北方的一个重镇。这里出土了一件骨梳和大量的骨器，还有一些带有切割痕迹的骨料和半成品[1]。

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被视为一处商代方国的贵族墓地。1991 年清理了一座大型墓〔M4〕和一座中型墓〔M3〕，这两座墓葬均出有牙梳[2]。从 M4 的规模、墓上建筑遗存以及大量的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生前当为商末周初东土方国统治集团上层的重要成员，即方国的首领方伯。M3 则可能是 M4 的配偶或臣属墓葬。

西周时期的骨牙梳子，主要发现于陕西、北京等地。

陕西长安的沣河以西，相传是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的都城。经考古调查发现，沣西的客省庄、马王村、大原村、冯村一带是西周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应为西周都城丰京遗址的所在。张家坡西周墓地恰好座落在这一范围之内，该墓地的 M309 曾出土一件象牙梳子[3]。据青铜器铭文可知，张家坡西周墓地是包括井叔家族在内的若干个家族的贵族墓地。从 M309 的位置、规模及随葬品推测，墓主人应当是从属于地位尊贵的大墓墓主的家族成员。此外，在陕西长安鄠县马王村西周时期的遗存中发现过一件骨梳[4]，在陕西宝鸡竹园沟 M4 出土了两件骨梳〔图 15〕[5]。

《史记 · 燕召公世家》中虽有“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燕”的记载，可是关于燕的封地在何处，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北京一带在晚清时期便有带“匽侯”字样的青铜器出土，但出土地点不详。“匽”，即燕国之燕在青铜器铭文中写法。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和西周墓地的发掘，尤其是一批带有“匽侯”等铭文资料的出土，不仅印证了典籍所载的召公封燕为信史，而且证明了西周时期燕国的中心确在今北京一带[6]。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已发现了五件象牙梳子，出自三座墓葬。其中 M202 为整个琉璃河燕国墓地规模最大的墓葬，拥有南、北两墓道，并附葬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 年 3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鄠县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 年 6 期。

〈5〉 卢连成、胡智荣：《宝鸡強国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 － 1977 年》，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图15] 骨梳的出土状况—陕西宝鸡竹园沟M4

车马坑，墓室长 7.5 米、宽 5.2 米，由于被盗严重，头箱内已空无一物，只在椁室北部发现一件象牙梳子，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代燕侯；M201 位于 M202 的左近，随葬品也被盗空，仅在椁室北部发现一件象牙梳子，墓主人当属于燕侯的家族成员；M251 的规模亦较大，墓坑长 4.5 米、宽 3.7 米，随葬有铜礼器、车马器、兵器等，另有象牙梳子和龟甲各一件，墓主人应是仅次于燕侯的高级贵族，其年代应在西周早期，即成王、康王之际。

在北京昌平县白浮村西周墓 M2 中也出土了一件牙梳，梳背阴刻兽面纹，并有极细的梳齿痕迹，由于残损严重，无法复原[1]。墓中埋葬了一中年女性，从随葬的有鼎、簋、壶等青铜容器来看，墓主人的身份应属于贵族阶层，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大约在穆王时期。

周武王克商以后，在今河南洛阳的瀍河以东建王城、瀍河以西建成周两座城池。周平王东迁后，居于王城。东周时期的骨牙角梳篦，主要出土于河南、山西、山东、江西等地。

20 世纪 70 年代，在河南洛阳西郊东周王城内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大型土坑墓，编号为 M4，尽管早年被盗，尚存遗物 1637 件，其中有一件骨梳[2]。1996 年在东周王城内的王陵区域中，清理了一座编号为 C1M5560 的长方形土坑墓，在墓室的北端发现一件象牙梳子[3]。据墓出土的一件玉戈推测，墓主人为战国时期“毕公左军”的步卒统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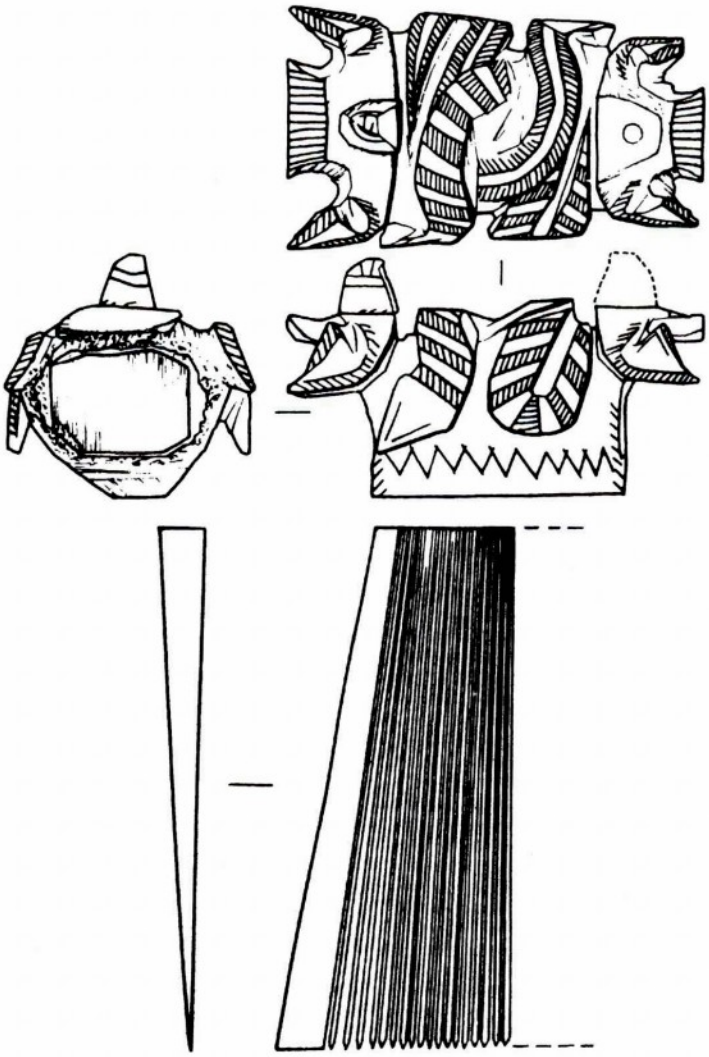
西周初年，周成王灭唐，把自己的弟弟叔虞封在那里，称为唐公，唐后来改称晋。晋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春秋时日渐强大，一再成为霸主。晋都新田，在今山西侯马。1976 年在晋都核心——平望古城内清理了两座土坑竖穴墓，从 M2 中出土了一件骨梳[4]。不过，发掘者和报告的整理者只认出梳身部分，并未能辨识出梳背部分，因而在报告中将梳背称为骨饰。笔者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件骨梳实际上是由梳背和梳身两部分组成，并以榫卯的形式拼装组合而成的。梳背“系动物肢骨雕刻而成，上端两侧各有一展翅飞翔的鸟，中间为两蛇缠绕，用红彩〔或朱砂〕绘出羽纹和鳞纹”；

[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地新启示》，《考古》1976 年 4 期。

[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1985 年。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宫路小学 C1M5560 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 7 期。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图16] 骨梳—山西侯马晋都新田76M2出土

梳身作鱼尾状〔图 16〕。这座墓葬的年代，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周武王封师尚父于营丘建立齐国，周夷王时齐胡徙都薄姑，献公时又迁都临淄，此后更不徙都。春秋时期，齐的势力日益强大，公元前 690 年灭纪，公元前 567 年攻灭莱，胶东的“鱼盐”之地，尽数归入齐的版图。战国时，齐国作为七雄之一，国力更加强盛，一度称王，并与秦国形成东西对峙的强势局面。临淄齐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市旧临淄县城西北部。据旧志记载，齐故城周围有数以百计的“冢子”，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就是其中的一座。在该墓顶部的填土中发现 6 个殉人，椁室四周环绕 17 个陪葬坑。由于多次被

盗，墓主的遗骸已无法确认。经鉴定，陪葬坑中可以辨识年龄和性别的 6 具骨架，均为女性，年龄大都在 20 岁左右。墓内发现骨梳 19 件，均出于陪葬坑，每坑少则一件，多则六件[1]。据墓葬的形制和大量的殉人及千余件随葬品来看，墓主人无疑是齐国的高级贵族。此墓的年代，被推定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之间。

在临淄左近的章丘宁家埠、青州市凤凰台和赵铺、昌乐岳家河等地东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均出有骨梳[2]。临淄以东的胶东一带，曾是莱、纪、过、夷等诸小国的分布之地，迟至春秋晚期尽为齐所吞并。在这一地区的长岛王沟、海阳嘴子前和威海等地东周墓群中亦都发现了骨梳[3]。

齐国的西南，分布着星罗棋布的诸侯国，因而文献中有“泗上十二诸侯”之称。在这些列国之中，鲁国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从西周初伯禽就国直至鲁亡于楚，延续了 800 余年左右。曲阜鲁故城 M116 出土了一件牙梳，牙梳由梳背和梳身两部分构成，背脊处雕刻有双鸟，梳背与梳身以榫卯承接，该墓葬的年代介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4]。

在鲁国之南的泗水和沂水流域，还有莒、薛、滕等小诸侯国。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这些小诸侯国的城址，有的已被发现。

己姓的莒国和云姓的禹国，在今山东莒县和临沂一带。在临沂市东 22.5 公里的中洽沟东周墓中出有象牙梳一件，其年代大体为春秋中期[5]。

薛国故城位于今山东滕州城之南的官桥镇附近，在薛国故城 M9 中出土一件骨梳，梳背脊上雕刻双鸟，背上饰有蟠虺纹，梳身作鱼尾状，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晚期[6]。

滕国故城在今山东滕州西南 7 公里的东滕城村一带。1978 年以来，先后

〈1〉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 年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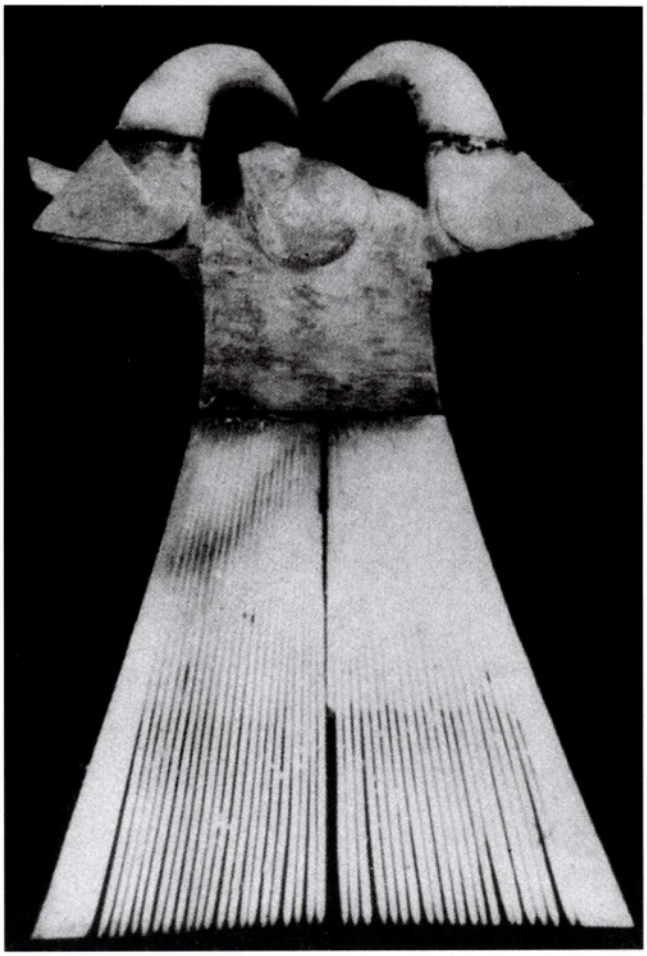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 1993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凤凰台遗址发掘》，《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等：《山东昌乐岳家河周墓》，《考古学报》1990 年 1 期。

〈3〉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 年 1 期；烟台市博物馆等：《海阳县嘴子前》，齐鲁书社 2002 年。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 1982 年。

〈5〉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中洽沟发现三座周墓》，《考古》1987 年 8 期。

〈6〉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 年 4 期。



[图17] 象牙梳—山东莱芜西上崮征集

在与东滕城村相邻的庄里西村出土了标明“滕公”的鬲、簋和“滕侯”的鼎、戈等青铜器，证明这里应是滕国贵族墓地。1990 年在滕国故城西北 1.5 公里的庄里西清理了一座东周墓葬，墓中发现一件象牙梳，出土时置放在铜鼎之内[1]。象牙梳由梳背和梳身两部分组成，背脊两端外展，上有一对小鸟；梳身呈梯形，梳齿排列均匀，其年代被推定在战国早期。

1973 年在鲁北的莱芜西上崮征集到一批青铜器和两件牙梳，其中一件梳背上有一对尖咀鸟〔图 17〕，经调查这批遗物均应出自墓葬[2]，其年代可能

〈1〉 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庄里西战国墓》，《文物》2002 年 6 期。

〈2〉 刘慧：《莱芜西上崮出土青铜器及双凤牙梳》，《文物》1990 年 11 期。

在春秋中期和晚期之间。

史载，“越有百种”，“各有种姓”。“干越”，西周初年建国，其中心在赣东北的余干一带。江西贵溪仙水崖的 M10 和 M13 两座崖墓，各出土一件象牙梳子。其中一件梳背上装饰有云雷纹，出土时放在一篾盘内[1]。贵溪崖墓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崖墓的主人可能为干越人。

东周时期的梳子，在边远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也有一定的发现。内蒙古林西井沟子 M3 出土一件骨梳[2]，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 M4 和鄯善苏贝希 M6 各出土一件角梳[3]，这些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东周时期。

秦汉时期的骨牙角梳篦，主要发现于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天津，以及内蒙古包头、满洲里与新疆且末、鄯善、和静等地。

20 世纪 70 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我国汉代考古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成就。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市东郊的一个椭圆形小台地，M1 和 M3 在东，M2 在西，墓上的封土形成两个相互毗邻的高大土冢。M1 内出土一对象牙梳篦，M2 内出土一对玳瑁梳篦，M3 内出土一对角质梳篦〔图 18〕。据研究，M2 的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轪侯利苍，M1 的墓主人为利苍之妻“辛追”，M3 的墓主人为利苍之子。

1992 年在湖北荆州高台墓地 M11 中发现一对角质梳篦，出土时位于头箱内，伴出的有竹枕、漆骰子等物。这座墓葬的年代，被推定在汉武帝初年。

天津武清县，汉时为泉州之地，汉泉州故城遗址就在武清西北的兰城村一带。这一带分布着较多的古墓。20 世纪 70 年代，在此发现一通“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的墓碑，继而又墓碑之北 6 米处发现一座由前、中、后三室组成的砖砌古墓。因盗扰严重，墓内的人骨和随葬品均已失去了原貌，中室出土有骨梳、骨篦、铜镜等物[4]。据碑文记载，墓主人鲜于璜，字伯谦，历任安边节度使、雁门太守等官职，卒于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

[1] 李科友：《贵溪崖墓》，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2002 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2004 年 1 期。

[3] 新疆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的发掘》，《考古》2002 年 6 期；新疆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 年 6 期。

[4]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 年 3 期。



[18-1]



[18-2]

[图18] 角梳、角篦
1.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北 159 — 4
2. 湖南长沙马王堆 M3 北 159 — 5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内蒙古市南郊的召湾古墓群，已经陆续清理了近百座墓葬。M98 是一座多室穹隆顶砖室墓，被严重盗扰，墓中出土骨梳两件[1]。召湾墓群的年代，大体在两汉时期。

1986 年内蒙古满州里扎赉诺尔墓群 M3005 中出土了一件骨梳。M3005 是一座土坑竖穴墓，葬具为木棺，在棺外的四角装有椁架，死者系中年女性，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东汉时期[2]。

古代的且末，为西域的一个小国，地处且末水流域〔今车尔臣河水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属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新疆段南道的绿洲国家。今新疆且末一带，是出土古代梳篦较为集中的区域。扎滚鲁克墓群位于且末县托克格拉克勒克乡之西绿洲边缘的戈壁上，这里分布着大小不同的五处墓地[3]。1996 年在新疆且末扎

〈1〉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召湾和边墙壕清理的四座汉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 年 1 期。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 1986 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 年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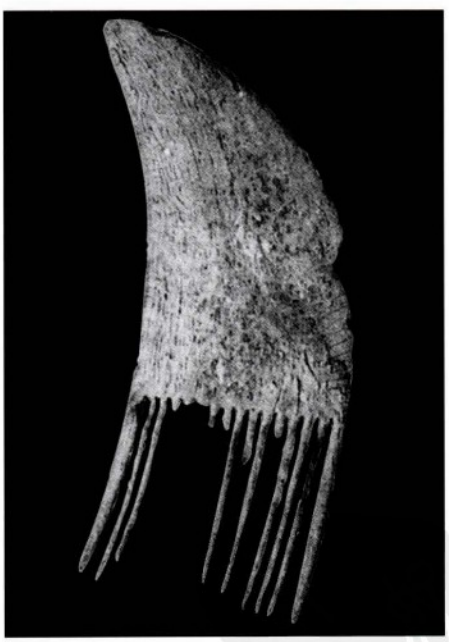
滚鲁克一号墓地就发掘出 10 余件骨角梳子〔图 19〕，在二号墓地也出土了多件骨梳。出土这些骨角梳子的墓葬，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

古时的鄯善，也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1990 年在新疆鄯善三个桥 M13 中出土一对角梳。M13 为一座竖穴偏洞〔室〕墓，埋葬三人，墓坑中心为一次葬的一男一女，偏室内为二次葬的一女。出土时，两件角梳均出于一次葬女性的一侧[1]。从墓葬的形制来看，其年代可能相当于西汉时期。

新疆和静一带，两汉时期主要隶属焉耆国。在和静县西北察吾呼沟口两侧的台地上，分布着密集的古墓葬。察吾呼沟三号墓地 M8 是一座竖穴偏室墓，死者为女性，年龄 18 ～ 20 岁，墓内发现一件骨梳，出土时骨梳置于腰部，伴出的还有一件铁镜。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年代，一般推定在东汉时期[2]。



[19-1]



[19-2]

[图19] 角梳
1.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M4：31
2.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M31：1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鄯善三个桥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 6 期。

〔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 1999 年。

南北朝时期的骨牙梳篦，保存较好者见于青海西宁。1985 年在青海西宁清理了一座古墓，墓中出土象牙梳一件，梳背的一面上雕刻双龙，另一面雕刻双凤[1]。死者系成年男性，据伴出的鸟形金牌饰、“凌江将军章”铜印得知，墓主人生前曾任“凌江将军”一职，墓葬的年代当在十六国北朝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骨角梳篦，多见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内蒙古一带。

自 1983 年以来，在河南偃师以西 2.5 公里的杏园村已经发掘出数十座墓葬，其中有四座纪年墓均出土骨角梳子[2]。M1435 系一座土洞墓，墓内出土一件骨梳，伴出的有铜镜、银钗、银盒等，墓主陈郡袁氏，下葬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 年〕。M5036 也为土洞墓，墓室内置两具木棺，在一人头部附近出土角梳一件，墓主郑洵夫妇，郑洵生前任监察御史，后贬岳州沅江县尉，下葬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 年〕。M2603 亦属土洞墓，墓内埋葬两人，在一死者的头部附近出土一件银箔平脱方漆盒，盒中盛装骨梳、木粉盒、金钗、铜镜等物，墓主李景由，生前任蒲州猗氏县令，下葬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M1819 为一座砖室墓，墓室内葬两人，出土骨梳三件，伴出铜镜、铜钗、铜镊、漆盒、银盒等，墓主李归厚和夫人卢氏，李归厚生前任鹿邑县主簿，下葬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 年〕，夫人卢氏下葬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 年〕。

1956 年在河南陕县南关的庙底沟发现一座单室土洞墓，内葬一人。死者的头部出土有铜钗、银钗、螺钿花钗、骨梳、玉饰、粉盒等物[3]。骨梳，共两件，形制完全一致，平面呈箕形，梳脊上用阴线刻有两个童子，在儿童的服装上绘有金线〔图 20〕。墓主可能系女性，下葬的年代当在唐代中叶以后。在陕县刘家渠也发现了一批唐墓，M98 和 M103 中的人骨架头上，都插有好几件骨梳[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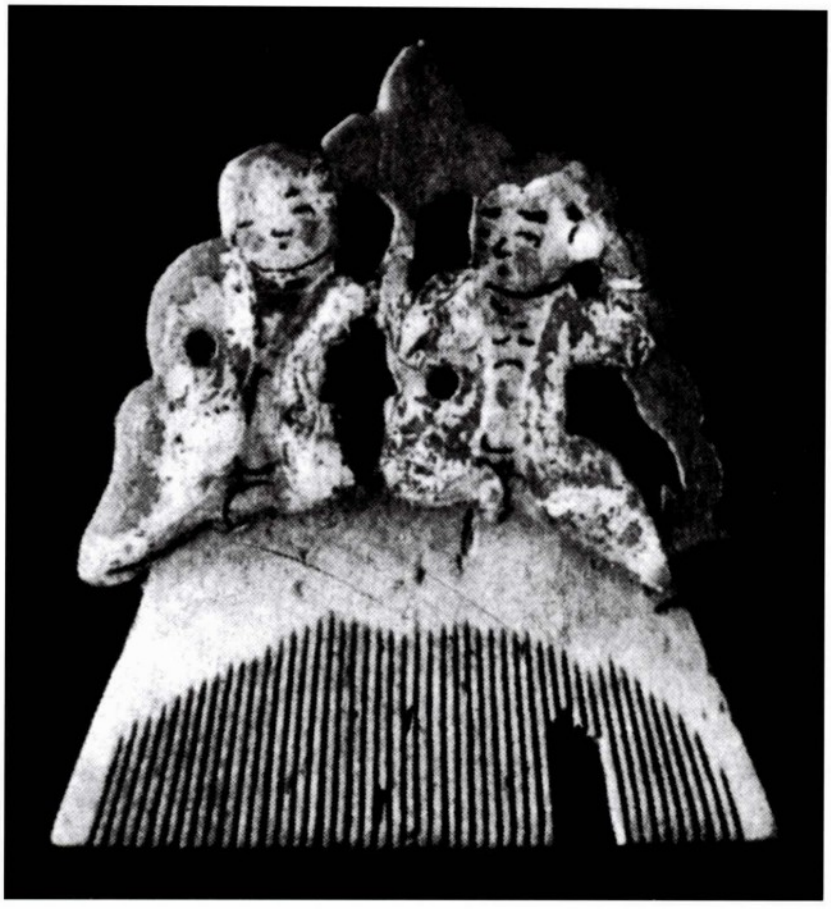
1982 年在河北蔚县黄梅乡榆涧村发现一座砖室墓，墓室呈圆形，棺床上

[1] 卢耀光等：《青海西宁发现一座北朝墓》，《考古》1989 年 6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4] 黄河水库考古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57 年 4 期。



[图20] 骨梳—河南陕县庙底沟唐墓出土

散置人骨架两具，经辨认为夫妇合葬。墓内出土骨梳背一件，伴出的有铜镊子、釉陶盒等物，年代应属于唐代前期偏晚[1]。

2000年山西大同南关发现一批唐墓，其中M11出土一件骨梳背[2]，墓主为女性，与骨梳背伴出的只有陶壶、陶罐和一枚“开元”铜钱。

在河南郑州上街区的唐墓、河北石家庄赵陵铺唐墓、山西万荣皇甫唐墓[3]，也都曾发现过骨梳。

‹1› 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榆涧唐墓》，《考古》1987年9期。

‹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关唐墓》，《文物》2001年7期。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图21] 角篦—陕西长安风雷仪表厂唐墓出土

20世纪50至60年代，在陕西西安郊区白鹿原等地发掘了多座唐墓，其中M18、M51和M420均出有骨梳[1]。从M420出土的墓志得知，墓主路复源，生前系河南府仓曹参军，唐大中十二年〔858〕祔先茔葬此。

1990年在陕西长安县风雷仪表厂的唐墓中，出土了三件角篦[2]。这三件角篦系用动物角雕琢而成，梳背呈半圆形，其上有的浮雕花卉一簇，有的浮雕飞鸟一对，底饰线刻小方格纹〔图21〕。

1982年在江苏丹徒县丁卯桥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两处窖藏，出土物有大量银器以及角梳四件。这些角梳的形制相同，均呈箕形，一件稍大，另三件稍小。这批窖藏银器上，大都刻有“力士”二字，故而推测应为唐代的制品[3]。

20世纪90年代末，在安徽淮北市柳孜运河遗址出土了多件骨质梳、篦[4]。根据层位关系和伴出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重庆出版社1998年。

〔3〕 丹徒县文教局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11期。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瓷器分析，T6 ⑧层的骨梳应属于唐代，T8 ⑥层的骨梳则属于五代时期。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梁村发现一座唐墓，为单室土洞墓[1]。墓内葬一人，死者头部右上角放置一漆木梳妆盒，盛装角梳、铜镜、簪子等物。墓中还出有一件象牙梳，白色，惜已残断碎裂。据墓志得知，墓主李氏，幽州人，朝散大夫蓟州长史成君陇西郡夫人，死于唐元和二年〔807 年〕。

辽金时期的骨牙梳篦，主要见于河北宣化、北京延庆和通县、辽宁朝阳、黑龙江阿城等地。

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城西约 3 公里的下八里村发现一处辽代墓地，出土了一批骨梳[2]。据墓志记载可知，这里是张氏和韩氏两个家族的墓地。在 M10 中出土三件骨梳，伴出有木质镜架、竹木匣等，墓主张匡正夫妇，张匡正死于道宗清宁四年〔1058 年〕，道宗大安九年〔1093 年〕与夫人黄氏一并改葬于此。在 M3 中出土两件骨梳，伴出有镜架、衣架、木盒等物，墓主张世本夫妻，张世本“大安九年”下葬，其妻焦氏“皇统三年”〔1143 年〕启坟合葬。在 M4 中出土一件骨梳，墓主韩师训，葬于天庆元年〔1111 年〕。在 M9 中也出土一件骨梳，墓主姓张，下葬的年代可能早于 M10。

北京延庆张山营镇晏家堡村发现一座辽代砖室墓，墓室呈八角形，墓中出土骨梳三件〔图 22〕，均为半圆形[3]。墓志盖上刻有“故吕夫人墓志”，可知墓主应为女性。据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推测，其年代应处于辽代末年。

北京通县城关发现两座石椁墓，两墓相距 5 米，为男女异穴合葬。M2 为女性，墓中发现骨梳七件，均残，有的梳背上涂黑漆并描金线，出土时散置石椁的两侧[4]。据墓志得知，M1 的墓主系金宣威将军河东路第一将正将兼知大和寨事上骑都尉石宗璧，下葬于大定十七年〔1177 年〕。

1977 年辽宁朝阳前窗户村发现一座石板墓，由长方形主室和两个圆形耳室构成。葬具为长方形石棺，据牙齿鉴定，内葬一中年女性。石棺外出土一件象牙梳，伴出有铜镜等梳妆用品[5]。据研究，该墓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辽统

〔1〕 孙建华：《和林格尔县大梁村李氏唐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 年 1 ~ 2 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 — 1993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延庆县时尚纺织品有限公司壁画墓发掘简报》，《北京文博》2005 年 3 期。

〔4〕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 11 期。

〔5〕 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1 年 12 期。



[图22] 骨梳—北京延庆辽墓出土

和后期至开泰初年，即1004年前后，墓主人应为契丹族的贵妇。

1988年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城子村的农民偶然发现一座古墓，经过考古部门的发掘，确认为金代墓葬。该墓为竖穴土圹，葬具石椁木棺，内葬男女二人。男性的腰上垂系一小囊，用绛色暗花罗缝制，两袋分叉相连，套盖及袋边缀以珍珠，内盛象牙梳篦一对〔图23〕、骰子两枚。墓中出土一件墨书木方，上有“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的字样，据此考证，墓主乃是完颜晏夫妇，完颜晏系景祖之孙，阿离合满次子，历任吏礼两部尚书等职，贞元初最终进封为齐国王。其下葬的年代，当在金大定七年〔1167年〕之前。

宋元时期的骨角梳篦，见于福建福州、安徽六安、山东嘉祥、河北石家庄等地。

1975年在福州北郊发现一座三圹并列的宋墓，据砖质买地券可知，右圹墓主黄升，左圹墓主“孺人李氏”。在黄升发髻的前后左右四边，各插有一角篦，墓还中出土一件六角葵瓣形漆奁，内装铜镜、粉盒、银钗、角梳、棕刷等物[1]。黄升系宋室后裔

[1]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赵师恕季孙赵与骏之妻，16 岁嫁，17 岁卒，下葬于淳右三年〔1243 年〕。“孺人李氏”，应是年长的老妇，葬于淳右七年〔1247 年〕。

1981 年在安徽六安花石咀发现两座古墓，为男女异穴合葬。在女性墓中出土角质梳篦四件，形制相同，均为半圆形。在一件角梳的梳背上，尚残留镶包的薄金片一段，其上压印有“尧二郎”三个楷书字样。这两座墓葬的年代，推定在南宋末年或元代之初[1]。

在山东嘉祥县北 5 公里处，发现一座元墓，为男女合葬。男女各一具木棺，均出有梳篦。男性棺内出土一漆盒，内盛装角梳、铜镜等[2]。据墓志得知，墓主系元代通奉大夫曹元用及夫人郭氏。曹元用，其人《元史》有传，历经四朝，累封为翰林国史院编修、礼部主事、尚书中省右司都事、礼部尚书等，卒于文宗天历三年〔1330 年〕。

在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约 3 公里的后太保村发现一处墓地，M4 为土坑砖室墓，圹内并列五个墓室，其中 D 室内葬一女性，头部附近出土



[图23] 象牙梳篦—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

(1) 安徽六安县文物工作组：《安徽六安县花石咀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 年 10 期。

(2) 山东省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 年 9 期。

金簪、骨梳等物[1]。骨梳，已残，梳体呈半圆形，一道半圆形的浅槽将其分为梳背和梳齿两部分，长 10 厘米、高 5.1 厘米。据 C 室出土的墓志载，墓主史杠，官至湖广等处中书省右丞，下葬年代元代延祐三年〔1316 年〕。该墓 D 室所葬的人，显然应为史杠家族成员。

明代的骨角梳篦，见于安徽合肥和山东邹县等地。

1983 年在安徽合肥市区发现一座明墓，内葬一人，老年女性。死者的头发束于脑后，发髻上插有包金角梳一把[2]。据墓志记载，墓主何杨氏，“因子有功，追封淑人”，洪武年间“以疾终”。

明鲁荒王朱檀夫妇墓位于山东邹县，分为前后两室。在后室中出土一个由纱布缝制的梳妆袋，内装铜镜、骨梳、骨篦、骨柄毛刷、银柄毛刷等物[3]。史载，明鲁荒王朱檀系太祖第十子，卒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王妃戈氏卒于正统五年〔1440 年〕。

轻巧秀雅的木竹类

木竹类梳篦，主要选用黄杨一类的木料和优质毛竹制成，材质细腻，柔韧坚实，轻巧秀丽。木竹的资源丰富，取材方便，又易于加工，故而应用广泛。根据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出土的木材鉴定报告，编号为 M514：3 的木梳和编号为 M483：14 的木篦，木材构造特征相同，均属于黄杨〔Buxus sp〕。

已知保存较好的最早木梳，发现于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葬 M147[4]，其年代大约距今 5000 年左右〔图 24〕。因年代久远，加之土壤中酸性与碱性物质的长期侵蚀，埋藏在地下的木竹制品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史前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的木质、竹质梳子发现得很少。

东周时期的木质梳篦，以西南的楚地发现的数量最多，在楚国周边的列国地区以及西北新疆一带，也有一定的发现。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 9 期。

〔2〕 李德文：《合肥明初何杨氏墓》，《文物研究》〔第四期〕黄山书社 1988 年。

〔3〕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 年 5 期。

〔4〕 徐新民等：《良渚文化最大的墓地——平湖庄桥坟》，《文物天地》2004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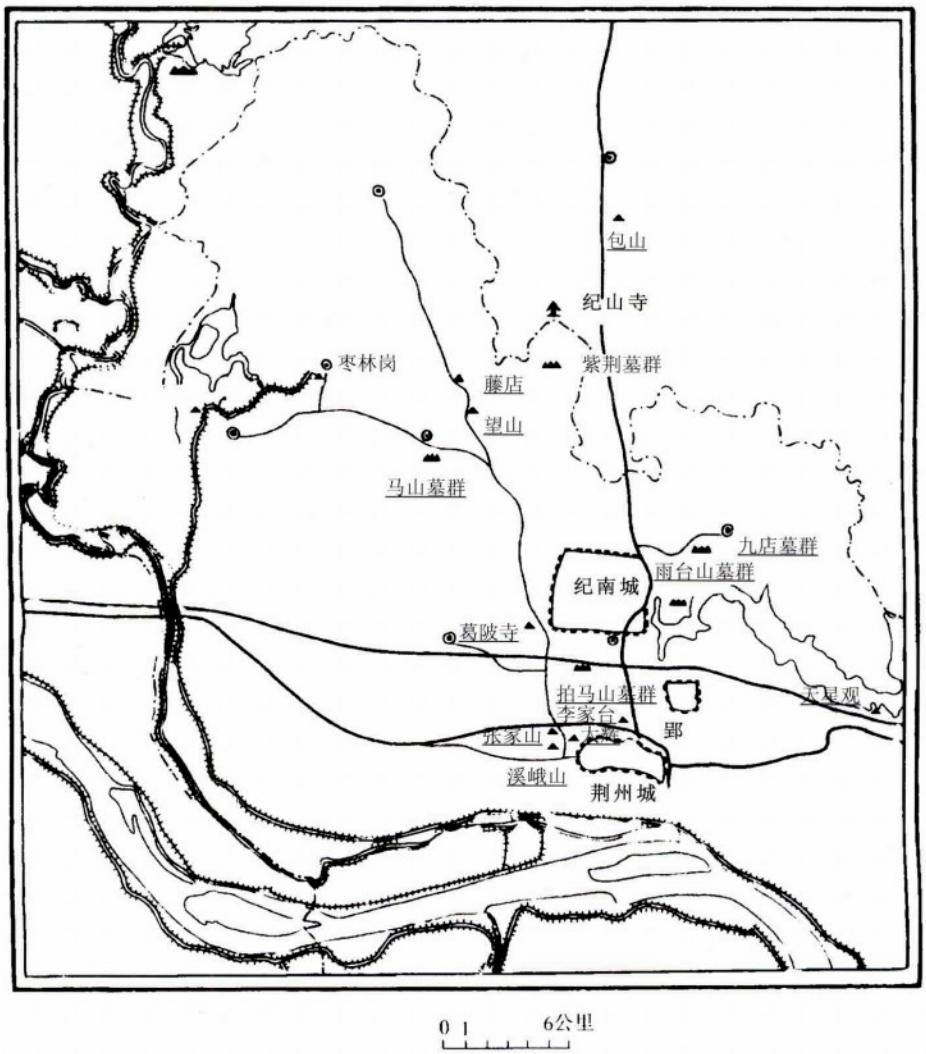


[图24] 木梳—浙江平湖庄桥坟M147出土

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是一座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楚国都城，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东迁于陈城之前，楚国在此建都长达 200 余年。自 1960 年以来，楚故都江陵纪南城的周边，已调查发现了大大小小的楚墓数千余座〔图 25〕。由于楚墓中采用了木炭和白膏泥封固等防腐措施，使大量的木、竹器得以保存下来。在比邻纪南城东城垣的江陵雨台山墓地，出土了共计 139 件木质梳篦〔图 26〕。在西南距楚故都纪南城 1.2 至 1.5 公里的江陵九店墓地，出土了木梳 57 件、木篦 42 件。在纪南城四周江陵及荆州一带的天星观、溪峨山、马山、葛陂寺、枣林岗、包山、望山、拍马山、李家台、太晖观、郭店等地点的楚墓中都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质梳篦。

长沙楚城地处湘中，为楚国南部最重要的城邑。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在长沙楚城周围的楚墓中，先后出土了木梳 34 件、木篦 22 件。

《战国策 · 楚四》记载："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



[图25] 湖北江陵纪南城周围出土梳篦的东周墓葬分布状况

上才、陈之地，襄王留掩于阳城。”根据文献考证，楚王城即今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带的城阳故城。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率大军攻破楚都郢城后，楚顷襄王逃至城阳避难，并以此为临时国都组织力量抗秦，后才迁至陈地。城阳故城，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要地。在该城西南 400 米处的山坡上，乃是著名的信阳长台关楚墓群[1]。20 世纪 50 年代，在此发掘了两座三椁两棺的大墓，M1 出土遗物共计 903 件，其中有一件木篦；M2 出土遗物共计 414 件，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其中有木梳三件、木篦两件〔图 27〕。

在湖北的襄阳、鄂城、云梦、黄州、潜江、枝江和湖南的桃源、临澧、慈利、常德与河南的正阳、叶县、固始等地的东周墓葬之中，也都出土了木质梳篦。这些墓葬的所在地，有的是楚国因军事设防或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建置的城邑，有的原为小诸侯国的都城，但被楚灭后改置为县。

曾国为姬姓侯国，但不见载于文献。自宋代以来，标明“曾侯”的钟、鼎及“曾中〔仲〕”的铺、壶、簋等青铜器，在湖北的安陆、京山、随县一带不断被发现，从铭文的内容可知为曾国贵族所制。1978 年曾侯乙墓的发掘，更进一步证明了今随县一带应为当时的曾国之所在[1]。曾侯乙墓位于随县城关镇西北郊的擂鼓墩附近，为一大型木椁墓，椁室内分东、西、北、中四室，主棺在东室，同室还有 8 具陪葬棺；西室另有陪葬棺 13 具。墓主为 45 岁左右的男性。陪葬者 21 人，均为 13 ～ 26 岁的女性。随葬品十分丰富，共计 15404 件，其中有 17 件木梳，这些木梳大都出自东室和西室的陪葬棺内。



[图26] 木梳—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

[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图27] 木梳、木篦—河南信阳楚墓M2出土

据《尚书·牧誓》记载，巴、蜀曾是周人的盟军，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役。巴的中心在今四川重庆一带，蜀的中心在今成都一带。1979年在四川青川县城郊发现了一处墓地，在M13中出土了一对绘彩的木梳、篦[1]。根据墓中出土的木牍等文字遗物，青川墓群的年代应相当于战国中期至晚期。2000年在四川成都市的商业街发现了一座大型多棺合葬墓，墓坑中共有17具木质葬具，在第2号、8号和10号三具“船形棺”中均出土了木质的梳篦。据研究，该墓葬很有可能是一处古蜀国王族的家族墓地，其年代属于战国早期偏晚[2]。

《左传》文公十二年有“群舒叛楚”的记载，群舒，偃姓，为舒蓼、舒庸、舒鸠、舒龙等的总称。群舒先曾服属于楚，后来反叛，故而才有楚“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的事件。公元前601至公元前548年，楚先后灭舒蓼、舒庸、舒鸠，于是群舒之地悉数并入楚的版图。群舒之宗国大体

[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1期。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11期。

在今安徽境内的淮水以南地区。在安徽潜山县公山岗和舒城县秦家桥等地发现的东周墓葬中，均出有木质梳篦，其年代应在战国晚期[1]。

山东沂南西岳庄发现一座多重棺椁的大墓，墓中出有木梳篦等珍贵文物〔图 28〕。沂南西岳庄一带，与文献中记载的莒国地望相合，故而有人推测墓主为莒地的小国诸侯[2]。

山西长治、长子一带，春秋时属晋，战国时称为“上党”，为韩、赵、魏三国的交错地带。长治市北城墙外，有一名曰“分水岭”的台地，分布着密集的东周墓葬[3]。20 世纪 70 年代，在编号为 M270 的墓葬中出土一件竹梳，由梳背与梳身两部分组成，该墓的年代被推定为春秋中晚期，这是目前已知保存较好的最早竹梳。长子县城附近有一东周城址，城址的西侧分布有墓地。20 世纪 70 年代，在此发掘清理了多座墓葬。规模最大的是 M7，墓主为一成年女性，葬具是重椁单棺。椁室内还有三具陪葬棺，当为殉人棺木。在墓主人的棺内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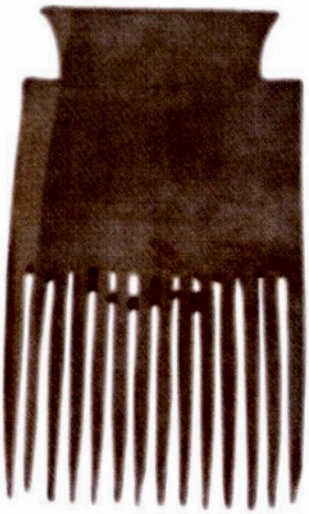


[图28] 木质梳篦—山东沂南西岳庄东周墓出土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公山岭战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 年 1 期。

〔2〕 刘延常等：《西岳庄大墓》，《文物天地》2004 年 6 期。

〔3〕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南工作组等：《长治分水岭 269、270 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 年 4 期。



[29-1]



[29-2]

[图29] 木梳
1. 新疆鄯善洋海一号墓地 M183：3
2. 新疆鄯善洋海一号墓地 M1001：1

号陪葬棺的头骨附近各出土一件木梳。根据墓中随葬的一组五件青铜列鼎，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应为士大夫的夫人，下葬的年代应属于战国时期。

新疆地区的古墓，虽然没有使用木炭和白膏泥等防腐措施，但是这里相对干燥的自然环境，却较好地保存下来了许多木器。两周时期的木梳，在鄯善、且末、哈密、和静等地皆有发现，尤以鄯善洋海墓群的出土数量最多。洋海墓群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的西南，地处火焰山南麓的荒漠戈壁滩上，分布于三块相对隔离的台地上，仅洋海一号墓地就已经出土了20件木梳〔图29〕。发掘者认为，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末至公元前1000年的前半期[①]。但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主要遗存的年代应相当于东周时期。

秦汉时期，木质的梳篦广泛见于全国各地，在山东的临沂、诸城，江苏的仪征、扬州〔包括安徽的天长〕一带，在湖北的江陵、荆州，湖南的长沙、沅陵，广东的广州等地，以及新疆的洛浦、且末、若羌一带，出土的数量较多。

① 新疆文物研究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1期。

山东临沂县城的南面有两个东西对峙的小山丘，当地称作金雀山和银雀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金雀山和银雀山一带陆续发掘了一批又一批汉墓[1]。1972年在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编号为M1、M2〕，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在这两座墓的木棺内，都发现了盛有梳妆用具的漆奁。M1的漆奁中内装木梳一件、木篦三件，M2的漆奁中内装木质的梳、篦各一件。1973年发掘的银雀山M4、1997年发掘的银雀山M8等墓葬，1978年发掘的金雀山M10和M11及M13和M14、1983年发掘的金雀山M34等墓葬，均出有木质的梳篦。

今山东诸城一带，西汉初期称东武，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所封东贞侯郭蒙的封国所在地。到了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改为琅琊郡。1985年在诸城县西郊的杨家庄发现一座木椁墓，椁室内东西并列两具木棺，推测为夫妇合葬。在男棺的头端附近出有漆器、一堆黑发，以及木质梳、篦各两件；在女棺的头端也有黑发和三子漆奁盒，奁盒内盛装有梳二、篦一，还有毛刷和铜镜等物。据研究，该墓可能是西汉东武故城琅琊郡的统治者或其亲属的墓葬。

江苏的仪征、扬州及安徽的天长一带，是汉代广陵郡〔国〕、江都郡〔国〕的所在，这里发现的汉墓亦较多。1985年发掘的仪征烟袋山M1是一座大型木椁墓，葬具为“正藏”〔内椁〕、“外藏”〔外椁〕及并列的双棺，属于男女合葬。当时“正藏”和“外藏”的葬具设施，只有诸侯王、列侯这种有食邑的高爵级和皇帝才能享用。因而发掘者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可能与江都国和广陵国的皇族有关。该墓虽早年被盗，仍出土遗物400余件，其中有木质的梳篦三件[2]。1990年在仪征张集乡发掘了四座土坑墓，葬具均一椁一棺，墓主人皆女性。这四座墓按照规模的大小，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成一行。除规模最小的M4外，其他三座墓各随葬木质梳篦一对，其放置方式完全相同，均盛装于四子奁中的马蹄形小盒之内。鉴于这四座墓排列有序，随葬品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漆木器上还有“中厨”、“外厨”、“王”等刻文，推测墓

〔1〕 山东省博物馆等：《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考古》1975年6期；临沂市博物馆：《金雀山周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1期；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11期。

〔2〕 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4期。



[图30] 七子奁—江苏邗江甘泉姚庄M101汉墓出土

主人可能是西汉王陵的妻妾[1]。

在安徽天长县城关镇的三角圩也发现一处古墓地，M1 是该墓地中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夫妇合葬墓。墓内出土一件圆形双层银扣奁，全器由盖、身、中层盒三部分组成。中层盒被分隔成固定的三个小梳篦盒，分别盛装木质梳与篦。由墓内出土的“桓平之印”、“广陵宦谒”等印章得知，墓男主人名桓平，为西汉广陵国王刘胥身边的近臣[2]。

江苏扬州地区出土漆木器的数量相当之多，仅邗江姚庄 M101 出土的漆器就达 131 件。姚庄 M101 是一座夫妇合葬的木椁墓，头箱中出土木梳二件，木篦三件；女棺中出土木质梳篦六件；女棺和男棺中还各出土七子银釦嵌玛瑙漆奁一件〔图 30〕，奁内都有马蹄形梳篦盒，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晚期[3]。另外，扬州东风砖厂、扬州市西郊、邗江胡场、仪征胥浦等地的汉墓中，皆出有木质的梳篦，伴出的还有铜镜、铜柄刷等梳妆用具。

20 世纪 70 年代在湖北云梦县以西的睡虎地、大坟头、木匠坟一带，先后清理出为数众多的秦汉墓，这些墓葬大都随葬有木质的梳篦。睡虎地 M44 是一长方形木椁墓，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品主要置于头箱中，棺内较少，在

〈1〉 南京博物院等：《仪征张家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 年 4 期。

〈2〉 尤振尧：《江苏汉代诸侯王国、侯国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南京博物院建院 60 周年纪年文集》，1992 年。

〈3〉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 101 号西汉墓》，《文物》1988 年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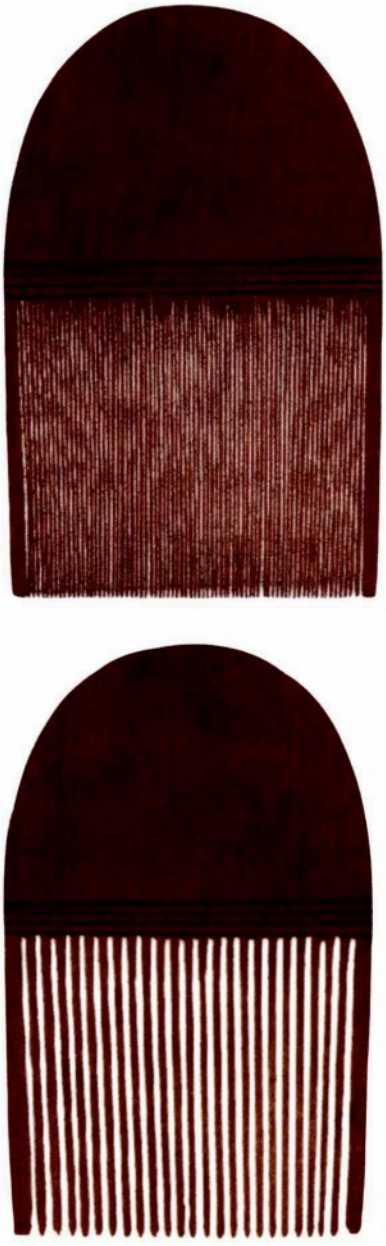
人骨架右肩侧放圆形漆奁一件，奁内盛铜镜、梳、篦各一件。睡虎地M47也是一座长方形土坑木椁墓，葬具一椁一棺，墓中出土梳一、篦二件〔图31〕，其中一件梳背上浮雕花纹，一面为一匹奔马，另一面为正吞食的怪兽，马和怪兽的头均作鸟头状。关于这批墓葬的族属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秦人墓地，另一是楚人之墓[1]。这批墓葬的年代，大体为秦代至西汉早期。

湖北楚故都纪南城的周围，除了东周墓以外，还分布着许多秦汉墓。江陵凤凰山秦汉墓地就座落在楚故都纪南城的东南隅，M168是该墓地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墓主系男性，年龄60岁左右。随葬品中有木质的梳、篦各两件，其中一对梳篦置于圆形漆奁之内，伴出的有铜镜、竹签、竹片等物。据墓中出土的竹简记述，墓主人的身份为五大夫，在汉代属于有食邑的官爵。荆州高台墓地位于楚故都纪南城的东墙外100米之处，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在这里发掘出10余件木梳和木篦。在荆州周家台、江陵张家山等处秦汉墓地中也都发现过木质的梳篦。



[图31] 木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M47出土

[1] 湖北省博物馆：《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2期。



[图32] 木梳、木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M1出土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M1的北边箱中出土一件九子漆奁和一件五子漆奁，在M3的北椁室中出土一件双层六子漆奁，这些漆奁中皆放置有木梳、木篦及镜、刀、刷等梳妆用具〔图32〕。据研究，长沙马王堆M3的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而长沙马王堆M1的墓主应死于汉文帝十二年以后数年。

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沅陵虎溪山发掘了一座大型古墓，编号为虎溪山M1[1]。墓内随葬品500余件，其中包括多件木质的梳篦〔图33〕。据竹简的记述得知，墓主吴阳，系西汉长沙王之子，为第一代沅陵侯，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死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

1953年至1960年，在广东广州的市区和近郊发掘了一批两汉时期的墓葬[2]。M1134是一座西汉前期的土坑木椁墓，葬具一椁两棺，在椁室中出土了木梳五件、木篦四件。在M4013等东汉前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木梳、漆篦，伴出的还有铜镜、铜柄毛刷等物。

〔1〕 郭新民：《弥足珍贵的沅陵侯墓——虎溪山一号汉墓》，《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文物出版社2002年。

〔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996 年在新疆且末一号墓地第二期文化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 32 件木梳，在二号墓地也出土了多件木梳，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

新疆洛浦县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绿洲，地处古代于阗国居民的主要活动地域。1983 年至 1992 年，考古人员曾经先后三次对洛浦县山普拉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进行发掘，这里已经出土了 30 余件木质的梳篦〔图 34〕。该墓群的年代，大体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相当于两汉时期，晚期相当于魏晋时期[1]。

古代楼兰，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1980 年在新疆若羌楼兰古城内的遗址中出土了两件木梳，在城外的古墓地也出土了多件木质的梳篦，有的涂漆绘彩〔图 35〕，其年代大体相当于东汉时期[2]。

地处新疆尉犁县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的营盘墓地，东距楼兰故城约 200 公里，地处史籍中所载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山国〔亦称墨山国〕境内。1989 年清理的 M5、1995 年发



[图 33] 木质梳篦—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M1出土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 7 期。



[34-1]



[34-2]



[34-3]

[图34] 木梳、木篦
1. 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 84M48：1
2. 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 84M49：24
3. 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 84M01：39



[图35] 彩绘漆梳—新疆楼兰古城出土

掘的M19、1999年发掘的M7等墓葬，皆出有木梳[1]。1995年发掘的M19是一座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2.4米、宽0.54米。内葬一人，成年男性，半圆形槽状棺倒扣在死者身上。死者的头侧放有一团乱发，其上摆放木梳、篦各一件〔图36〕该墓地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木质梳篦，多见于江苏南京、江西南昌、甘肃敦煌等地，在新疆民丰、吐鲁番一带的发现也较多。

江苏南京近郊是两晋墓葬最为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半因古墓调查》，《文物》1994年10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6期。



[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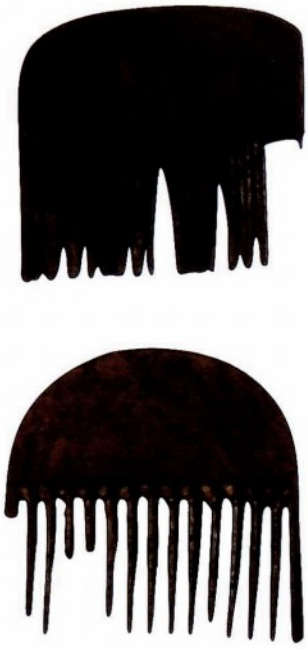
[36-2]

[图36] 木梳、木篦的出土状况
1. 新疆尉犁营盘 M19（上层：木梳）
2. 新疆尉犁营盘 M19（下层：木篦）

集中的的地方，在此聚族而葬的多为帝王之家或世家大族。1998 年在南京东郊仙鹤门外的仙鹤山一带，清理发掘了多座砖室墓，在 M2 和 M6 中都出有木质梳子。由墓志得知，M2 的墓主为高崧和夫人谢氏。高崧其人，《晋书》有传，《世说新语》、《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等文献有载。据记载，高崧，字茂琰，葬于泰和元年〔366 年〕，生前曾任侍中等显要官职，与墓志所记相合[1]。

今江西南昌市一带，也是东吴、东晋的墓葬较为集中的地方。在南昌市内

[1]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 年 3 期。



[图37] 木质梳篦—江西南昌火车站晋墓M3出土

阳明路中端南侧，发现一座前、后两室的砖室墓，为一夫二妻合葬。墓中出土随葬品百余件，其中木梳六件，置于棺内的木盒或漆奁之中。据木方上的墨书文字得知，墓主人高荣，原籍为沛国〔郡〕相县人，其身份应相当于东吴的高级官吏[1]。1999 年在南昌火车站前广场北侧发掘的M3和M5，均出有木质的梳篦〔图 37〕。从墓中随葬的墨书木方和印章得知，M3 的墓主为雷陔夫妇，其下葬的年代为东晋永和八年，即公元 352 年。据《太平寰宇记》所载，“豫章郡五姓：熊、罗、雷、湛、章”。由此可知，雷姓在晋时的南昌应为大族[2]。

甘肃敦煌市七里镇西北的祁家湾发现一处古墓地，这里共出土五件木梳，出自四座墓葬。其中三座墓单人墓各出一件木梳，死者皆女性；另一座墓男女合葬，出土两件木梳。该墓地的年代，属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3]。

据《魏略 · 西戎传》记载，古丝绸之路南道的“且末、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两

〈1〉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地发掘》，《考古》1980 年 3 期。

〈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 2 期。

〈3〉 甘肃省文物研究所：《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94 年。

《唐书 · 地理志》收录的贾耽《四夷道里记》中也提到精绝国："于闐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据考证，古代的精绝国，大体位于今新疆民丰的尼雅一带。1995年在新疆民丰县以北100公里处的尼雅一号墓地发掘了多座古墓，其中M1、M3、M4、M5和M8，均出土了木质的梳篦〔图38〕。出土时，这些梳篦往往被置于用锦质或毛毡缝合的栉袋之中。该墓地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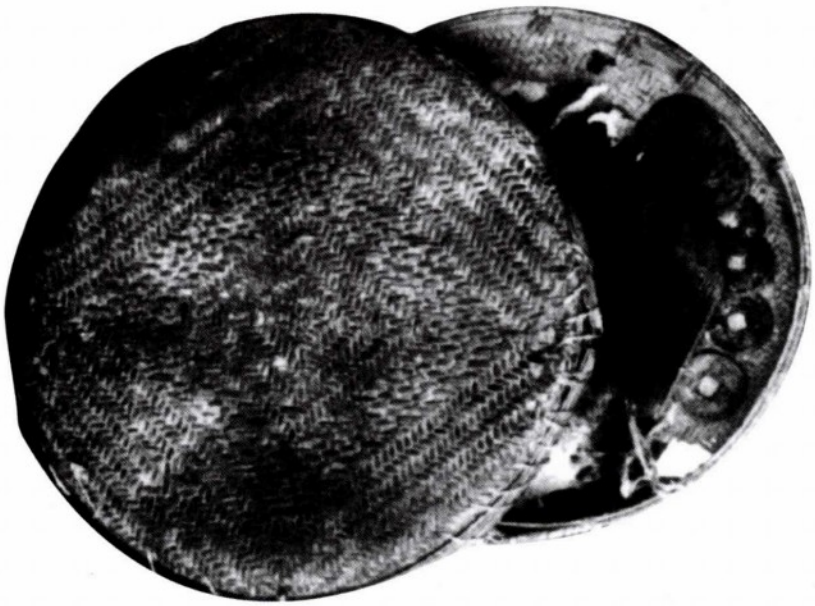
20世纪50至6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以东40余公里处的阿斯塔那古墓地清理了多座墓葬，其中具有纪年的墓葬，如"泰始九年"〔273年〕的66M53和"和平元年"〔551年〕的59M303等，均出有木质的梳篦[2]。1979年清理的编号为79TAM383的墓葬，是一座斜坡墓道洞室墓，内葬一成年女性，出土木梳一件。据墓中出土的衣物疏记述，墓主为北凉的奠基者沮渠蒙逊的夫人彭氏，下葬于公元459年。



[图38] 木质梳篦—新疆民丰尼雅一号墓地M4出土

(1)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1999年编辑发行。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0期。



[图39] 木梳的出土状况—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

隋唐时期的木质梳篦，主要见于新疆地区。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是晋至唐〔3～8世纪〕时期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埋葬地。隋唐时期，这里埋葬的主要是高昌郡至唐西州时期居住在高昌城及其附近的达官显贵。

1915年英国人斯坦因在这里盗掘了40座墓葬，其中有六座墓各发现一件木梳，出土时Miii.2和Mix.2的木梳盛于圆形竹藤或漆木奁内〔图39〕，而Miii.3的木梳置于女尸头部[1]。

1960至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地进行了11次发掘，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麴氏高昌时期〔6世纪～640年〕至唐西州时期〔640年～8世纪〕的古墓。这些墓葬中随葬的木器数量较多，尤以梳、鸭、握木最为常见。

在新疆焉耆锡科沁西北的唐王城、轮台县西北的喀拉克尔琴沟等地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也曾出土过木梳[2]。

〈1〉 新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考古学集刊》〈12〉1999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

五代时期的木竹梳篦，保存较好者，见于湖北武昌、江苏海州、安徽合肥等地。

1996年在武汉市武昌阅马厂一带发现两座古墓，编号为M1、M2。M1系成年男性，M2系成年女性，两墓相距两米，为异穴夫妇合葬[1]。在男、女墓主的头上方各出土一件木梳，形制相同，均呈半圆形。据M1随葬的买地券得知，墓主姓王，下葬于928年。

1956年在江苏海州东门外发现一座五代墓葬，内葬一人。死者头旁出土一件瓷奁，奁中放置木梳大小四件，木篦一件[2]。据墓志，墓主为海州刺史赵思虔夫人太原县王氏，下葬于五代吴大和五年〔933年〕。

1956年在合肥西郊发现一座砖室墓，前后两室。棺内葬一人，死者头端棺内一角放置木梳一件，骨架中部放置铜镜一面，镜下盖有竹篦一件[3]。据伴出的钗、步摇等金银首饰推测，墓主应为女性，从一块墨书木质买地券得知，其下葬的年代为南唐保大四年〔946年〕。

辽金时期的木梳，保存较好者，见于河北省张家口和内蒙古和林县等地。

河北张家口宣化下八里村辽代墓群中M7出有木梳两件，伴出的还有漆筷、漆匕，以及木桌、椅、衣架、镜架等木器，据墓志的记载，墓主系“大辽归化州清河郡张文藻”，死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改葬于此。

1973年在山西大同发现一座金代墓葬，出土木梳、骨刷、漆盒等，墓主阎德源，为一老年男性，系金代“西京玉虎观宗主大师”，下葬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4]。

在内蒙古和林县东北约15公里处发现一座金代砖室墓，墓中出有木梳、银发钗等物[5]。

宋代的木竹梳篦，在山西、安徽、江苏、江西等地皆有发现。

山西太原西郊小井峪一带发现多座北宋墓，M68中葬一成年人和一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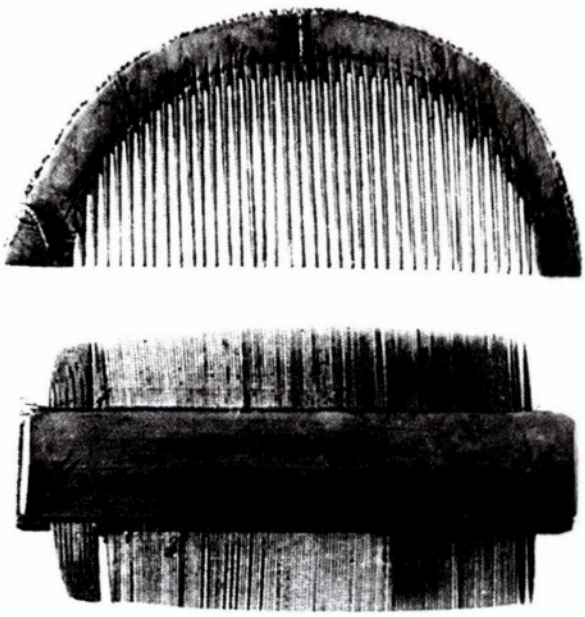
〔1〕武汉市博物馆：《阅马场五代吴国墓》，《江汉考古》1998年3期。

〔2〕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五代——吴大和五年墓清理记》，《文物》1957年3期。

〔3〕石谷风等：《合肥西郊南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58年3期。

〔4〕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4期。

〔5〕崔利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一座金墓》，《考古》1993年12期。



[图40] 木梳、竹篦—江苏武进村前宋墓M5出土

孩，可能是亲子合葬[1]。墓内出有木梳两件，皆半圆形，以硬木镂雕而成。

1985 年在安徽合肥郊区清理了一座古墓，内置两棺，男女合葬。男棺出土木梳一件，女棺出土一件漆奁，盛装木梳三件，其中两件梳子的梳背用金箔包镶，金箔的两端为四叶纹，中间九行团状花卉，采用了模压拍打的装饰技艺。据墓志的记载，墓主马绍庭夫妇，为北宋望族马亮和吕蒙正后裔，下葬于北宋末年[2]。

江苏金坛县茅麓发现一座南宋墓葬，墓中出土漆盒一件，盒内盛木梳、竹篦各一，伴出的有砚盒、毛笔等物[3]。

在江苏武进村前乡蒋塘村先后发现六座排列有序的古墓，皆出有木质梳篦〔图 40〕。梳体呈半圆形，有的梳背镶嵌珍珠，有的梳背包镶金箔。篦子形制近椭圆形，上下都有细齿。这些梳篦，往往被盛装于奁、箱之中。据 M5 出土的“乾道八年”〔1172 年〕铜镜和“嘉泰通宝”〔1201 ～ 1204 年〕铜

(1) 解希恭：《太原小井峪宋、明墓第一次发掘记》，《考古》1963 年 5 期。

(2)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 年 3 期。

(3) 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南宋周瑀》，《考古学报》1977 年 1 期。



[图41] 木梳—江苏淮安宋沈氏墓出土

钱等遗物推测，这是一处北宋徽宗宣和〔1119 ～ 1125 年〕至南宋理宗淳祐〔1241 ～ 1252 年〕时期的家族墓地[1]。

江苏无锡、淮安等地的宋墓，亦往往出土木质的梳篦，伴出有漆奁、镜盒、金耳饰等物〔图 41〕。

1988 年在江西德安桃源山发现一座宋墓，内置漆木棺，葬一女性。死者的尸体保存完好，发型十分整齐，梳高髻盘结于头顶，上插金钗四枚，银钗三枚，两鬓和后脑各戴两把木梳，头戴金丝彩冠，额中部有半圆形铜头饰。尸体的旁放有银奁一件，内装铁镜、装粉盒、木梳、纸梳、纸篦、竹刀、刷等物。其中木梳三件，一大两小。据墓志得知，墓主周氏，为隆兴府武宁人，曾被封为安人〔安人为宋代命妇的封号〕，咸淳十年〔1274 年〕“以疾卒于江州”[2]。

元代的木梳，保存较好者，见于内蒙古正兰旗、浙江海宁等地。

在内蒙古正兰旗元上都城址东南的砧子山西区发现一处元代墓群，M70 为一座夫妇合葬墓，在女性一侧的头部出有漆盒，内装木梳、铜耳勺

[1] 陈晶等：《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 年 3 期。

[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 年 9 期。



[图42] 木梳—上海松江明墓出土

等物[1]。

浙江海宁袁化乡清理一座元代墓葬，内葬一人，男性。墓中出木梳一件，半圆形。据墓志得知，墓主姓贾名椿，海宁黄冈人，卒于至正十年〔1350年〕[2]。

明代的木竹梳篦，主要发现于北京、上海、江苏、江西、广东、四川等地。

北京明定陵出土过竹木的梳篦。在明孝瑞后的棺内发现一件圆形漆盒，盒内盛装金盂、金罐、金粉盒、木梳、竹篦和小刷子等梳妆用品[3]。

上海是明代墓葬发现较多的地方，据报道的资料，在卢湾潘允徵夫妇墓、卢湾潘惠夫妇墓、市郊张永馨道士墓、宝山县朱守城夫妇墓、浦东陆氏家族墓地[4]，以及上海松江的明墓之中，皆出有木质的梳篦〔图42〕。

PDG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元上都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9期。

〈2〉 海宁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2期。

〈3〉 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1958年7期。

〈4〉 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考古》1985年6期。

江苏无锡甘露乡彩桥村曾发现一座明墓，分为左、右两室。据墓志，左室墓主华师伊，右室墓主张氏，其下葬的年代为崇祯二年〔1629年〕。左室出土木梳两件，大小相同，梳齿较细密，伴出有毛笔、端砚、印章等文房用品。右室出土木梳三件，大小相同，齿较稀疏，伴出有毛刷、银粉盒等[1]。

江苏无锡惠山也发现一座明墓，为一座男女合葬的双室墓。男性死者的头上方出土木梳、木柄刷子、银耳挖、铜镜等物，其下有木盒残迹；女性死者的头旁出有木梳、木柄刷子等，其下也有木盒残迹。据墓志记载，墓主姓周，曾任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詹事，死于1586年；其妻赵氏，死于1600年[2]。

江西南城发现多座明亲王墓，在明益定王朱由木夫妇墓和明益宣王朱翊引夫妇墓中，都出有木梳[3]。

江西广丰县明“奉直大夫、象州刺史”郑云梅的墓中，也出土木梳，伴出的还有毛笔、墨、砚等文房用品[4]。

广州市东山梅花村清理一座明墓，内葬男女二人。男性死者的左手旁放置一褐色麻布袋，内装两把黄杨木梳，一大一小；女性死者的手旁也放置一口袋，内装木梳两把，大小各一。据墓志得知，墓主系明南京工部尚书南海县人戴缙及夫人周氏，下葬于明弘治至正德年间[5]。

四川珙县洛表的螃蟹溪两岸全是石灰岩，由于地下水的长期浸蚀和溶解，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天然溶洞。在这些溶洞之中发现了大量的悬棺，1974年曾经清理了邓家岩和其斜对面白马洞两个地点的10具悬棺。在邓家岩TM5的女性悬棺中出土一件木梳，半圆形，梳背上镶嵌七个方形和三角形的小铜片，齿17枚。根据白马洞BM1和BM2两具悬棺中出土的青花瓷器，调查者将邓家岩TM5的年代推定为明代[6]。

[1]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明华伊师夫妇墓》，《文物》1989年7期。

[2] 金琦：《无锡惠山发现明代夫妇合葬墓》，《考古》1956年3期。

[3]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引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8期。

[4] 秦光杰等：《江西广丰发掘明郑云梅墓》，《考古》1965年6期。

[5] 黄文宽：《戴缙夫妇墓清理简报》，《考古学报》1957年3期。

[6]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6期。

温润光泽的玉石类

玉石类的梳篦，多采用白色、黄色、绿色的玉石制成，品质优良，晶莹剔透，素雅恬淡。玉石器具的加工虽不易，但其质地坚实、色泽美观等自然属性，深受人们所喜爱，加之玉器在我国古代通常被赋予了各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玉质的梳篦更显珍贵。

玉石类梳篦，大致可分为单体式和分体式两种：单体式，即全部由玉石一种材料制作而成的；分体式，则是由玉与骨〔牙角〕等两种不同的材料加工并组合而成的，如玉背饰象牙梳、玉背角篦等。不过，由于埋藏环境的影响，出土时骨牙角〔包括竹木在内〕的梳身往往朽蚀殆尽，因而通常只剩下了不易腐烂的玉石梳背饰或玉石栉背。



[图43] 石梳—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

史前时期单体的玉石梳子，主要发现于山西襄汾陶寺墓地[①]。据报道，陶寺墓地已出土了一件玉梳和三件石梳〔图 43〕，而出土这些玉石梳篦的墓葬，大都属于陶寺遗址中晚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 — 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1 期。

的遗存，其年代大体在距今 4500 至 4300 年之间。

史前时期保存最完整的玉背饰象牙梳，仅见于浙江海盐周家浜 M30，系由玉梳背饰和象牙梳身两部分镶嵌组合而成的[1]。其中玉质梳背饰，素面，形如“冠状饰”，顶宽 6.4 厘米，嵌于象牙梳背的顶端，并用两枚横向销钉加以固定；象牙梳身，上部阴线细刻着席纹和云雷纹的组合纹样，下有参差不齐的梳齿 6 枚，整个梳子通高 10.8 厘米。该墓葬属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其年代大体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图 44〕。

良渚文化的玉质梳背饰，一般为扁平体，上大下小，形近倒梯形，下沿皆有扁榫，并钻有 1 ～ 5 个小穿孔，以便于固定在有机质地的梳子上端。这种玉饰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地区的江苏武进、吴县、常熟，上海青浦，以及浙江的余杭、嘉兴、海盐、桐乡等地。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玉饰，但对其用途却一直未能辨明，因而将其称为“垂幛形饰”、“佩饰”、“冠状饰”等。直到 1999 年海盐周家浜 M30 那件玉



〔图44〕玉背饰象牙梳—浙江海盐周家浜M30出土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嘉湖平原史前文化考古》，《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45-1]



[45-2]

[图45] 玉梳背饰
1. 浙江瑶山 M11 出土
2. 浙江桐乡新地里 M6 出土
3. 浙江海盐龙潭港 M9 出土



[45-3]

背饰象牙梳发现以后，才使人们走出了迷雾，终于认清了玉质梳背饰的本来面目。良渚文化的玉质梳背饰，可谓最具有特色的器具之一〔图 45〕。据不完全统计，其出土的数量已经多达 50 余件。这种玉质背饰不仅遍及长江下



[图46] 玉梳背饰-辽宁建平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M12出土

游三角洲地区，其向北的分布范围，一直到达黄河下游地区的南缘。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 M42 所出土的玉质梳背饰，就是良渚文化向北扩张或渗透的明证。良渚文化的玉质梳背饰，造型规范，制作精细，业已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发展态势。

基于良渚文化玉质梳背饰的研究，笔者曾把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兔饰”、“玉冠饰”、“刻纹玉饰”认定为玉质梳背饰，同时还将建平牛河梁、凌原三官甸子、巴林右旗那斯台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出土“三孔器”，也推定为玉质梳背饰〔图 46 〕。这样看来，史前时期的玉质梳背饰，在苏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等遗存中也有分布。

商代的玉梳，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所出的最为精美。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两件玉梳，一件背脊的中央有一长条形小突，梳背的两面均雕刻着兽面纹图案；另一件背脊上端雕出两只对立的鹦鹉，梳身近风字形，下有扁宽的梳齿〔图 47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的年代，目前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墓主人妇好是武丁的配偶，年代属于殷墟二期；另一种则认为妇好是康丁的配偶，年代属于殷墟四期。尽管如此，妇好墓的主人作为商后期的王室成员，应是不争的事实。

东周时期的玉梳，见于楚、曾、中山国等地的大墓之中。

《史记 · 楚世家》记载，周文王时，鬻熊子事文王，其子为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



[图47] 玉梳—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绎于楚蛮，封以之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丹阳为楚最早的都城，也是西周时期楚文化的中心。关于楚都丹阳的地望，众说纷纭，分歧较大。有一种说法，认为楚都丹阳应在丹淅之会，即今河南淅川下龙城一带。龙城遗址西临丹江，而丹江西岸的丘陵地带又为楚国贵族的墓地。楚人有死後归葬故都的习惯，这里所发现的春秋时期楚国的王族墓群，很可能就与“归葬”楚都丹阳的这种习俗有关。在已清理发掘的淅川下寺楚墓之中，唯有规模最大的M1出土一件玉梳[1]。M1为一座大型土坑墓，葬具一椁二棺，随葬品主要为青铜器和玉器，数量共计449件。出土时，玉梳置于墓室近中部木棺之北，与玉玦、玉笄和玉牌伴出。从墓葬的布局和形制结构来看，M1与M2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据研究，M2的墓主人为楚令尹子庚，即王子午。《左传》记述，王子午楚共王时为司马，楚康王二年为令尹，死于楚康王八年，时为公元前552年；M1出土一件青铜缶，其上的铭文为“孟滕姬择其吉金，自作浴缶，永保用之”。孟为大意，滕为国名，姬为姓。从该墓随葬品的种类来看，墓主人应为女性，这也与孟滕姬相合，其下葬的年代当在春秋晚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一件玉梳，器体扁平，上小下大，略呈梯形，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梳背两面阴刻云纹和斜线纹，上端的中间穿一小孔，下端有 23 枚梳齿。出土时，玉梳位于墓主人的头下。曾侯乙其人，虽于史无征，然而从用鼎制度来看，非曾国的国君莫属。其下葬的年代，约为在公元前 433 年至公元前 400 年之间。

据文献记载，一支姬姓白狄，于春秋时立国，先称鲜虞，后称中山。中山国位于东阳之地〔即太行山东侧〕，其地当燕、赵之间，属于“千乘”小国。灵寿城址，为战国时期中山国之都，地处今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在该城址的内外，发现了多处中山国的墓地。中山王厝的陵墓，就位于城西 2 公里的高地上[1]。该墓的坟丘上有飨堂类建筑遗迹，墓室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规模较大，夯筑而成；地下部分，包括椁室和放置器物的三个库室，在西库中出土了两件玉梳。一件青玉制，梳体较长，背部透雕双螭纹〔图 48〕；另一件黄玉制，梳背呈半圆形，上面透雕双凤纹。据考证，墓主厝为中山国第五世王，死于公元前 313 年，时年 31 岁。



[图48] 玉梳—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今山西长治一带，春秋时属晋，战国时为韩、赵、魏三国的交错地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图49] 玉梳—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出土

带。长治市北城墙外，有一台地名曰“分水岭”。20 世纪 50 年代，在这里发掘了 12 座墓葬。其中 M14 为一大型木椁墓，随葬品多达 1005 件。随葬品中有玉梳一件，以白玉为料，置于近椁的东北处，但人骨、葬式，早已无遗痕可稽。从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来看，墓主的身份无疑应为高级贵族。该墓的年代，属于战国早期。1972 年在分水岭东周墓还出土一件玉梳，长 6.3 厘米、宽 4.3 厘米，梳背上刻有云纹，中央为一大孔，其年代应属于战国时期〔图 49〕。

唐、五代时期的玉石梳篦，以分体式为主。这一时期的玉石栉背，主要发现于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南伊川、陕西西安、浙江临安等地。

1976 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宝拉格乡赛胡同发现一座单室砖墓，尸床上陈放四具人骨，经鉴定为一男三女[①]。该墓的发掘简报介绍，墓内出土一件玉佩，“似梳状，上端弓背形花式边，下边略呈直线，下方侧面有凹槽，用于镶嵌。正面沿花边以下平均排列针眼状穿孔 17 个，中刻芙蕖三朵，两旁刻雌雄鸳鸯，均作展翅欲飞之状”。从

① 张郁：《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



[50-1]

[图50] 玉栉背
1. 陕西西安南郊唐墓出土
2. 陕西西安郊区唐墓出土



[50-2]

其形制来看，应为玉栉背无疑。据墓志的记述，墓内埋葬的是王逆修及其两位夫人和一婢女。王逆修生前任天德军州都马步都虞侯、监察御史等官职，卒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4年〕。

河南伊川县城西北10公里的鸦岭乡杜沟村，发现一座唐墓。由于被盗扰，人骨散乱于棺椁内外，随葬品物1600余件。其中栉背五件，玉质两件，琥珀两件，水晶一件。据墓志记载，墓主齐国太夫人濮阳吴氏，系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母，王士真之妻，卒于824年，享年61岁。王承宗、王士真，两《唐书》均有传。王氏家族在晚唐地位显赫，齐国太夫人吴氏的身份也非同一般[1]。

陕西西安市郊一带是唐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历年来已经发现了多座墓葬，不少墓中出有玉石栉背〔图50〕[2]。1999年在陕西西安西北郊枣园清理的M17和M6两座唐中，各出土一件栉背。M17随葬一件滑石栉背，半圆形，两面雕花，图案为三朵花下衬有宽肥叶片，伴出的还有铜眉夹等物。M6也

〈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11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枣园唐墓清理简报》，《文博》2001年2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南郊茅坡村发现一座唐墓》，《文物》2004年9期。



[图51] 琉璃栉背—陕西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

是单人葬，随葬一件玉栉背，乳白色，质地细密，两面雕花，形制与图案与M17的滑石栉背雷同。枣园一带以往发现过多座唐代宫女墓葬，这两座墓或许也是宫女的墓葬，年代属于晚唐时期。2000年在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过一件琉璃栉背[1]，半圆形，其上琢刻有花纹，高2厘米、宽6.1厘米〔图51〕。2001年在陕西西安南郊茅村发现一座唐墓，编号为M13～1。墓中出土两件玉梳背，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别。依据伴出的玩具推测，墓主可能是一未成年的女性，墓葬的年代属于晚唐时期。

1980年在浙江临安县城西的明堂山发现了一座古墓，编号为M24。该墓为砖室结构，有前后两室和多个耳室。棺木置于后室，内葬一人，死者的一侧出有玉背角篦一件，玉背呈半圆形，两面刻花。出土时，这件玉背角篦上还斜叉着一支刻花鎏金银钗。据墓志和相关文献记载，墓主河南水邱氏，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钱鏐之母，卒于晚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葬于锦南乡[2]。

1996年在临安玲珑镇康陵出土一件玉栉背[3]，呈半圆形，白玉制成，玉质莹润，两面均刻有一对相向而立的鸳鸯，腹下饰一组如意纹〔图52〕。康陵系五代吴越国君钱元瓘之妻马氏的陵墓，下葬的年代为后晋天福四年〔939年〕。

五代时期的玛瑙梳子，只见于河北曲阳。河北曲阳县西燕川村发现一座壁画墓，墓室包括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及后室。因多次被盗，扰乱严重，所剩随葬品寥寥无几，且残碎不全。墓中清理出玛瑙梳残片一件，梳背较宽，

〈1〉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寻觅散落的瑰宝》，三秦出版社2001年。

〈2〉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

〈3〉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文物精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图52] 玉栉背—浙江临安五代康陵出土



[图53] 玉梳—江苏南京江宁镇建中村南宋墓出土

呈月牙状，梳齿较为细密。根据墓志的记载，墓主王处直死于923年，与其三个妻妾并葬于此[1]。王处直其人，《旧唐书》、《旧五代史》有传，生前为义武军节度使，是当时河北境内有名的藩镇势力之一。

宋代的玉梳，出土地点明确的见于江苏南京。2004年1月在南京市郊江宁镇建中村发现一座大型砖石结构的古墓。该墓由并列的两个长方形墓室构成，南侧的墓室中放置一具木质棺椁，内葬一老年女性，棺内出土文物约800件，其中就有玉梳和牙质角梳[2]。玉梳呈半圆形，梳背透雕花纹〔图53〕，雕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建中村南宋墓》，《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

琢工艺十分精湛〔图 81〕。根据墓中出土的铭文砖，墓主下葬于“大宋绍兴二十五年”，即 1156 年。

明代的玉梳，出土地点明确的见于山东莒县。1980 年山东莒县于家庄出土一件玉梳，白色，体扁平，通长 11.5 厘米。梳身呈半圆形，一侧有梳柄，梳柄弯曲上翘，作回首的夔龙状，梳齿 22 枚[1]。

灼灼生辉的金属类



〔图 54〕铜梳—山西石楼义牒出土

金属类的梳篦，多采用铜、金、银、铅等材料制成，坚固厚重，端庄高雅，熠熠闪光。金属制品，表面光洁，持久耐用，因而普遍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类梳篦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全部由同一种金属材料制作加工而成的；另一种则由金属与木或骨角等两种不同的材料制作加工并组合而成的，如金背木梳、金背角梳等。然而，由于木和骨角等有机质梳身往往易朽，出土时通常只保留下了不易腐烂的金属栉背部分。

商周时期的金属梳子，发现于山西石楼、陕西宝鸡、甘肃永昌、吉林永吉、贵州赫章等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山西石楼义牒[2]曾

[1] 刘云涛等：《莒县博物馆馆藏古代玉器》，《文物春秋》2000 年 2 期。

[2]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74 年 4 期。

出土一件铜梳，其顶部两端各有一鸟，梳背上饰有云雷纹〔图 54〕。与铜梳伴出的铜器有觚、爵、戈、刀、锛、凿等多达 13 件，还有玉片、贝、陶罐，以及人骨，这些器物应当属于墓葬的随葬品。山西石楼一带屡有青铜器发现，已知的出土地点就有十余处，这一地区的青铜器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目。据研究，石楼义牒这批青铜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时期。石楼义牒出土的这件铜梳，乃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金属梳子。

豳国，为西周时期畿内的重要方国之一，但史籍失载。1974 至 1981 年在陕西宝鸡渭水两岸的茹家沟、竹园沟、纸坊头三处墓地发掘了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得知，这几处墓地与豳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考古调查的资料表明，豳国的中心区域应在渭水以南、清姜河两岸的台地。竹园沟墓地位于清姜河东岸，在这一墓地共出土了 15 件铜梳子，可谓西周时期青铜梳子一次最重要的发现〔图 55〕。该墓地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至中期偏早阶段，大体上自成王、康王之际，下至穆王之时，随葬梳子的墓主人既有豳伯、豳季，也有豳伯家族的高级贵族和一般贵族。



[55-1]



[55-2]



[55-3]

[图55] 铜梳
1. 陕西宝鸡竹园沟豳国墓地 M6：8
2. 陕西宝鸡竹园沟豳国墓地 M21：10
3. 陕西宝鸡竹园沟豳国墓地 M12：11



[图56] 铜背木篦—贵州赫章可乐M144：5

甘肃永昌西岗墓地M53出土铜梳一件，梳体近方形，梳背饰勾连S纹，正面和背面的花纹相同，背脊上有一环钮，梳齿11枚，表面鎏金。西岗墓地属于沙井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应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早期阶段[1]。

贵州赫章可乐墓地位于黔西北乌蒙山脉中段的平坝上，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发掘了上百座墓葬。M144出土一件背部包镶鎏金铜片的木篦，扁平长条形，残高5厘米、宽1.6厘米，尚存18枚齿〔图56〕。该墓地人头骨是放在铜釜内入葬的，俗称“套头葬”，其年代大体属于战国晚期。据史书记载，这一带应为“故夜郎国”之地，因而推测埋葬于此的人们可能与古代濮族有关。

吉林永吉星星哨石棺墓群是迄今已知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大型墓地。在该墓地D区M16中发现了一件包铜木梳，平面呈倒梯形，上大下小，梳身的一面满包青铜片，铜片扁平，厚度不足0.5毫米，为锻造[2]。这件梳子的形制和包铜片的作法，十分罕见。星星哨DM16属于西团山文化晚期的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东周时期。

汉晋时期的金属梳子，发现于河南陕县、江苏徐州和南京、四川涪陵，以及吉林东辽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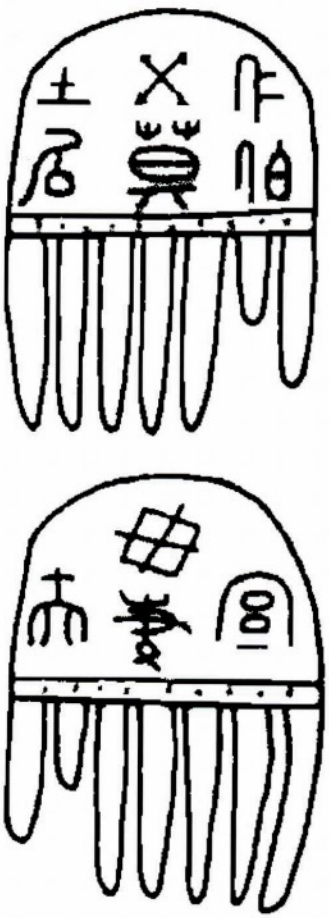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星星哨石棺墓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3〕1983年。

20 世纪 50 年代，在河南陕县旧县城东北约 1 公里处的后川村发现一处古墓地。其中 M2001 出土铜梳和木梳各一件，M3129 出土铅梳一件，M3410 和 M2001 各出土铜梳一件。铅梳和铜梳，均为弧背，形制相近，惟铜梳的梳背上有半圆形的镂孔。这几座墓葬的年代，属于秦至西汉初期[1]。

西汉时期，楚王的领地以今徐州为中心，徐州在当时称彭城，为其首府。20 世纪 70 年代在江苏铜山县的小龟山清理了一座长方形洞室墓，编号为龟山 M1。墓中出土铜梳一件，伴出的还有铜刷柄等器物。据研究，墓主人为男性，与楚王的姊妹“丙长翁主”的关系比较密切。龟山 M1 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 118 年至前 69 年[2]。

1978 年在四川涪陵城关镇易家坝发掘了一批古墓，从已遭严重扰乱的 M3 中出土一件铅梳[3]。这件铅梳为模制明器，弧背，有 7 枚梳齿。梳背上铸有铭文，正面为“宜口夫妻”，背面为“作伯祭墓土居”〔图 57〕。这



〔图57〕梳铅—四川涪陵易家坝M3出土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2〉 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 年 4 期。

〈3〉 重庆市博物馆等：《涪陵易家坝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 5 期。

批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中期。

1979 年在吉林东辽县石驿乡的山岗上发现一处古墓地，墓葬已遭到严重破坏，征集到一批青铜器和鎏金铜器[1]。其中有两件铜梳，形制基本相同，上端作僧冒形，梳背两面均饰席纹〔图 58〕。据该墓地出土的“五铢”铜钱和星云铜镜分析，其年代大体应相当于西汉时期。

1981 年江苏南京北郊发现一座券顶单室砖墓，平面呈凸字形，总长 9.05 米、宽 8 米，随葬品有青瓷器、金银器、玉石器等遗物百余件[2]。该墓中发现银栉背一件，以银片制成，其上饰纹，主题花纹是以几何、卷草纹作地的龙凤图案。银栉高 3.5 厘米、宽 8.2 厘米，出土时放在铁镜上。从墓葬结构和随葬品数量来看，这座墓可能为东晋中、晚期帝族的陵墓。



〔图58〕铜梳—吉林东辽汉墓出土

唐、五代时期的金属梳篦，多见于江苏、湖南、陕西等地。

江苏镇江，唐时称润州。在今镇江市以区西的阳彭山发现一座唐墓，墓内出土了一件鎏金银栉背[3]，弧

[1] 刘升燕：《东辽县石驿公社古代墓群出土文物》，《博物馆研究》1983 年 3 期。

[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4 期。

[3] 镇江博物馆：《镇江唐墓》，《考古》1985 年 2 期。



[图59] 金梳—江苏扬州唐城出土

背，波边，通体纹饰为模压后细部錾刻而成。栉背两面的上部均有纹饰，一面饰以四龟莲荷图案，另一面饰以四凤图案。据墓志得知，墓主为弘夫人，下葬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

1983年在江苏扬州三元路发现一处唐代窖藏，出土大量金银器，内有金梳一件[1]。金梳由金板制成，梳背较宽，其上镂刻细密的纹样。中心的主题图案为一对飞天，飞天身旁布满镂空的卷叶蔓草纹；外周为细密的锦纹；外缘以梅花、蝴蝶相间。这件金梳的纹饰繁缛，工艺精湛，可谓唐代金银细工的杰作〔图59〕。

20世纪50年代在湖南长沙纸园冲清理了一批唐墓，出土有铜梳、铜镜、铜夹、银花等物。铜梳，其上饰有花鸟纹样，惜已大部分残损[2]。

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湘西保靖发现一批古墓。M43已经被破坏，墓中出土银梳一件，梳体凸字形，齿26枚，梳背两面均饰花鸟纹，伴出的有银钗、插花等物[3]。这座墓葬的年代，应属于中晚唐时期。

20世纪60年代，在湖南长沙市郊清理了一批古墓，M174出土银梳一

〔1〕 徐良玉：《扬州发现一批唐代金首饰》，《文物》1986年5期。

〔2〕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长沙纸园冲工地古墓清理小结》，《考古》1957年5期。

〔3〕 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等：《保靖县四方城晋、唐、元墓发掘清理简报》，《湖南考古》2002年。

件，梳背呈半圆形，用薄银片压成，饰卷草形花朵，伴出的有铜镜、瓷器和“乾封泉宝”铁钱[1]。“乾封泉宝”这种铁钱是楚王马殷时铸造，且仅在长沙通行，因此该墓的年代应属于五代十国时期。

1970 年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一处唐代窖藏，出土金、银、铜、玉、石、玻璃、陶器等，共计 1000 余件。其中有一件金栉背，是用两层金片剪裁合并成型的，栉背上装饰有繁缛的卷草纹样，焊接技法十分精湛[2]。

宋代的金属梳篦，主要见于江苏南京、江西永新和彭泽等地。

1980 年在南京幕府山发现一座夫妻分室的合葬墓，男女两室并列[3]。女室出土金丝栉背一件，系利用吹焊法制作，其两面为金丝组成的卷草梅花图案，背脊上的七个圆圈当为镶嵌珍珠所用，惜因年深月久，珍珠已经朽烂无存。男室出土鎏金银栉背一件，梳背上压印五朵牡丹花纹。根据这座墓葬的结构和伴出的“明道元宝”铜钱，其年代应为北宋中期。

江西永新发现一座宋墓，内葬男女二人。女性棺中出土银背木梳三件，大、中、小各一件，梳背为银质镀金，其上装饰有仙鹤穿莲花图案及人物图案[4]。据碑文可知，墓主刘沆，生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官职，嘉祐五年〔1060 年〕卒，其妻段氏祔葬。

1972 年在江西彭泽县发现一座石椁墓，墓内出土银梳和木梳[5]。银梳的背上镂刻双狮戏球及缠枝花纹，并有“江州打作”、“周小四记“等铭记。据墓志记载，墓主易氏八娘，“世居彭泽为豪族”，葬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 年〕。

元代和明代的金属梳篦，见于山东嘉祥、河北石家庄、湖南株洲、湖北黄陂，以及江苏苏州、常熟、南京等地。

山东嘉祥县北 5 公里处发现一座元代墓葬，墓内放置两套棺椁，为男女合葬。在男棺的头部出有金背木梳、漆盒、白玉牌等随葬品。金背木梳，梳背用薄金片包裹，梳体为木质，呈半圆形。据墓志得知，男性墓主曹元用，为元代通奉大夫。

[1]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市郊五代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 年 3 期。

[2] 陕西省博物馆革委会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 年 1 期。

[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 年 3 期。

[4]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永新北宋刘沆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 年 11 期。

[5]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彭泽宋墓》，《考古》1962 年 10 期。



[图60] 金栉背—河北石家庄史氏墓地M2出土

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约3公里的后太保村发现一处墓地，已探明了近10座墓葬，大部分墓葬被盗扰，惟有M2未被盗扰。M2是一座土圹墓，四壁有台阶，墓室为石板砌成的单室，长2.78米、宽1.05米至1.36米。葬具为石椁木棺，内葬一人，人骨朽蚀严重，但头发尚保存完好，颜色黑中泛黄，系两根主辫交错盘于头顶，先用簪子和梳子固定，再用细绳缠绕到辫梢，辫发结构清晰可辨。墓中出土金栉背一件，拱形，内侧有镶嵌梳体的槽口，梳身已不复存在〔图60〕。金质的梳背长11.8厘米、高5.5厘米，其形制酷似山东嘉祥元代曹元用墓出土的金梳背，估计两者的年代应相去不远。后太保村M2的年代，大体在元代中后期。

1994年湖南株洲发现一处元代银器窖藏，内有银栉背五件，均呈弓形，一件栉背的主题花纹是双龙戏珠，另一件栉背的主题花纹是凤穿牡丹，其余栉背的纹样均为花卉图案。

湖北黄陂周家村发现一座古墓，其结构为砖石砌筑的平顶三室墓。西室出土金栉背一件，用金片制成，长12.3厘米。清理时，在栉背旁有一栉齿细密的残木栉，可与栉背吻合。这件栉背的形制与南京幕府山宋墓所出的金属栉背相似，故而推测该墓的下葬年代，可能为宋末元初。

江苏苏州南郊吴门桥附近发现一座古墓，内置棺椁两具，为男女合葬[1]。女棺中出于银奁一件，上下分三层，内盛全部梳妆用具。上层放有银剪刀、银

[1] 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6期。



[图61] 银梳妆具—江苏苏州吴门桥元墓出土

刷等，中层放有银盒、银罐、银碟，下层放有银梳、银篦等〔图 61〕。根据墓中出土的哀册载述，此墓系元代末年一度割据姑苏的吴王张士诚的父母合葬墓，其母曹氏死于“至元二十五年”〔1365 年〕。

江苏常熟虞山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内葬两人，为男女合葬。在女性棺内出土一件金质栉背，其上饰有花卉纹，周围用连珠环绕〔图 62〕。据墓志得知，墓主为温州知府陆润夫妇，下葬于 1518 年[1]。

在江苏南京一带的中华门外长岗村、中华门外郎家山、中央门外回家山、太平门外蒋王庙等地，都出有明代的金栉背[2]。这些金栉背均呈拱形，形制相同，其上往往锤錾、錾刻出各种花卉纹样〔图 63〕。

PDG

〈1〉 《常熟虞山明墓》，《东南文化》2004 年 1 期。

〈2〉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图62] 金栉背—江苏常熟虞山明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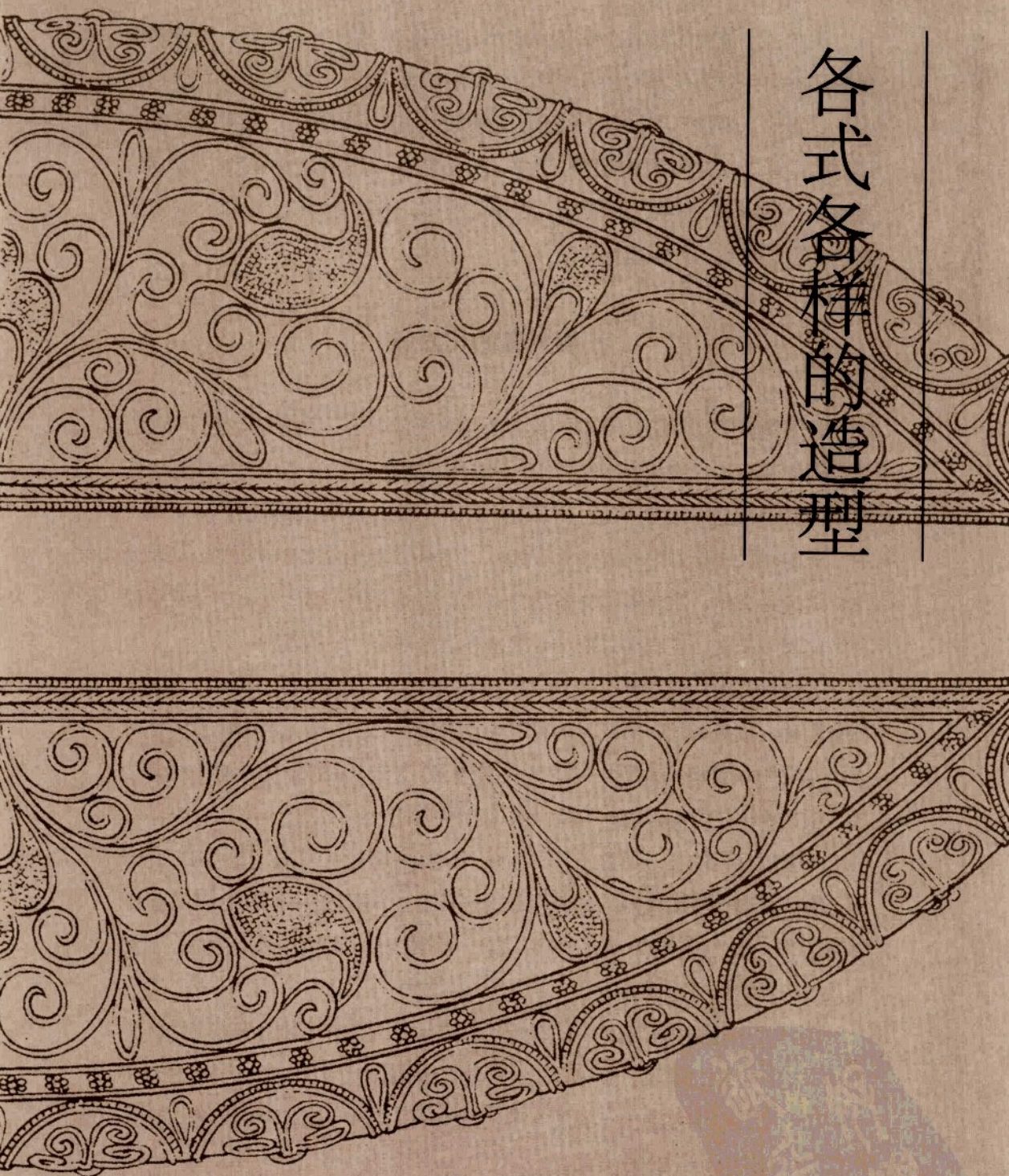
[63-1]



[63-2]

[图63] 金栉背
1. 江苏南京太平门外蒋王庙出土
2. 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明墓出土





各式各样的造型

关于古代梳篦的形状，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和图片资料，按照其整体的形态，可分为长方形、扁方形、凸字形、鱼尾形、六边形、亚字形、马蹄形、箕形、半圆形、拱形、弓形、鱼鳍形、圭形、椭圆形、葫芦形等各种不同的造型。在这些不同的造型之中，以长方形、扁方形、鱼尾形、六边形、亚字形、马蹄形、箕形、半圆形、弓形的梳篦，最具有特色。此外，联背形栉的造型与结构，亦相当特殊。

引领风骚的长方形

长方形梳子，平脊或凸脊，梳身两侧平直或斜直，通高明显大于宽度，呈纵向的竖长式。这种形制的梳子，自史前时期问世以来，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其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括了东、西、北和中原地区。

史前时代，长方形的梳子十分流行，在东部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以及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遗存之中都有一定的发现。

大汶口文化的长方形梳子，早期可以江苏邳县刘林墓地所出的骨梳为例，梳背较矮，梳齿较长，两侧向下斜内收，下接四、五枚粗大的梳齿；晚期可以山东宁阳大汶口墓地所出的象牙梳和邹县野店 M50 的骨梳为例，梳背较高，梳齿稍短，两侧斜直向下微内收，齿数明显增多，已达十五、六枚。

马家浜文化的长方形梳子，早期以浙江嘉兴吴家浜 M5 所出的象牙梳为例，梳背很高，梳齿较短，两侧近平直，其下有五枚粗齿；晚期以江苏昆山绰墩 M73 所出的象牙梳为例，梳背较矮，梳齿较长，两侧中间向内敛，下部有八枚较粗的梳齿〔图 64〕。

良渚文化的长方形梳子，既有骨质的单体式，又有骨牙与玉石相结合的分体式。保存较完整者，梳身两侧斜直内收，下接六、七枚粗齿，梳齿较长。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的长方形玉石梳子，梳背很高，两侧斜直，梳齿很短，齿数在 11 ～ 20 枚之间。

已知的夏代的梳子，仅见于河南，呈长方形，梳背顶部平齐，下刻磨出四周凸弦纹，梳齿残缺，仅剩一枚〔图 65〕。

商代前期的长方形梳子，主要见于郑州商城遗址。这一时期的梳子，梳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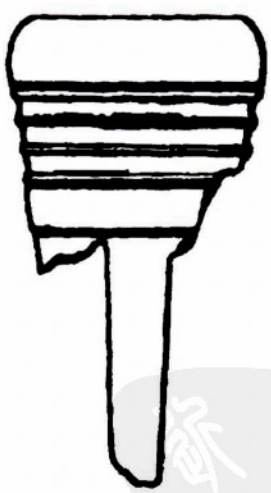
多高于梳齿，背脊平齐，两侧斜直，齿缝的疏密不一，梳齿一般在 20 枚以下。

商代后期的长方形梳子，多见于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和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这一时期的梳子，多为凸脊，梳背较高，梳齿较短，梳身两侧多近平直，有的还向内微弧曲，齿数在 10 ～ 20 枚之间，脊背的上端通常有一个小钮。殷墟侯家庄 M1003 出土一件象牙梳，其上的小钮呈方形〔图 66〕，殷墟妇墓出土一件骨梳，其上的小钮呈鸟状。

西周时期的长方形梳子，在北京、陕西、新疆等地的西周时期遗存中都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长方形梳子，多为凸脊，背脊上流行各种各样的钮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 M202 和 M251 出土的象牙梳，背脊上有一方形小钮，梳背较高，梳身两侧平直，具有商代后期的特征，唯齿缝较密，齿数在 22 ～ 31 枚之间。陕西宝鸡竹园沟弹国墓地 M13 出土的铜梳，背脊上有塘楼状钮，梳背较矮，梳身两侧斜直，齿数为 9 枚，齿缝较稀〔图 67〕。新疆哈密五堡墓地的木梳[1]，背脊上有羊角状大钮，梳背上



[图64] 牙梳－江苏昆山绰墩M73出土



[图65] 骨梳－河南郑州洛达庙H316出土

[1] 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天山古道东西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图66] 牙梳—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M1003出土



[图67] 铜梳—陕西宝鸡竹园沟M13出土

中心穿有一孔，孔中系皮条，可供悬挂，这件木梳制作粗糙，未经打磨，应是为下葬而赶制出来的冥器〔图68〕。

东周时期的长方形梳子，主要发现于河南洛阳、湖北随县和新疆鄯善等地。这一时期的长方形梳子，形制较为复杂。洛阳东周王城王陵区域C1M5560的象牙梳和随县曾侯乙墓的玉梳，均为平脊，整体虽为长方形，但背脊的两端已经抹圆了〔图69〕。鄯善洋海一号墓地的木梳，多为凸脊，其背脊上有塔状或圆状的钮。

汉晋时期的长方形梳篦，多见于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沂、内蒙古满州里，以及新疆洛浦和且末等地。这一时期的长方形梳篦，也有凸脊和平脊之别，前者往往富于装饰，而后者通常不加装饰。长沙马王堆M3出土的长方形角梳、角篦，江陵凤凰山M8和临沂银雀山M1出土的长方形木梳、木篦，这些梳篦的背脊上部均由三、五层相叠而成，每层都刻划有纹饰，器身两侧还有呈梯形的凹进，其叠床架屋的作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新疆洛浦、且末和内蒙古满州里等地出土的长方形木梳，皆为平脊，朴实无华，加上不甚规整的梳体，颇有

些复古的意味，不过就整体的造型而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洛浦山普拉墓地编号为 92LS Ⅱ M3：27 的木梳，高 7.7 厘米、宽 6.6 厘米、厚 0.9 厘米；编号为 84LS Ⅰ M02：C42 的木梳，高 7.8 厘米、宽 6 厘米、厚 0.6 厘米。这两件梳子的通高只是略大于横宽，就整体形状而言，较为接近方形了〔图 70〕。

长方形梳子，形体端庄，造型古朴，自滥觞之初到有商一代，始终居于当时梳子造型的主导地位。西周早期，这种形制的梳子亦颇为流行，但东周伊始却迅速走向衰落，汉晋时期收尽了最后一抹余晖，从此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种梳子演变的主要趋势为：梳体经历了从长方形到近方形的过程，梳齿也经历了从粗到细、从少至多的过程。



[图68] 木梳—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

绵延不绝的扁方形

扁方形梳子，皆为平脊，梳体两侧平直，通高小于宽度，呈横向的扁平式。这种造型的梳子，自史前时期就开始出现，到了明代仍有发现，历时长达数千年之久。其分布范围亦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东、西南方各地区。

史前时期的扁方形梳子，见于山



[图69] 玉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70-1]



[70-2]

[图70] 木梳
1. 新疆洛浦山普拉 92M3：27
2. 新疆洛浦山普拉 84M02：C42

东、浙江、湖北、宁夏等地。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土壤中酸性与碱性物质的长期侵蚀，这一时期的梳子出土时大都已残破不堪，有的甚至已经很难能辨明其本来的面目了。

山东莒县陵阳河墓地 79M12 和 79M19 各出土一件骨梳，这两件骨梳的形制和规格，基本上一致，梳背呈扁长方形，明显宽于齿部，梳齿集中在梳背的中部，整个梳体犹如“T”字形〔图 71〕。

浙江平湖庄桥良渚文化 M147 出土的木梳，梳背呈扁平的长条状，梳齿较多，惜已严重残损。

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 F6 出土的象牙梳，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扁方形梳子。其梳背较短，梳齿较长，梳背与梳齿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图 72〕。

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 M25 中也发现了一件骨梳，甚残，复原的梳背近倒梯形，下有 7 枚梳齿。

两周至两汉时期的扁方形梳子，多见于新疆地区。一般的扁方形木梳，大都属于单体类型，即用一整块木板采用削刻的方式制作而成。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出土的扁方形木梳，则是采用多块木板以组合或镶嵌的方式制作而成的复合体类



[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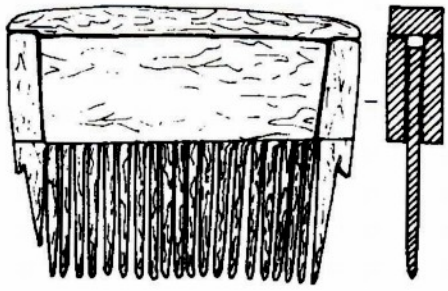


[71-2]

[图71] 骨梳
1. 山东莒县陵阳河 79M19 出土
2. 山东莒县陵阳河 79M12 出土



[图72] 牙梳—湖北陨县青龙泉F6出土



[图73] 组合式木梳—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M5：4

型。这种复合体的木梳，按照结构又可分为组合式和镶嵌式两种形式。前者的梳背，用几块小木板粘合而成，或在木板上刻出齿槽，或把齿根夹在背板之间；后者的梳背，多为一个圆棒状或长方体，一面挖出一长槽，或者钻出一个个卯孔，将齿根分别镶嵌于其上。

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M5出土了一件木梳，属于组合式，梳背由两侧板和背板组合成一个槽状，内嵌19枚梳齿，两侧再附上边齿，以胶粘合。通高5.2厘米、宽6.5厘米〔图73〕。该墓地的年代，被推定在距今3000年前，属于青铜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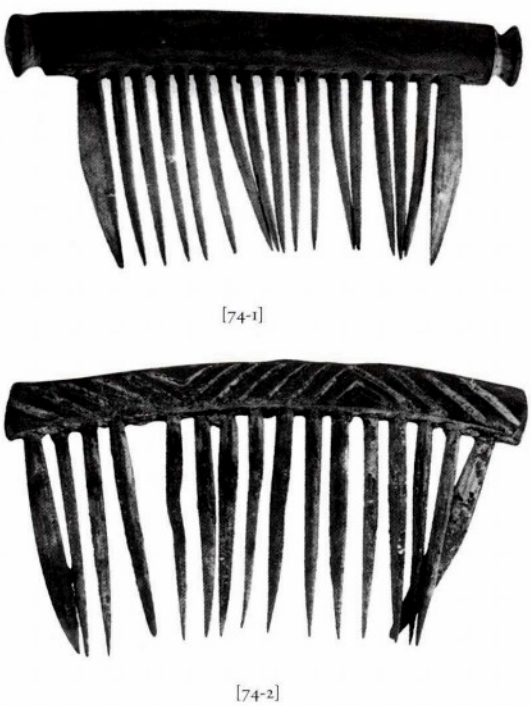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第二期文化墓葬中出土了32件木梳，其中有7件属于组合式，25件属于镶嵌式。M1和M7出土的组合式木梳，结构基本相同，梳背皆用几块小木板粘合，刻出齿槽，将梳齿嵌在其中，并附上边齿。M14出土的镶嵌式木梳，结构略有不同。编号为M14：33的木梳，梳背为一小圆木棒，在镶齿的一面挖出长方形沟槽，先将梳齿并排镶嵌其中，再把沟槽两端封口，采用了沟槽嵌齿的方式；编号为M14：35的木梳，梳背为长方体，在梳背的底面上钻出一

个个卯孔后，再分别将齿根镶嵌于各自的卯孔之中，采用了卯孔嵌齿的方式〔图 74〕。据研究，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第二期文化的年代，主要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二号墓地 M1 和 M2 也出土了多件木梳，其中仅编号为 M2：19 的木梳，属于组合式，梳背由两片长方形木板成粘合而成，先在这两片木板上刻出凹槽后，再把梳齿夹放于中间。其余的木梳，均属于镶嵌式，既有采用沟槽嵌齿的方式，又有采用卯孔嵌齿的方式，结构与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第二期文化的镶嵌式木梳相同。

新疆且末加瓦艾日克墓地的 M3 是一座多人合葬墓，墓中出土了多件木梳，均属于镶嵌式。这些梳子的梳背均为圆柱体，一侧刻有齿槽，槽内镶嵌有一排梳齿。据碳 14 测定的年代数据，发掘者认为，该墓的年代应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1]。鉴于该墓中出土的木器与扎滚鲁克墓群第二期文化有一定的共性，笔者以为，加瓦艾日克墓地 M3 的下限应该已进入了西汉时期。

隋唐时期的扁方形梳子，仅见于新疆地区。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



[74-1]

[74-2]

[图74] 镶嵌式木梳
1.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M14：33
2.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M14：35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发掘》，《考古》1997 年 9 期。



[图75] 玳瑁梳—江苏淮安明孙氏墓出土

地 72M205 中，出土了一件扁方形木梳，梳背呈规则的长方形，齿数较多，年代属于麴氏高昌时期〔6 世纪～ 640 年〕。

明代的扁方形梳子，在上海、江苏和广州等地有所发现。上海松江明墓出土了两件扁方形的木梳，一大一小，形制相同，梳背呈圆柱状，均系用一整块木板所制成的单体类型。江苏淮安凤凰墩明孙氏墓出土一件玳瑁梳子，也为扁方形〔图 75〕。

扁方形梳子，造型古拙，结构多样。单体类型的扁方形梳子，结构简单，这种形制的梳子，出现的时代虽然较早，但各个时期的数量一直不多。复合体类型的扁方形梳子，结构复杂，大体距今 3000 至 2000 年前后，这种形制的梳子在新疆且末、哈密、鄯善等西域一带的绿洲国家曾经盛极一时，成为当地最富有特色的器具之一。进入明代，单体类型的扁方形梳子再度兴起，不过其背部的形态已有了明显的变化，昔日扁平的长条状握手已经被厚重的圆柱状握手所取代了。扁方形的梳子，尽管自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一直绵延不绝，然而除了在西域地区一度崭露头角之外，这种形制的梳子在其他各地区始终未能成为梳篦的主流款式。

独树一帜的鱼尾形

鱼尾形梳篦，平背展脊，背脊的两端伸出体外，梳身上窄下宽，呈鱼尾状。这种造型的梳子，肇始于史前时期，盛行于东周时期，主要分布在中原和东方地区。

已知最古老的鱼尾形梳子，当数山西襄汾陶寺 M282 出土的石梳，其年代大约在距今 4500 至 4300 年左右。这件石梳的背脊平直，两端外展，梳背硕长，上端钻一圆孔，下端有一道凸棱，齿部较短，下有 20 枚梳齿，梳齿参差不齐，形制相当古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鱼尾形玉梳，背脊两端各雕一只鹦鹉，双鸟相对而立，中间微微凸起一小钮，梳身中部的一道浅棱将梳背与梳齿部区分开来，下有 15 枚扁宽的梳齿。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支那古玉图录》中著录有一件玉梳，传河南殷墓出土，其背脊的两端微外展，中部凸起一钮，梳身的形制与妇好墓的玉梳相近，只是上端无双鸟，亦应属于鱼尾形。

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春秋楚墓出土的玉梳，脊略上鼓，两端外突，梳背两面刻云纹，下有 18 枚梳齿，造型较为古朴〔图 76〕。



[图76] 玉梳—河南淅川下寺墓墓M1出土



[图77] 桥式牙梳—台北故宫藏

自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用竹木和骨牙等有机材料制成的复合体梳篦，这种复合体的鱼尾形梳篦，一般由梳背和梳身两部分构成，而这两部分通常是以榫卯方式相承接的。这种复合体的梳篦，按照其背脊的装饰，可分为桥式、双鸟式、双虎式三种类型。

桥式梳篦，背脊无饰，在形态上较多地承袭了玉石梳子的传统作风。这种形制的梳篦，多见于山东地区，在山西地区也有发现。

山东沂南西岳庄一号大墓出土了两件鱼尾形木梳，一件背脊的两端外展，另一件背脊的一端外展，均属于桥式。该墓的年代，被推定在春秋中期。

山西长治分水岭 M270 中出土一件竹梳，残高 5 厘米，背脊上端平齐，两侧外展，应属于桥式。分水岭 M270 的年代，被推定为春秋中晚期。

山东海阳嘴子前 M4 和 M6 各出一件骨篦。M4 的骨篦，背平较厚，背脊两端刻成下弯的弧状，向下渐收尖，器身作鱼尾形，齿 68 枚，其上施黑漆；M6 的骨篦，形制与 M4 的大体相同，惟背脊两端微上翘，齿 50 余枚。这两件骨篦，背部很短，器体较宽，齿缝细密，无粗大的边齿，均属于桥式。

嘴子前 M4 和 M6 的年代，被推定在春秋晚期前后。

山东昌乐岳家河 M104 出土一件骨梳，上端平齐，两端外展下弯，属于桥式，该墓年代应属于战国时期。形制相近的桥式鱼尾形牙梳，在《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器目录》中有一件，梳背上尚有褐彩纹饰，残高 5.3 厘米〔图 77〕。

双鸟式梳篦，背脊上雕刻有相互对视的双鸟，造型生动，细致写实。这种形制的梳篦，主要出自鲁中南一带，在山西侯马也有发现。

山东莱芜西上崮出土了两件牙梳，其中一件牙梳呈淡绿色，背脊上雕刻着两只对立的小鸟，双鸟之间为盘卷的蛇，梳背两侧各有一小梳，梳背与梳身及背脊上的双鸟和两侧的小梳，均由榫卯拼合而成；另一件牙梳的形制与前者相同，惟两侧的小梳已失。该遗址的年代，可能介于春秋中期和晚期之间。

在《关氏所藏中国牙雕》中著录了一件牙梳〔图 78〕，背脊两端各雕有一只，两鸟相对而视，中间饰以高浮雕缠绕的盘蛇，刻工相当精致，形制与山东莱芜西上崮所出的相似。

山东长岛王沟 M4 中出土一件骨梳，背脊的两端各雕一只立鸟，两



[图78] 双鸟式牙梳—香港关氏藏



[图79] 双鸟式牙梳—台北故宫藏

鸟之间还刻有一盘卷的蛇，梳身上窄下宽，梳齿插入梳背，边齿较大，梳齿为36枚。伴出的器物有骨笄、陶器，该墓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同样形制的双鸟式梳子，还见于山西侯马，其年代亦属于春秋晚期。

山东滕州薛故城M9出土的骨梳，高8.4厘米，背脊上雕有一对相视的小鸟，双鸟的身段已放低，两鸟之间的蛇更是不见了踪迹。薛故城M9的年代，被推定在春秋晚期。

山东曲阜鲁故城M116出土的牙梳，背脊上也有一对小鸟，但双鸟已经完全贴附于梳脊表面，令人很难看清其本来的面目了。该墓的年代，其年代应在春战之交。形制相似的双鸟式牙梳，在《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器目录》中有一件，自上方俯视可见两只展翅飞鸟，高8.8厘米〔图79〕。

山东滕州庄里西滕故城90STZM8中出土一件象牙梳，脊背作桥形，上有两只相对而立的小鸟，梳背较短，其年代被推定在战国早期。

双虎式梳篦，背脊上雕刻着一对回首相视的老虎形象，双虎的身尾相连，形象生动，作工精细。这种形制

的梳篦，见于鲁中一带。

山东章丘甲组 M57 出土一件骨梳，背脊的两端各雕一只老虎，回首相视，梳背较矮，梳齿硕长，边齿较大。据研究，章丘甲组墓葬虽非齐国墓，但却与齐墓以及山东地区的土著墓有着密切的联系，M57 的年代，属于战国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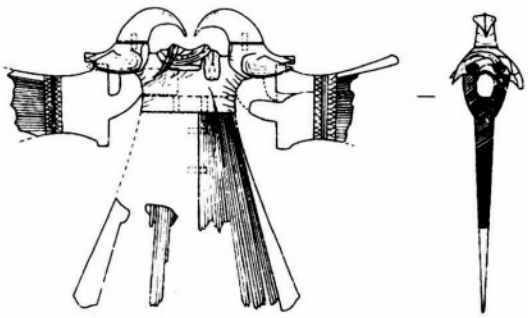
山东新泰周家庄 M13 出土了一件骨梳，背脊上也雕有一对老虎，其形态与章丘甲组 M57 所出的雷同〔图 80〕。根据墓葬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特征、葬俗，新泰周家庄墓地属于齐文化的墓葬，该墓地的年代，被推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①]。那么，周家庄 M13 的年代，估计亦应属于战国早期。

鱼尾形梳篦，不仅造型优美，而且富于变化。尤其是鱼尾形双鸟式梳篦，其背脊上的装饰，由繁复到简约，再由简约至消失，整个演变的轨迹，清晰可辨〔图 81〕。这种形制的梳篦，在春战之交的鲁、滕、薛等“泗上诸侯”列国地区，自成一体，可谓当地时尚的主流。至于鱼尾形双虎式梳篦，从形态上观察，很可能是鱼尾形双鸟式梳篦的一种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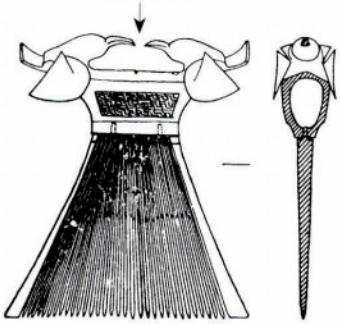


[图80] 双虎式骨梳—山东新泰周家庄M13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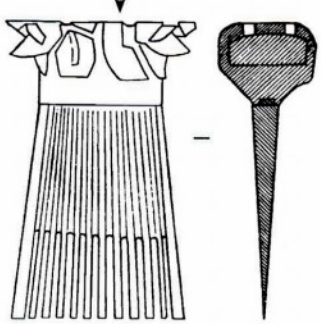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葬发掘》，《2003 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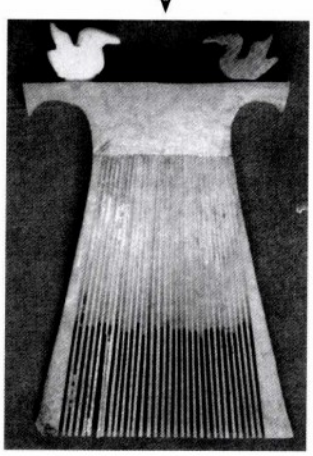
西上崮采集



薛故城 M9：1



鲁故城 M116：15



滕故城 M8：9

[图81] 鱼尾形双鸟式梳篦的演变示意

别具一格的六边形

六边形梳篦，平脊，上小下大，上端的两侧外斜，下端的两侧平直或内斜，整体呈不甚规则的六角状。这种形制的梳篦，流行于东周时期，可能延续至西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的湖北江陵一带和西北地区的新疆鄯善、于田等地。

湖北江陵九店墓地在楚故都纪南城东北 1.5 公里处，共出土了 10 余件六边形的木梳、木篦。该墓地的六边形梳篦，背部较厚，齿部较长，边齿多平直或略内斜，有的整器涂墨，还有的在墨地上施彩〔图 82〕。一般梳子的齿数为 16 ～ 19 枚，通高 5.8 ～ 6.8 厘米、宽 6 ～ 6.3 厘米、厚 1.2 ～ 1.5 厘米；篦子的齿数为 60 ～ 80 枚，通高 6.3 ～ 7.3 厘米、宽 5.8 ～ 6.9 厘米、厚 0.8 ～ 1.6 厘米。出土这些梳篦的楚墓，其年代大都属于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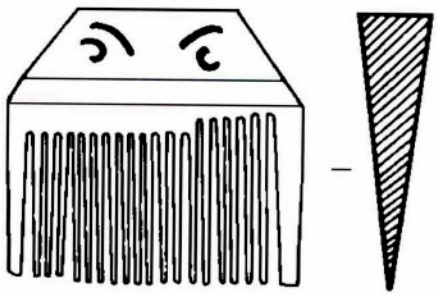
湖北江陵雨台山墓地毗邻楚故

都纪南城东城垣，共出土了近 10 件六边形的木梳、木篦。这些梳篦的背部也较厚，齿部较长，边齿平直。M513 出土的一对梳篦，通高 7.2 ～ 7.3 厘米、宽 6.4 厘米、背厚 1.5 ～ 1.6 厘米，背上髹黑漆，彩绘卷云纹〔图 83〕。该墓地的年代，大体属于战国早期至中晚期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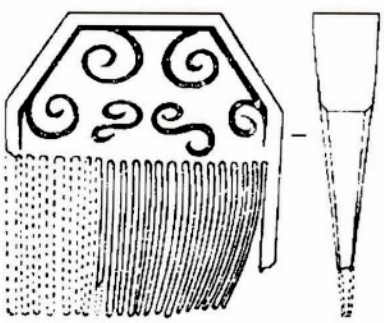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 9 公里，墓内出土了三件木梳篦，其中有一件为六边形的木梳。这件六边形木梳，平脊，梳背较薄，梳体素面无漆，下有 16 枚长齿。高 6.3 厘米、宽 5.2 厘米、背厚 0.6 厘米。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

新疆鄯善苏贝希三号墓地 M6 出土一件六边形角梳，梳背呈梯形，梳体扁平，梳齿较长，边齿内斜。高 5.5 厘米、宽 5.8 厘米。据研究，苏贝希三号墓地属于苏贝希文化的遗存，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后。

新疆鄯善三个桥墓地 M13 也出土了两件六边形角梳，形制相同，平背，斜角，梳体扁薄，边齿内斜。一件高 5 厘米、宽 4.5 厘米、背厚 0.6 厘米；另一件高 4.5 厘米、宽 5.2 厘米、背厚 0.6 厘米，梳背中部有一小



〔图82〕木梳—湖北江陵九店M26：9



〔图83〕木梳—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M513：9



[图84] 木梳—新疆于田圆沙古城古墓出土

圆孔，直径 0.4 厘米。三个桥墓地也属于苏贝希文化的遗存，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

在新疆于田县北圆沙古城附近的古墓中也发现了木梳、陶器等物，其中有一件六边形的木梳。这件木梳的梳背较高，梳齿较短，边齿斜内收较甚，梳背上端还有一较大的圆孔〔图 84〕。这批古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东周至西汉时期。

六边形梳篦，轮廓分明，造型别致。这种形制的梳篦，虽然流行的时间不久，分布的地域亦不广，但在东周时期的楚国地区比较流行。其主要演变的规律是：上端和下端两侧的倾斜度由小渐大，背部由矮变高，齿部由长变短。

流光异彩的亚字形

亚字形梳子，平脊，梳背上窄下宽，两侧向内凹，并弧切成亚腰状。这种形制的梳子，流行于东周时期，在汉晋时期还有发现，其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东方的山东地区，西北的新疆地区也有少量的发现。

山东临沂恰沟 M1 出土一件亚字形象牙梳，白色，梳身两侧微内弧，齿缝较密，下部已残。中恰沟 M1 的年代，大体属于春秋中期，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亚字形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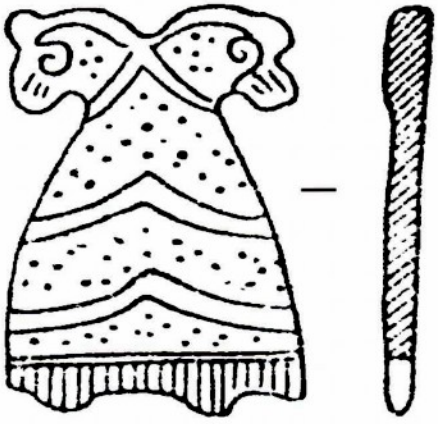
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位于齐故城南城墙外半公里处，墓中出土了近 20 件骨梳，大都属于亚字形。4 号陪葬坑出土的骨梳，梳背较短，梳齿较长，梳身两侧向内弧切较甚。郎家庄一号东周墓的年代，被推定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 500 至公元前 400 年之间。

山东章丘宁家埠东周墓群乙组 M71 出土一件亚字形骨梳，梳背略高，梳齿较短，部分残断，梳身两侧内凹明显，高 7.9 厘米、宽 5.2 厘米。据研究，宁家埠东周墓群乙组墓可能为齐国的墓葬，M71 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期。形制相近的亚字形牙梳，在《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器目录》中有一件，梳背两侧内凹较甚，高 7.6 厘米、宽 4.8 厘米〔图 85〕。

山东泰安康家河 M2 出土一件牙梳，梳背两侧向内切割成近三角状，上端略作马鞍状，梳齿 15 枚，下部已残，边齿粗大。这件牙梳的形制，比较特殊。从随葬陶器的组合与特征来看，这是一座典型的齐国墓，年代应属于战国中期。



〔图85〕牙梳—台北故宫藏



[图86] 双马头形骨梳—山东青州凤凰台东周墓M608出土

在山东威海市区东北的小丘陵上发现了一座墓东周葬，编号为M3。墓中出土一件骨梳，系由一整块薄骨片加工而成，梳背两侧向内弧收，呈不对称的亚腰状。根据随葬器物的特征，该墓的年代，大体应属于战国中期。

山东昌乐岳家河东周墓地位于昌乐县城南10公里处的河边台地上，这里发现了多座随葬骨梳的墓葬。M136出土的骨梳，梳背略弯曲，两侧向内切割成规矩的弧线形，梳齿较短且稀疏，高6.8厘米、宽4.2厘米；M130出土的骨梳，梳背较高，两边向内切割成三角状，梳齿较短，局部已经残缺，边齿粗大，高7厘米、宽5厘米。根据伴出的陶器分析，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属于战国晚期。

山东青州赵铺M7出土一件骨梳，梳背的高度与梳齿的高度相若，两侧有弧形的缺口。高6.8厘米、上宽3.8厘米、下宽5厘米。该墓的年代，属于战国晚期。

山东青州市凤凰台东周墓M608出土一件骨梳，上端雕成颈部相连的双马头状，马头向外，恰好与两侧的梳身之间形成弧状缺口。梳背近亚腰状，其上饰三道波折线纹，而波折线的空隙之中又排列着整齐的墨点纹

〔图 86〕。梳齿 14 枚，均残。该墓的年代，属于战国晚期。

山东阳信李屋 M33 出土一件骨梳，其上端也雕成双马头形，形制与凤凰台 M608 的骨梳相同，只梳身为素面而已。阳信李屋 M33 的年代，大体亦属于战国晚期。

这种双马头形的梳子，最晚的实例见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在 1995 年发掘的一号墓地 M1 中出土一件木梳，背上部双马的脖颈相连，头向外，刻出耳、鼻，两侧的内弧更甚，近顶端的中部还有钻一孔，梳身为素面，下有 10 枚梳齿〔图 87〕。尼雅一号墓地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汉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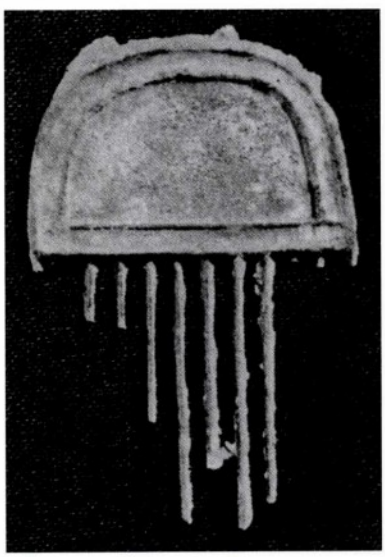


[图87] 双马头形木梳—新疆民丰尼雅一号墓地M1出土

亚字形梳子，轮廓简洁，造型绰约。这种形制的梳子，尽管流行的时间短暂，然而却为东周时期齐国地区梳子的主导样式。亚字形梳子的演变趋势为：梳背从较矮到较高，梳齿从较长到较短，齿缝从较密到较稀。关于双马头形的梳子，大体可视为亚字形梳子的一种变体。

蔚为大观的马蹄形

马蹄形梳篦，背部弧曲，齿部平直，上圆下方，形近马蹄状。这种形制的梳篦，最早见于西周时期，自



[图88] 铜梳—陕西宝鸡竹园沟M13：117

东周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一直十分流行，其分布地域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全国各地。

陕西宝鸡竹园沟 M13 出土一件铜梳，梳身下端平直，上部圆弧，梳背呈半圆形，边缘有弦纹两周，上端应有一对触角状小钮，已残，其年代大约属于西周初期。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马蹄形梳子〔图 88〕。

东周时期，马蹄形的梳篦如同雨后春笋般开始大量地涌出，尤以西南的楚及周边的列国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在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出土的 97 件梳篦中，有 81 件为马蹄形；江陵雨台山楚墓共出土 139 件梳篦，在形制清楚的 83 件梳篦中，有 76 件为马蹄形；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 18 件梳篦中，有 17 件为马蹄形；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 56 件梳篦中，全为马蹄形〔图 89〕。这一时期的马蹄形梳篦，在东南的群舒、吴越地区和中原的三晋、中山国地区也有一定的发现。

东周时期的梳篦，以西南地区的马蹄形梳篦最富有特色。这一地区的梳篦，大都背厚齿密，

据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地的统计，背部较薄者，其厚度在 0.7~1.5 厘米之间；背部较厚者，其厚度在



[89-1]



[89-2]

[图89] 木梳、木篦
1. 湖南长沙楚墓 M89：98
2. 湖南长沙楚墓 M1637：8

1.2~3 厘米之间；梳子的齿数在 12~28 枚之间，篦子的齿数在 60 枚 ~100 枚之间〔详见：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地马蹄形梳篦尺寸统计表〕。这些梳篦总体形态的演变轨迹，亦较为清晰：战国早期，流行长马蹄形的梳篦，器体的高度明显要大于宽度；战国中期，仍以长马蹄形为主，开始出现方马蹄形，即器体的高度和宽度大体相若；战国晚期，长马蹄形和方马蹄形已经并驾齐驱了。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地马蹄形薄背梳篦尺寸统计表

器物号	齿数〔枚〕	高〔厘米〕	宽〔厘米〕	背厚〔厘米〕
M8:14	17	7.8	6.3	1.1
M240:4	22	8.9	7.3	0.8
M268:24	27	9.3	7.8	0.8
M287:6-1	22	8.7	7.3	1
M294:60-1	23	8.5	5.5	0.9
M295:4-2	17	8	7	1.2
M294:4-3	19	7	5.8	1
M296:11	23	9.3	7.6	1.2
M526:21	24	8.9	7.7	1.1

器物号	齿数〔枚〕	高〔厘米〕	宽〔厘米〕	背厚〔厘米〕
M528:3	25	9	7.5	0.7
M537:14	26	8.4	7.7	1.1
M538:12	26	8.9	8	1
M556:8	21	8.5	7.1	1
M610:6	23	8.2	6.8	0.7
M621:26	22	8.4	6.9	0.8
M17:7	15	8.1	6.4	1.2
M51:27-1	17	6.2	5.3	1.2
M56:10	16	7.3	6.1	1.2
M246:9	17	7.1	5.6	1.4
M251:18-1	19	8	6.4	0.9
M263:3	17	7.7	6.8	1.2
M411:2	28	7.7	6.5	1
M452:14	19	7.1	5.9	1.1
M712:15-2	20	9	7.8	1.5
M268:30	73	9.3	7.8	0.9
M295:4-1	63	7.2	6.3	1.2
M296:4	64	8.9	7.2	1
M526:20	63	8.8	6	0.9
M528:4	63	8.2	7.1	0.9
M546:19	66	8.5	7	0.9
M621:27	64	8.5	6.9	1
M17:15	72	8.1	4.5	1
M19:11	72	7.2	4.8	1.1
M51:27-2	72	6.9	5.5	1.4
M56:12	76	6.5	6.2	1.4
M246:23	72	6.8	5.9	1.3
M251:8-2	78	8.4	6.8	1

器物号	齿数〔枚〕	高〔厘米〕	宽〔厘米〕	背厚〔厘米〕
M263:9	74	8.2	6.1	1.3
M452:7	69	8.5	6.4	1
M556:9	76	9.2	7.3	0.7
M712:15-1	100	8.8	8.1	1.5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地马蹄形厚背梳篦尺寸统计表

器物号	齿数〔枚〕	高宽〔厘米〕	宽宽〔厘米〕	背厚宽〔厘米〕
M617:21	17	6.7	5.8	3
M13:12-4	12	6.7	6.3	2.6
M87:6	16	7.6	6.8	2.7
M196:9	17	6.8	5.6	2.4
M264:15	20	7.1	6.6	2
M445:17	15	7.7	6.6	2.4
M447:7	13	7.5	6.9	2.2
M451:18	18	7.4	7.4	2.4
M468:6	18	6.7	5	1.2
M483:13	16	8	6.4	2
M642:16	17	7.2	6.7	1.4
M645:12	12	7.2	6.1	1.9
M711:23	17	7.2	7.5	2.2
M7321:8	16	6.4	5.8	2.1
M264:30	79	6.3	6.3	2
M645:11	86	7.1	6.7	1.6
13:12-5	80	6.75	6.4	2.7
M87:7	98	7.8	7	1.9
M447:13	88	7.5	6.5	2.3
M451:6-2	93	7.1	7.2	2.3
M711:16	100	7.1	7.1	1.4

秦汉时期，马蹄形梳篦不仅见于西南、东南和中原地区，也见于东方、南方、北方和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马蹄形梳篦，背部已经明显变薄了。据荆州高台秦汉墓地的统计，梳篦背部的厚度一般在 0.3 ～ 1.3 厘米之间，梳子的齿数在 10 ～ 27 枚之间，篦子的齿数在 32 ～ 96 枚之间〔详见：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地梳篦尺寸统计表〕。西汉前期，流行长马蹄形的梳篦，而西汉晚期以后，则流行方马蹄形的梳篦〔图 90〕。



[90-1]



[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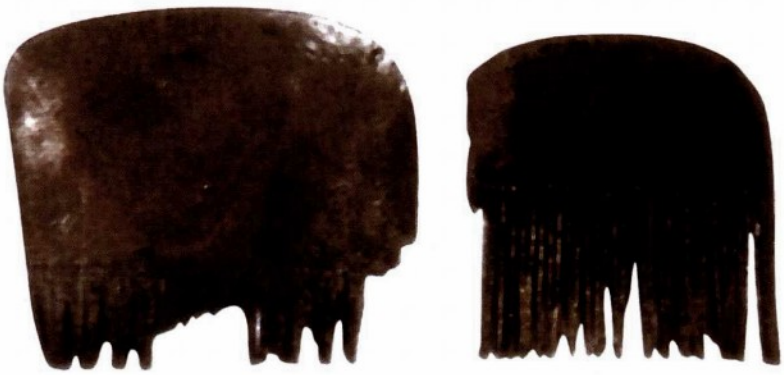
[图90] 木梳、木篦
1.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M3 北 159：6
2.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M3 北 159：7

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地梳篦尺寸统计表

器物号	齿数〔枚〕	高宽〔厘米〕	宽宽〔厘米〕	背厚宽〔厘米〕
M2:279	24	8.1	5	1
M29:N1-1	15	8.55	6	1.2
M3:34-2	19	8.2	6	1
M17:21-1	22	8	6	1.2
M11:N2-1	24	10	8	1.2
M18:36	27	8.1	6	1
M11:27-1	19	8.9	5.7	0.3
M28: 乙 N1-1	10	6.8	4.85	1
M2:278	32	7.8	5	1.1
M29:N1-2	60	8.55	6	1
M3:34-1	60	8.2	6	1
M17:12-2	52	8	6	1
M11:N2-2	66	10	8	1.2
M33:30	48	8.1	6.2	1.1
M18:37	96	8.1	6	1
M11:27-2	24	8.9	5.7	1.1
M28: 乙 N1-2	69	6.9	5.2	1.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马蹄形梳篦，主要见于北方、西北、南方、东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梳篦，不仅背部较薄，齿数也较少，梳子的齿数，一般在 10 ～ 20 枚左右；篦子的齿数，一般在 40 ～ 60 枚左右。除了新疆民丰尼雅、尉犁营盘和洛浦山普拉等地尚有一部分长马蹄形外，其他地区均以方马蹄形占大宗〔图 91〕。器体的上端，已近平弧；器体的下端，呈扁方形。

马蹄形梳篦，方圆一体，造型典雅。这种形制的梳篦在东周时期异军突起，并迅速在西南和东南地区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到了两汉时期，马蹄形梳篦的势头更加强劲，已经遍及东、南、西、北及中原各地区，并且一跃成为全国时尚梳篦的主流样式。这种梳篦演变的主要规律是：上端由圆弧到尖弧



[91-1]



[91-2]

[图91] 木梳、木篦
1. 江西南昌火车站晋墓 M3 出土
2. 江西南昌火车站晋墓 M5 出土

再到近平弧，下端从长方形到扁方形；边齿从弧内收至平直，再至微外侈。

洋洋洒洒的箕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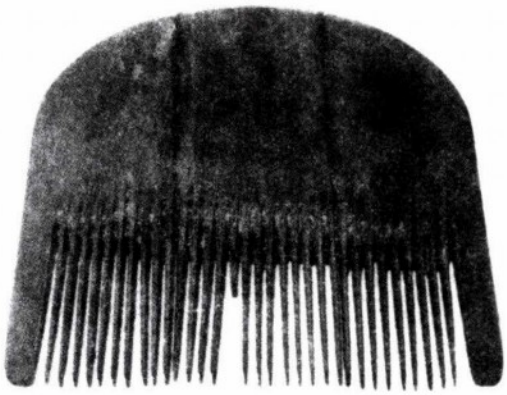
箕形梳篦，背部微弧，两侧外侈，上窄下宽，形似簸箕状。这种形制的梳篦，孕育于魏晋时期，初兴于北朝时期，盛行于隋唐时期，其分布地相当广泛，包括中原、东南、西南、西北和北方地区。

在两晋时期流行的马蹄形梳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部分上端近平弧而下端微外侈者。譬如，江西南昌火车站 M3 这座东晋墓出土的马蹄形梳篦，背脊抹圆，边齿微外侈，上部稍窄，下部略宽，可谓箕形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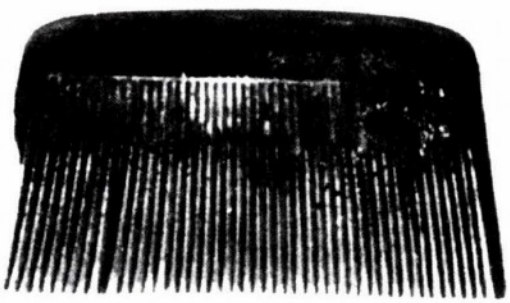
北朝时期的箕形梳篦，主要发现于北方和西北地区。山西大同东郊北

魏昭成皇帝什翼犍曾孙元淑墓的木梳[1]、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北朝七郎山 M18 的木梳[2]、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凉沮渠蒙逊的夫人彭氏墓的木梳〔图 92〕，青海北朝西宁“凌江将军”墓的象牙梳，汉魏洛阳城金墉址 H2 的骨梳，均为箅形。这一时期的梳篦，背脊微弧作漫圆状，两侧斜直，而且明显地外侈，可谓名副其实的簸箕状。

隋唐时期的箅形梳篦，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尤以西北新疆吐鲁番一带的出土数量最多。1960 年以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了数十件木质梳篦，几乎为清一色的箅形。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箅形梳篦，在形态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新疆吐鲁番、轮台一带出土的木质梳篦，梳背的高度一般小于梳齿的高度〔图 93〕；河南偃师一带出土的骨角梳篦，梳背的高度往往大于梳齿的高度；江苏丹徒、安徽淮北、陕西西安、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出土的骨角梳篦，梳背的高度与梳齿的高度通常相差不



[图92] 木梳—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凉彭氏墓出土



[图93] 木梳—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1]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 年 8 期。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图94] 角梳—江苏丹徒丁卯桥唐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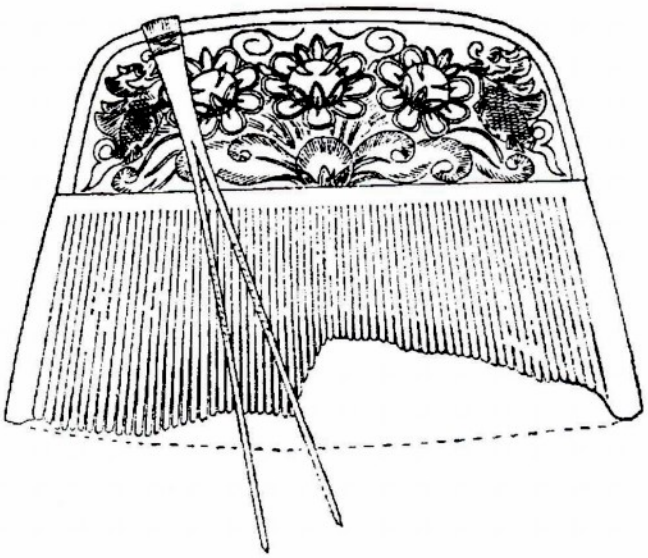
[图95] 牙栉背—台北故宫藏

多〔图 94〕。

在陕西西安、河南伊川、浙江临安等地唐、五代时期的墓葬中，还常见各种玉石、玛瑙、水晶、琉璃、骨牙等质地的半月形栉背。《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器目录》中就著录了一件唐代牙栉背，其连接梳齿的部位有凹槽一道，并有数十道凿梳齿之遗痕。〔图 95〕。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了一件玉背角篦，上部为一半月形玉栉背〔图 96〕，下接梯形篦齿，整体呈箕形。因此可知，那些半月形的栉背，原本应是箕形梳篦的上半部。

到了宋代，箕形的梳篦已经很少见了。陕西陇县城西北原子头宋代墓葬出土的两件骨梳[1]，在形制上虽属于箕形，但其高度均不及 3 厘米，而且梳

[1]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96-1]



[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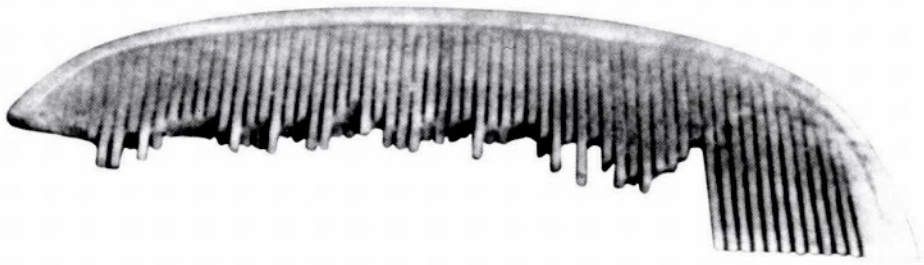
[图96] 玉背角篦
1. 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整体）
2. 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局部）

齿是用较细密的竖线刻成的，并不能使用，显系冥器。

箕形梳篦，线条明快，造型美观。这种形制的梳篦，继承了汉晋时期马蹄形梳篦的衣钵，自北朝时期开始兴起，唐代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而五代以后却逐渐衰落下去了。其形制演变的主要趋势为：上端渐窄，下端渐宽；背脊由圆弧到平弧，边齿愈来愈外侈。

欣欣向荣的半圆形

半圆形的梳篦，通体上端弧曲，并向两侧下延，一般梳齿的长度由中央向两侧依序递减，梳背多呈月牙状。这种形制的梳篦，最早见于唐代，历经



[图97] 骨梳—安徽淮北柳孜T8出土

辽、金、宋、元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始终较为盛行，其分布地域也相当广泛，几乎包括了全国各个地区。

已知最早的半圆形梳子，见于唐代薛儆的墓葬。该墓位于山西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由于多次被盗，墓内的随葬品已经所剩无几，仅在三号盗洞之中发现一件骨梳，已断为三块，残高 1.8、残宽 6.5 厘米。这件骨梳的梳背很窄，齿缝较密。据墓志记载，薛氏为望族，世居河东汾阳。墓主薛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至岐州等州刺史，卒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1 年〕。

五代时期，半圆形的梳篦，在中原、东南、西南地区均有发现。

安徽淮北柳孜五代遗址 T8 出土的半圆形骨梳，梳背很窄，背脊平弧，梳背与梳齿之间的界限较为分明，同薛儆墓骨梳的形制相似〔图 97〕。

湖北武昌阅马厂五代墓出土的半圆形木梳，梳背较窄，但背脊较厚，梳背与梳齿之间的界限较为分明。

河北曲阳五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出土的半圆形玛瑙梳，梳背较宽，背脊圆弧，梳背与梳齿之间的界限不甚分明。

江苏五代海州刺史赵思虔夫人王氏墓出土的半圆形木梳，梳背也较宽，有的背脊较圆弧，有的背脊抹角，梳齿较多，齿缝较密。

辽金时期，半圆形梳篦主要发现于北方和东北地区。

河北宣化辽张匡正墓出土的骨梳和张文藻墓出土的木梳，形制雷同，背部较宽，背脊圆弧，沿背脊刻一道阴线，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穿孔，齿根部参差不齐，梳背与梳齿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河北宣化辽张世本墓出土的骨梳，背部亦较宽，其上雕有叶形小镂孔，梳背与梳齿之间不见明显的分界线。



[图98] 牙梳–香港关氏藏

同样形制的骨梳，还见于北京延庆辽墓，只是后者梳背的两侧无小穿孔而已。

辽宁朝阳前窗户辽墓出土的象牙梳，梳背较窄，两端平直，梳齿较长，梳背与梳齿之间界限较为分明。《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器目录》中著录了一件牙梳，两端平直，梳背与梳齿之间阴刻两道弦纹间隔。

北京通县城关金墓出土多件骨梳，均呈半圆形，梳背上有圆形的小镂孔，有的梳背上涂黑漆并描金线。形制相似的牙梳，在《关氏所藏中国牙雕》中著录一件，其梳背与梳齿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梳背上也有圆形的小镂孔〔图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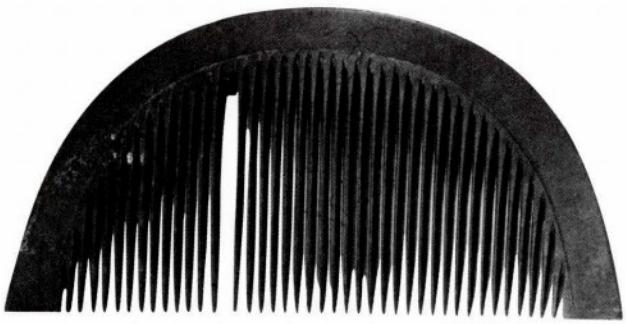
两宋时期的半圆形梳篦，主要发现于中原、东南、西南地区，以及南方地区。

河南郑州黄委会宋代遗址的骨梳[1]、郑州商城宋代遗存出土的骨梳，以及江苏无锡宋墓出土的木梳，梳体扁薄，梳背很窄，背脊平弧，梳齿稠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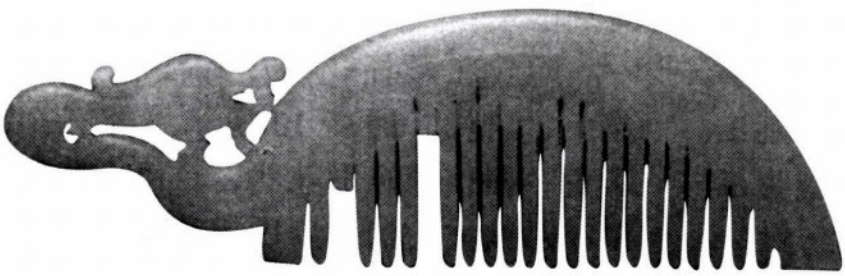
福建福州南宋黄升墓的角梳，梳体略厚，梳背稍宽，背脊微圆弧，梳齿稀疏〔图 99〕，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的木梳，形制与之相同。

江苏武进宋墓和安徽六安宋墓出土的包金箔木梳和角梳，梳背的内缘往往刻有弦纹带；山西太原宋墓出土的木梳，江西彭泽宋易八娘墓出土的银梳，梳背上还装饰着精美的花纹。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1985 — 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图99] 角梳—福建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



[图100] 带柄玉梳—山东莒县于家庄出土

元代和明代的半圆形梳篦，多见于北方、东方和东南地区。

内蒙古正兰旗元上都砧子山元墓出土的木梳、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元墓出土的木梳、山东邹县元李裕庵墓出土的木梳、浙江海宁元贾椿墓出土的木梳，河北石家庄后太保村元墓出土的骨梳，以及安徽合肥明何杨氏墓出土的包金半圆形角梳等，这些梳子的背脊圆弧，梳背的内缘往往有刻有弦纹带或浅槽，梳齿大都较为密集。

山东莒县于家庄明代遗存中出土了一件半圆形玉梳，梳背较宽，背脊圆弧，一侧弧曲，另一侧弯曲作回首的夔龙状柄，梳齿稀疏〔图 100〕。

无论在清代皇宫所用的梳妆用具之中，还是在清代民间的梳妆用品之中，很容易见到半圆形的梳篦。尤其是清宫的半圆形梳篦，梳背较宽，背脊圆弧，形态多样，既有上弧下直者，又有上下皆弧者，还有一侧带柄者〔图 101〕。

半圆形梳篦，线条流畅，造型优雅。这种形制的梳篦，始见于唐代中期，自五代时期开始流行，辽、宋、金、元时期更加蒸蒸日上，到了明清时期风行的势头依然不减。尽管其形态多样，但总体演变的趋势为：中间与两端在宽度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梳背与梳齿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



[图101] 玳瑁梳具—北京故宫藏

后起之秀的弓形

弓形梳篦，上端圆弧，下端亦圆弧，两侧斜直内收，梳齿居中且等长。这种形制的梳篦，流行于明清时期。

明代的弓形梳篦，大都集中发现于东南地区。

上海市郊的明墓中出土两件弓形木梳，大小各一，形制相同，背脊均较为圆弧。据墓中发现的纸木度牒得知，墓主张永馨为一道士，其下葬的年代应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1]。

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和两位夫人的合葬墓中出土三件弓形木梳，虽然规格大小相近，但形态却有尽相同，其中两件木梳的背脊圆弧，梳齿较稠密，而另一件木梳的背脊平弧，梳齿稀疏。墓主朱守城为当时一文人雅士，下葬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2]。

[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3年11期。

[2]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5期。



[图102] 象牙梳—台北故宫藏

上海浦东明陆深和其子陆楫夫妇的墓葬，“十年内乱”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在征集回来的六件木质梳篦中，有五件属于弓形。这些梳篦的背脊，有的圆弧，有的平弧，梳齿也有疏稀之别。据墓志的记载，陆深死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陆楫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4 年〕时便早夭了，陆楫之妻死于明万历年间〔1 ～ 1619 年〕。

上海卢湾潘氏家族墓地中潘允徵夫妇墓、潘惠夫妇墓均发现多件木梳。该墓地的发掘简报中虽未用文字介绍这些木梳的形制，但从潘允徵墓的平面图来看，该墓室中出土两件木梳，一大一小，放在死者潘允徵的帽子里，其形状均属于弓形。据墓志得知，潘氏是明代晚期上海一带的名门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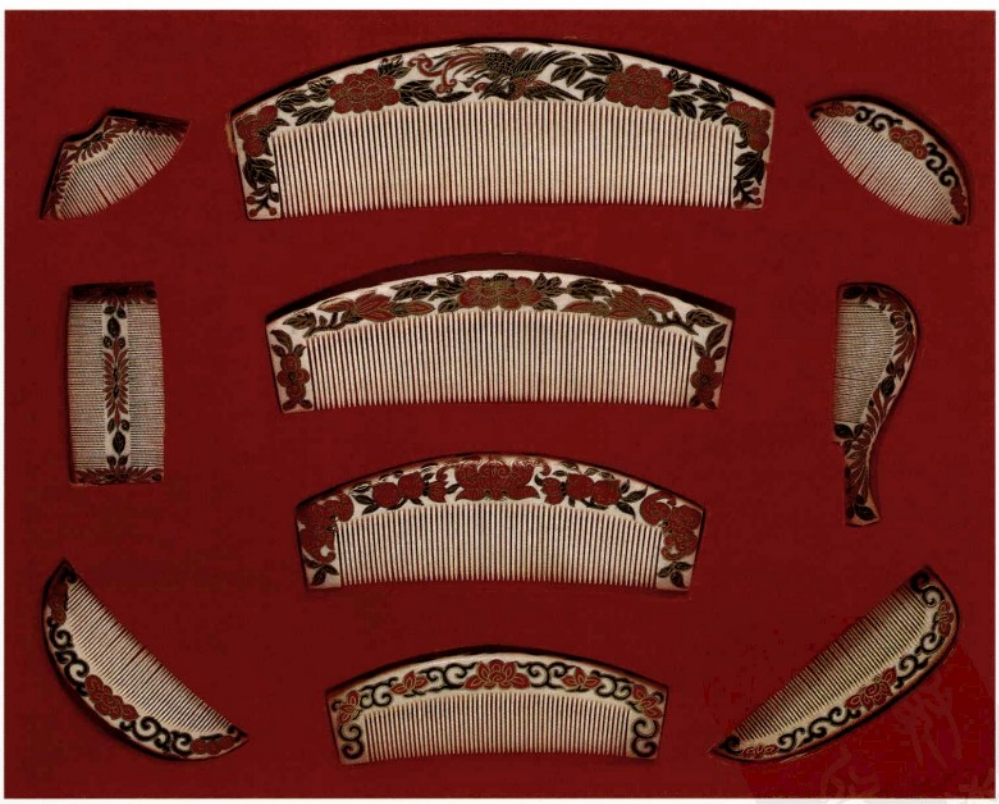
江苏无锡甘露明华师伊和夫人张氏的合葬墓中出有五件木梳，皆为弓形，形制相近，只不过有的背脊较为圆弧，有的背脊微弧近平。据墓志记载，其下葬的年代当为崇祯二年〔1629 年〕。

江西广丰明郑云梅墓出土两件木梳，一大一小，均系弓形，背脊较为圆形。据墓志，墓主郑云梅任奉直大夫、象州刺史等职，下葬于 1614 年。

清代的弓形梳篦，尚未见到发掘品。不过，在各地博物馆的藏品中，不乏其物。《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雕器目录》中著录一件弓形象牙梳，年代为清前期，这件象牙龙纹八宝梳，梳背厚而圆弧，梳齿居中而等长，梳背两面皆浅浮雕双龙争珠纹，其两端又各浮雕佛家八宝，依序为轮、螺、伞、盖、舆花、罐、鱼、肠〔图 102〕。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后期梳具中，有多件弓形化学梳篦〔图 103〕，还有多件弓形象牙梳篦，有的其上往往描金绘彩〔图 104〕。



[图103] 化学梳篦—北京故宫藏



[图104] 象牙梳篦—北京故宫藏

弓形梳篦，曲直相宜，和谐统一。这种形制的梳篦，迟至明代中晚期已经融入了时尚梳篦的主流。从渊源上来讲，弓形梳篦应是半圆形梳篦和扁方形梳篦相结合的产物，其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背脊由圆弧逐渐趋于平弧。

气象万千的联背形

联背形栉，两端为齿，当中为背，而两端的齿正是通过中间的背紧密地连成在一起的，故而称之。这种联背形栉，最早见于东周时期，在汉代、宋代、元代，乃至清代依旧可以见到。

河南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墓的五号陪葬棺中，出土了一件木栉。这件木栉是一种梳篦同体的形态，即上为篦，下为梳。篦齿细密，梳齿稀疏，背的中部有一道凹槽。通高 12 厘米、宽 3.4 厘米、厚 0.8 厘米。栉材为硬木，髹以黑漆。据研究，狮子地一号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1]。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联背栉。

在新疆于田县圆沙古城附近的古墓中也出土了一件木质的联背形栉。这件木栉仅残存一半，上下两端皆有较长梳齿〔图 105〕。圆沙古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东周至西汉时期。

新疆库车县苏巴什遗址西寺区 T2 出土了一件木质联背形栉，残存一半，



[图105] 木栉—新疆于田圆沙古城古墓出土

[1]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 年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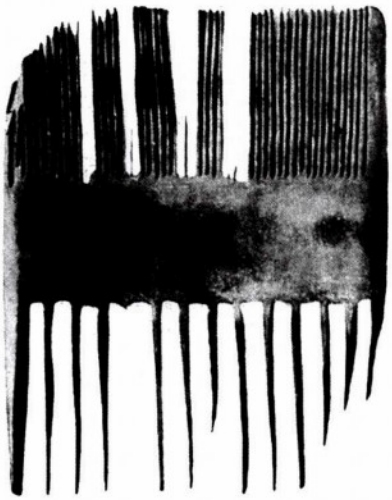
上下两端有齿，一端细齿较密，另一端粗齿较疏。该遗址还出有五铢钱和汉文残纸等遗物，因而推测其年代可能相当于汉晋时期。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托和沙赖古坟中，也曾经发现了两件木质的联背栉。这两件木栉上下两端皆有齿，一端齿细密，一端齿稀疏，属于梳篦同体的形态〔图 106〕。一件高 11 厘米、宽 8.5 厘米、厚 1 厘米，背上还装饰有三个等距离的同心圆纹饰。另一件高 10.6 厘米、宽 7.5 厘米、厚 1.1 厘米，背上光素无纹。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写道："我在罗布淖尔曾拾梳篦各一，因有汉简同出土，故我断定为汉代遗物。则此一件两面有齿，具梳篦两用，时代疑稍晚，但其来源则一也。"鉴于这两件木栉，在形态上与苏巴什遗址出土的木栉相同，估计其年代亦应属于汉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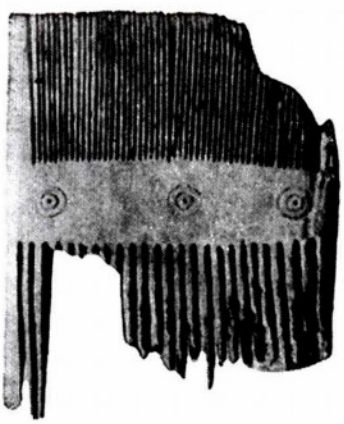
新疆民丰安迪尔西遗址也发现了一件木质的联背形栉，一端为梳，另一端篦，中间的背上还有两个小穿孔，估计其年代可能亦相当于汉晋时期。

宋元时期的联背形栉，多见于东南地区。

江西南丰桑田乡北宋墓中出土了一件木质联背形栉，上端为篦，齿



[106-1]



[106-2]

[图106] 木栉
1. 新疆托和沙赖古坟出土
2. 新疆托和沙赖古坟出土



[图107] 纸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



[图108] 银栉—江苏苏州元墓出土

呈桃尖状；下端为梳，梳齿平齐；中间的背上有一孔，整体呈圭形[1]。这种形态的梳篦，十分少见。

江苏武进村前乡蒋塘村南宋墓中出土了一件联背形竹栉，上下两端均为细密的篦齿，中间的背部凸起，两侧有粗大的边齿，整体近圆角长方形。

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出土了两件纸质的联背形栉。这两件纸栉，上下两端皆剪出细密的篦齿，整体呈抹角长方形，显然系冥器〔图 107〕。

江苏苏州元代墓中出土了一件银质的联背形栉，上下两端均有细密的篦齿，中间的背部向上突出，整体近椭圆形〔图 108〕。

在《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 饰物》一书中，介绍了河北等地民间收藏的清代梳篦，其中就有用象牙、白银、黄铜、紫檀等材料制成的联背形栉〔图 109〕。这些栉的左右两侧有细密的齿，中间背部的下端有一手柄。人们一般将其称作“胡梳”，视为男子的心爱饰物。

《玉丁宁馆捐赠骨牙竹木雕目录》中著录一件清代联背形牙栉，全器为竖长形，左右两侧各有 81 枚细密的篦齿，中间以象牙为背，下部有一手柄，柄的末端作兽头状，两侧还有对穿的小孔，以供穿坠〔图 110〕。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帝后的妆用具之中，联背形栉的种类较多，既有竹质的，又有象牙质的，还有化学的，其形态亦多样，有的呈圆角长方形，有的呈椭圆形。

[1]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考古》1988 年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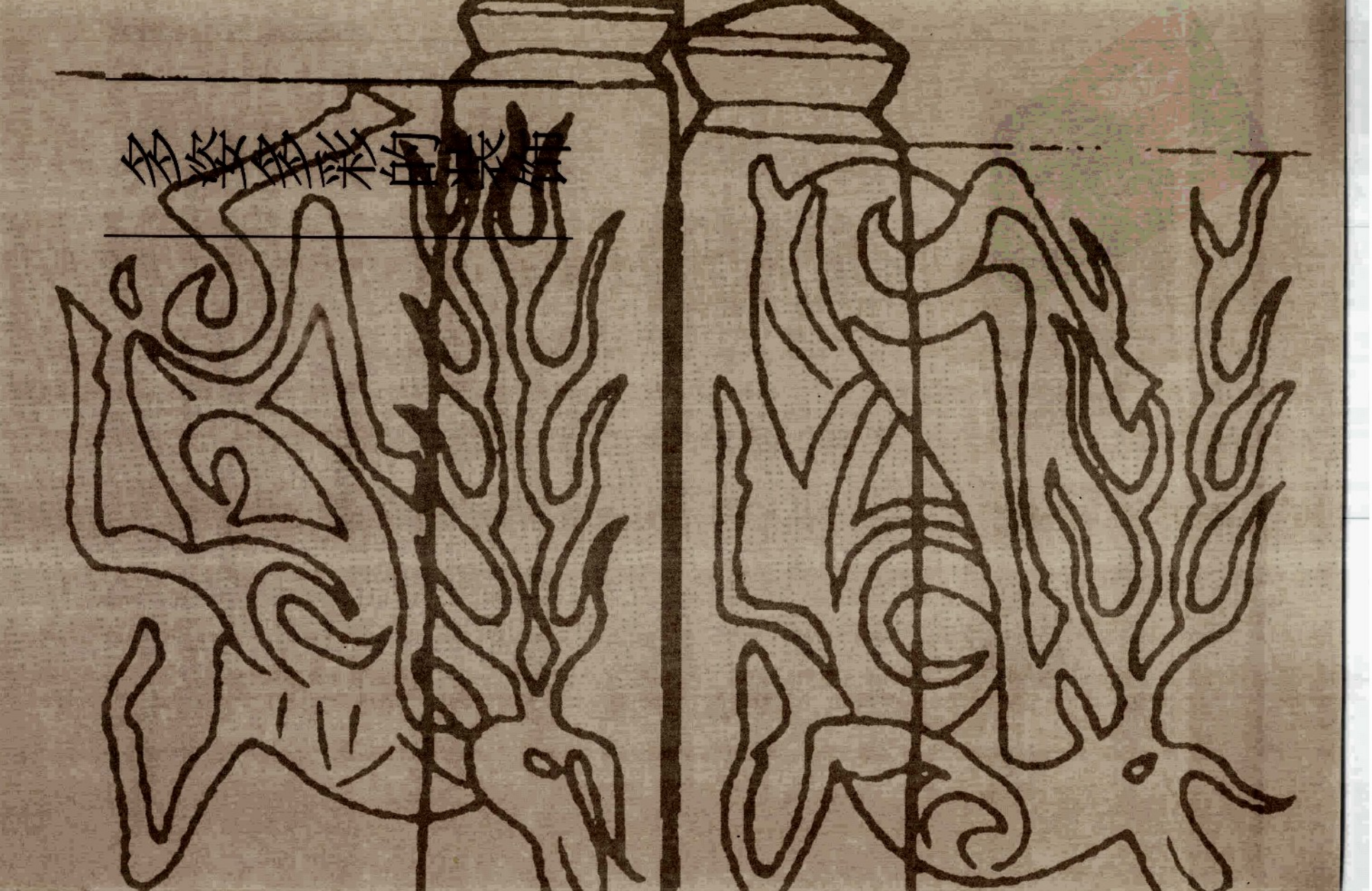
[图109] 铜栉—河北民间藏

联背形栉，结构复杂，造型奇特。这种形制的梳篦，在造型上综合了长方形、扁方形、半圆形等不同的形体。东周至汉晋时期，这种联背形栉，全器为竖向的长方形，上端的齿数较多，齿缝较密，下端的齿数较少，齿缝较疏。自宋代以来，这种联背形栉，全器多为横向的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一般上、下两端的齿数均较多，齿缝也更加细密。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带柄的栉，俗称“胡梳”、“胡篦”。这种“胡梳”、“胡篦”在形态上与宋元时期的横向联背形栉相近，只是在一侧加上了一个手柄而已。



[图110] 玉栉—台北故宫藏





从工艺的角度来讲，古代的先民大体采用了刻、雕、绘、描、镂、錾、镶、嵌、压、烙等不同技法，主要通过线条、色彩和工艺效果，来展示梳篦内在的美感；同时，还以精美的奁盒、鲜艳的栉袋，运用巧妙的组合与精致的装潢，来展示了梳篦外在的美感。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斑斓夺目、绚丽多姿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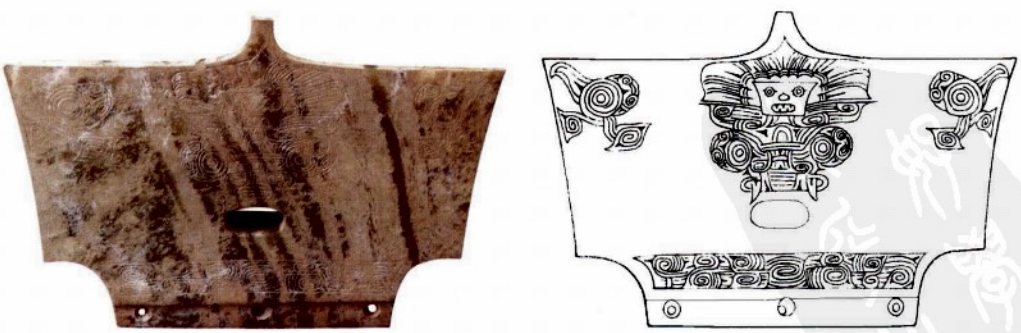
细致入微的琢刻

琢刻主要是运用线刻和浮雕等技法，在骨牙、竹木、玉石等材料的梳篦表面上琢刻出纹样，其作风细腻，形象生动。这种装饰手法，从史前时期，历经商周、汉魏、唐宋，直到明清时期，自始至终较为流行。

史前时期，梳背上的琢刻纹样，尚不多见，良渚文化玉质梳背饰上的神人、神兽纹，可谓史前时期最精致的琢刻之作。

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墓地 M2 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这件梳背饰的正面中间线刻神人兽面图案，上部为神人，头戴羽状大冠，脸庞作梯形，目、鼻、口一应俱全，并刻出张开的双臂；下部为兽面，椭圆形的眼眶中以重圈作眼，一侧刻有三角形的眼角，蒜状鼻下侧用卷云纹刻出鼻孔，长扁形的嘴里刻有四枚粗壮大獠牙，其中内侧两枚朝上，外侧两枚向下。该器的底边刻有一道卷云纹带，两侧角各刻一引颈回首的鸟纹图案。整幅图十分清晰地表现了神人凌驾于兽面之上的情形〔图 111〕。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也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其正面琢刻兽面图



[图111] 神人兽面纹玉梳背饰—浙江余杭瑶山M2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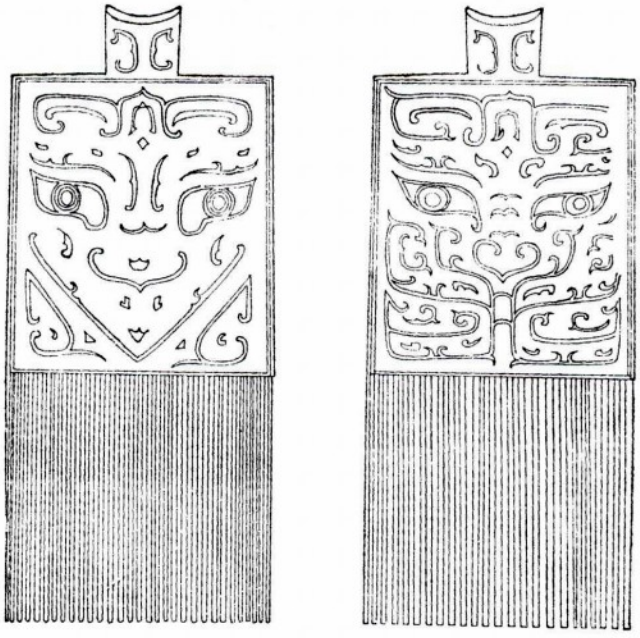


[图112] 兽面纹玉梳背饰—浙江余杭反山M17出土

案，椭圆形的眼眶中以重圈为眼，眼内又用短弧线分割，两眼之间与蒜头状的鼻内填满了卷云纹；长扁形的嘴中上下各一对粗大的獠牙，嘴下为带有三爪的双足。其中的眼、鼻部为浅浮雕，额、嘴和双足部为阴线细刻，以浅浮雕和阴线相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一只蹲踞状的神兽〔图 112〕。相似的图案也见于瑶山 M11 出土的玉质梳背饰上，只是后者省略了双足而已。

商代伊始，梳背上的琢刻纹样日趋发展。商代前期，主要流行简单的几何形图案；商代后期至西周时期，主要流行繁缛的兽面纹图案。

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骨梳、玉梳，殷墟侯家庄 M1003 出土的象牙梳，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M3 出土的牙梳，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M309 出土的



[图113] 兽面纹牙梳（两面）—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M202：1



[图114] 涡旋纹骨梳—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

象牙梳，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 M202 和 M251 出土的象牙梳，这些梳子的背上都琢刻有兽面纹。这一时期的兽面纹，通常都有卷云形双角，粗而长的双眉，“臣”字形眼，圆睛，两侧有耳，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如出一辙〔图 113〕。

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了一件骨梳，梳背上刻有两组涡旋纹，既似变形的兽面纹，又似云气纹，给平板的梳子增添了几分动感〔图 114〕。

东周时期，梳背上的琢刻精品，当数河南洛阳东周王陵区域内 C1M5560 出土的象牙梳。这件象牙梳，为白色，梳背用斜线条纹带分割成两半，间饰对称的两只动物。而

这两只动物应为一对凤鸟，身负一圆形之物，相对而立〔图 115〕。

东周时期的梳背上，还流行细密繁缛的云纹等。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一号楚墓的玉梳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玉梳，梳背两面均刻有精细的云纹〔图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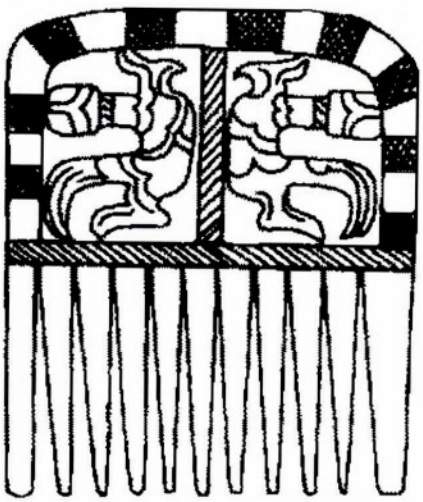
秦汉时期，梳背上的琢刻纹样，以动物形纹最为精美。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地 M47 中出土的木梳，梳背两面均有浮雕花纹，一面为一匹奔马，马头作鸟头状，尖嘴大眼，但有耳与特大的长颌，马尾上翘并长垂至地，边框为圆圈纹；另一面为怪兽，兽头亦作鸟首状，四只粗壮，爪足立地，长尾上卷，口里正吞食动物，被吞噬的动物一足尚垂于其口外〔图 117〕。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M14 出土一件木梳，梳背上刺刻两只雄鹿，这两只鹿一正一反，作奔跑状。头顶长角，枝繁杈茂，鹿的身躯以极细的轮廓线勾勒，凸现出轻盈的神态〔图 118〕。

北朝时期，梳背上的动物形纹样仍然流行。青海西宁北朝“凌江将军”墓中出土一件象牙梳，梳背两面皆有刻纹，一面上刻双龙，另一面刻双凤，边缘饰锯齿纹〔图 119〕。

唐、五代时期，梳背上的琢刻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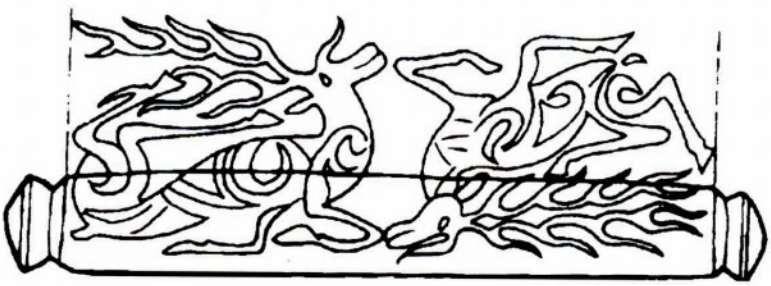
[图115]双凤纹牙梳—河南洛阳东周王城C1M556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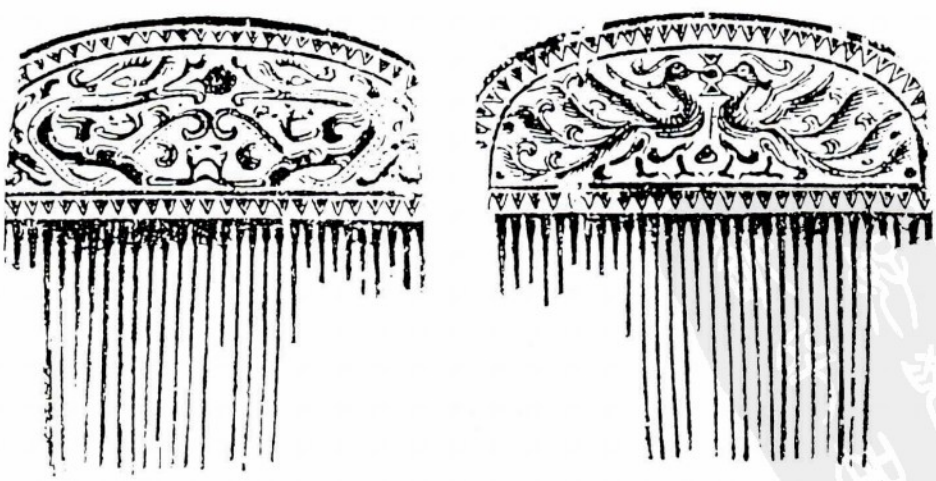
[图116]云纹玉梳（局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图117] 动物纹木梳（两面）—湖山云梦睡虎地M47：93



[图118]双鹿纹木梳（局部）—新疆且末查滚鲁克M14：33



[图119] 动物纹牙梳（两面）—青海西宁北朝墓葬出土



[120-1]



[120-2]

[图120]花卉纹玉栉背
1. 陕西西安茅村唐墓 M13 — 1 — 1
2. 陕西西安茅村唐墓 M13 — 1 — 2

样，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以花卉纹和飞鸟纹最具特色，尤其是玉栉背上流行的平行短阴线刻划的表现手法，与同时期绘画作品中线描的手法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在唐代的花卉纹样中，最为流行的图案是在宽肥的叶片上有一朵或并排两朵、三朵盛开的花。陕西西安南郊茅坡村唐墓 M13 出土两件玉栉背，一件一面饰一朵牡丹花，一面饰两朵海棠花；另一件两面均饰两朵海棠花〔图 120〕。《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玉器》中著录一件唐代玉栉背，两面施纹，上饰三朵花瓣饱满的荷花〔图 121〕。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一件玉背角篦，玉背的两面刻花略有不同，一面并排三朵盛开的荷花，花的两侧饰一对相向而立的鸳鸯；另一面并排三朵半开状的荷花，花的两侧饰两尾相对而游的龙首鱼〔图 122〕。

在唐、五代时期的飞鸟纹样中，最为流行的图案是一对比翼齐飞的鸟。河



[图121]花卉纹玉栉背—北京故宫藏



[图122]花鸟纹玉栉背（两面）—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

南伊川鸦岭唐齐国夫人墓出土两件玉栉背，一件一面饰一对鹦鹉比翼齐飞，一面饰二童子戏球；另一件两面雷同，均一对展翅飞翔的孔雀。《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著录一件唐白玉栉背，双面压地隐起雕一对孔雀，昂首挺胸，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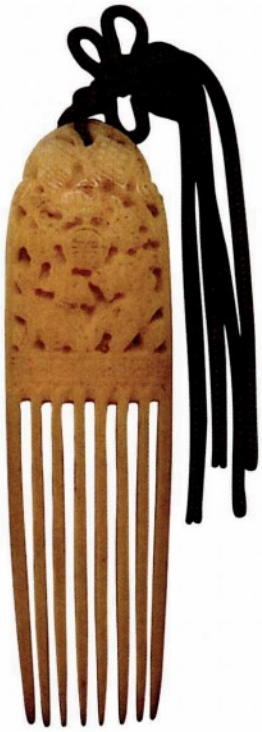
[图123]飞鸟纹玉栉背—中国文物信息中心藏



[图124]花卉纹象牙梳具—北京故宫藏

翅欲飞〔图 123〕。浙江临安玲珑镇五代康陵出土一件白玉栉，玉质莹润，正反两面各阴刻一对相视而立的鸳鸯，腹下饰一组如意纹。

清宫帝王使用的象牙梳背上，往往精雕细刻着各种花卉图案，或者刻以夔凤纹、团寿字作为装饰，格调素雅，又不失华贵〔图 124〕。《玉丁宁馆捐赠骨牙竹木雕目录》中著录一件清中晚期的牙胡梳，梳背中央减地深雕五只蝙蝠围绕团寿字，纹饰寓意“五福捧寿”；四隅则雕一函书、一床琴、两卷



[图125]动物纹牙梳—台北故宫藏



[图126]镂孔牙梳—山东宁阳大汶口M26出土

画卷与一盘棋，纹饰寓意“琴棋书画”〔图125〕。

神工鬼斧的镂雕

镂雕主要是运用透雕、镂空等技法，在骨牙、竹木、玉石等材料的梳篦上雕镂出穿透器体的纹样，其工艺精湛，内蕴深刻。这种装饰手法，始于史前时期，盛行于东周时期，秦代以较为少见，但辽宋时期又有再度兴起之势。

史前时期，梳背上的镂雕纹样，主要采用多孔组合的方式。

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墓地M26出土一件象牙梳，在近背脊顶端处镂出三个规则的圆孔，梳背的主体纹样是用平行的三道条状镂孔组成“8”字形，外周以长条镂孔作框，内里填“T”字形镂孔〔图126〕。这种以成组的镂孔所构成的装饰图案，堪称史前时代骨雕的杰作。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M15和M16各出土一件玉梳背饰，这两件玉饰均采用多孔透雕和阴线相结合的手法，勾勒出神兽和神人的图形。反山M15：7表现了一神人的形象〔图127〕，M16：4则表现



[图127]透雕玉梳背饰—浙江余杭反山M15出土



[图128]透雕玉梳背饰—浙江余杭反山M16出土

了两个神人和一个神兽的组合形象〔图 128〕。这两件梳背饰的纹样，给人以神秘、超然之感。

东周时期，梳篦背上的镂雕纹样，以动物形纹饰最为流行。

湖北荆州天星观楚墓 M2：56 — 2 的角篦上，透雕两只鹿[1]。鹿身相背，鹿首相向，鹿尾相连，后肢交错，作奔行状。鹿首回顾，长鼻，杏眼，张口

[1]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图129]透雕双鹿角篦—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



[图130]透雕双凤玉梳—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屈颈，尖耳后立，鹿身肥硕，肌肉发达，前肢微屈，后肢抬起〔图129〕。这两只鹿刻画得栩栩如生，极为生动传神，表现出一种健壮、飞奔的活力。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M2出土一对透雕的木质梳篦，梳背上雕镂出两朵云纹，篦背上则雕镂出两只凤鸟，双凤对称，张嘴相连。

河南信阳长台关二号楚墓的左侧室发现一件木梳，梳背上雕有一只鸟，尖嘴，圆眼，长腿，高尾，婷婷玉立，神采飞扬。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两件透雕玉梳。一件青玉制，梳背中部透雕首颈合一的蜷曲状双螭，上下为卷云纹，边缘阴刻S纹衬以细密的斜格纹，背面无纹，但留有雕琢稿的虚线。另一件黄玉制，梳背上透雕双凤，两凤对立作回首状，颈部相连，头顶有尖角状冠，尖勾嘴，长颈，翼斜立，尾下垂，足前屈，周身阴刻羽片纹〔图130〕。

那志良先生的《古玉鉴裁》中收录了两件东周时期的玉梳，梳背上均有透雕卷云纹，其装饰风格，与中山王墓的玉梳具有一定的共性。

东周时期的梳篦上，还流行一种半圆形的镂孔。这种镂孔广泛见于西南地区的楚墓，湖南长沙茅亭



[131-1]



[131-2]

[图131]镂孔木梳、木篦
1. 镂孔木梳—湖南长沙茅亭子一号楚墓出土
2. 镂孔木篦—湖南长沙茅亭子一号楚墓出土

子一号楚墓出土一对木质梳篦[1]，其背上均有半圆形的大镂孔〔图131〕。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出土的木梳，梳背镂雕出两个上下交错的圭形孔[2]。

辽、宋、金时期，梳篦上的镂雕纹样，以花卉纹饰较为常见。

河北宣化辽张世本墓出土两件骨梳，均为半圆形，镂雕的纹样亦相同，沿梳背边缘雕饰出数个叶形花孔。同样的装饰手法，也见于北京通县金墓出土的骨梳，只不过梳背边缘的镂孔不是叶形花孔，而是对称的小圆孔。

山西太原西郊小井峪北宋墓M68出土了两件木梳，皆半圆形，在梳背的两条弧线之间，雕饰缠枝牡丹花纹及二童子作跪拜状的图案。

江苏南京建中村南宋墓出土一件玉梳，其上透雕缠枝牡丹花纹，纹饰极其繁缛，雕工相当精湛。

在《玉丁宁馆捐赠牙骨竹木雕器目录》一书中，著录一件镂空牙梳，全器呈半圆形，梳背雕饰由数行镂孔所组成的花卉纹，花瓣部分尚添以白彩〔图132〕。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玉器》一书中，著录一件镂空玉

[1]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茅亭子楚墓的发掘》，《考古》2003年4期。

[2] 驻马店地区文化局：《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2期。



[图132]镂空花卉纹牙梳—台北故宫藏



[图133]镂空花卉双鸟纹玉梳—北京故宫藏



[图134]镂空花卉纹玉梳—北京故宫藏

梳，梳背正中透雕三朵形态相似的花草纹，两侧各有一鸟，鸟首相对，翅膀高扬，长尾下垂〔图 133〕。在《故宫藏玉》一书中，也著录一件镂空玉梳，梳背雕饰花卉纹，花卉纹样似意极细的绳带编结而成〔图 134〕。这几件玉

梳，无论在器物造型方面，还是在装饰风格方面，都与出土的宋、金时期骨梳、玉梳有诸多共性，应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

妙笔生花的彩绘

彩绘主要是运用各种颜色，在木骨梳篦上描绘出纹样，其色泽鲜艳，光彩夺目。这种装饰手法，自东周时期开始流行，秦汉时期相袭不革，两晋以后渐趋式微，但宋元伊始，髹漆、描金之风复兴。

东周时期的彩绘梳篦，其背部往往髹黑漆或涂墨，在黑地上分别用红、赭、黄、白等颜色的油彩或漆绘出纹饰。这一时期彩绘纹饰的题材，大体可分为几何纹、人物纹、动物形纹三大类。

东周时期，梳篦上彩绘的几何纹，主要有卷云纹、涡纹、点纹、方格、三角纹和弧线纹等图案。这一类纹饰，虽以简单的点、线、面构成图案，但由于结构方式的不同，加之色彩浓淡的变化，其纹样也是千差万别的。

湖南长沙楚墓 M89 出土的木梳，用褐黑彩在上部绘方格纹，下部绘两朵相交的云纹〔图 135〕。

湖北荆州枣林岗楚墓 M109 出土的木梳，以朱色绘饰四朵云纹，上



[图135]彩绘云纹木梳—湖北长沙楚墓M89出土



[图136]彩绘云纹木梳—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M74出土



[图137]彩绘云纹木梳—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M38出土

方的两朵相对，下方的两朵相交[1]。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263出土的木梳，用白色油彩绘出左右对称的卷云纹；M51出土的木梳，用红油彩绘出左右对称的卷云纹；M296出土的木梳，以赭色漆绘太阳纹、卷云纹、勾连云纹；M296出土的木篦，用红、黄赭色油彩绘太阳纹、卷云纹、点纹。

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M74出土的木梳，背部髹黑漆，绘以浓重的三角形花瓣状云纹〔图136〕；M38出土的木梳，背部髹黑漆，绘以淡雅的卷云纹〔图137〕。

四川成都商业街蜀墓10号船棺出土的木篦，以朱、赭两色分层绘出纹样，底层勾勒朱色线条，之上再涂抹颜色稍浅的赭色图案，具有浓郁的楚器作风。

东周时期，梳篦上彩绘的人物形纹，只见两人对揖的图案。

湖北襄阳蔡坡楚墓M12出土的木梳[2]，表面涂黑漆，两面均饰有桔黄色花纹，一面中间画一株树木，旁侧各画一人，两人作对揖状；另一面方画一交叉曲线，下方为二对称的瓶形纹。这种人物图案，也见于重庆

〔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科学出版社1999年。

〔2〕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1期。

三峡地区，瞿塘峡盔甲洞曾出土一件木梳[1]，表面涂黑漆，上绘有红色花纹，一面画两人，发髻高耸，广袖低垂，作对揖状；另一面的上下方也分别画有交叉的曲线和二对称的瓶形纹，其装饰风格，颇类楚国漆器。

东周时期，梳篦上彩绘的动物形纹，主要有凤、龙、怪兽、猴、雀纹等，这些图案也是千姿百态的。

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 M23 出土的木梳，两面各绘一对写实的双凤[2]。湖北江陵溪峨山楚墓 M1 出土的木篦，两面各画一对抽象的双凤[3]。

湖北江陵溪峨山楚墓 M7：42，用红、黄二色绘出几何纹，中间填以四只对称的雀鸟。湖北江陵九店楚墓 M526 出土的木梳，用赭色漆绘一只怪兽，作回首伏行状〔图 138〕。



[图138]彩绘兽纹木梳—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526出土

四川青州战国秦墓 M13 出土一对彩绘木质梳篦，木梳上，一面画一单凤，另一面画一单龙；木篦上，一面画一猴，另一面画一龙。

秦汉时期的彩绘梳篦，直接承袭了东周时期楚国漆木器的传统风格

[1] 童恩正：《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考古》1962 年 5 期。

[2]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 年 3 期。

[3]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江陵溪峨山楚墓》，《考古》1984 年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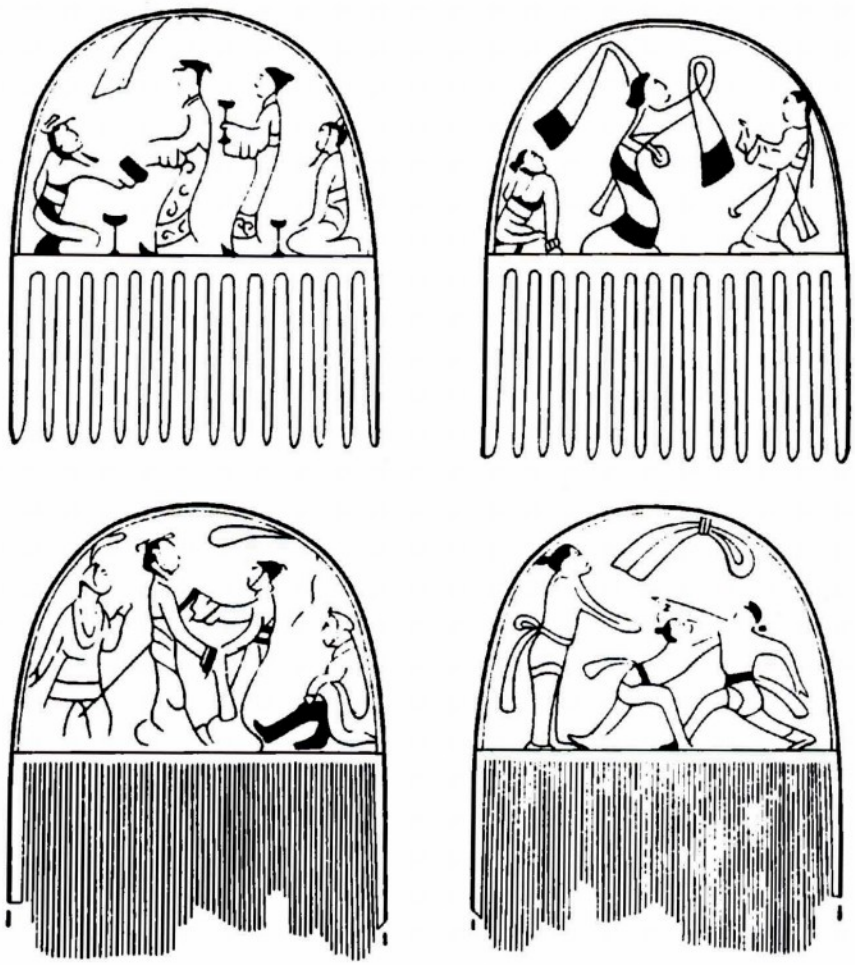
和装饰技法，通常在黑地上分别用红、黄、金、绿等颜色的油彩或漆绘出纹饰。这一时期彩绘纹饰的题材，以人物形和几何形纹为主。

秦汉时期，梳篦上彩绘的人物形纹样，大都以叙事为主，有宴饮、歌舞、送别等场面。

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中出土了一对彩绘人物纹木质梳篦，其画法是先用黑漆勾勒出人物形状，再敷以红、黄等色彩。木梳的正面，描绘的是一幅宴饮的场景。画面上共绘有四个人物，中间为二侍女，两旁各一男子。两个男子席地而坐，右边的男子头戴冠，左边的男子头挽髻，二人的面前各摆放一个盛食物的豆〔高足盘〕。两个侍女持物站立，头上挽髻，身着黄色裾裙，足穿双尖翘头鞋，其中一侍女手持酒杯正欲送到左边男宾的手里，另一侍女手中端着盛放食物的豆，随后缓行。木梳的背面，描绘的是一幅歌舞的场景。画面上绘有三个人物，中间一舞女，两旁一男一女。舞女的头发披于脑后，身着黄黑相间彩绘花纹的宽长袖交领衣与裾裙，腰间系红带，正甩动着宽大的长袖，翩翩起舞。右边男子手持一长柄圆盘形的木槌，正作敲击〔磬或锺〕之状，为舞者伴奏。左边女子跪于地上，发髻也披在脑后，上身穿交领衣，下身穿裾裙，正引吭高歌，为舞者伴唱。木篦的正面，为送别的场面。画面共绘四个人物，中间一对贵族男女，两旁各一男武士。中间的一对男女相对而立，靠左的男子，头戴冠，上身穿交领衣，下身着裾裙，腰间佩长剑；靠右边的女子，应为男子之妻，头挽髻，上身穿宽长袖的上衣，下着裾裙，两手和男子的双手紧紧相握，难舍难分，似正与出征前的丈夫送别。两旁的男武士，左边的作站立状，右边的足登长靴坐于地上。木篦的背面，为相扑到场面。画面上绘有三人，均为男子。这三个人，上身都没有穿衣服，下身只穿短裤，腰间系带，足穿翘头鞋。右边的两人屈腿展臂，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拼搏。左边的一人平伸双手，似全神贯注地为右边相扑比赛的两人作评判。画面的上部有一帷幕的飘带，表明相扑比赛是在帷幕里举行的〔图 139〕。

江苏扬州东风砖厂汉墓 M5 出土了一件彩绘木梳，梳背上的图案以云气为主，间有羽人各组，有的操琴，有的骑鹤。江苏东海尹湾 M6 出土的木梳，背上髹黑漆，并用朱色线条绘出奏乐饮酒的场景。

秦汉时期，梳篦上彩绘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卷云纹、圆圈纹、点纹、方格、弧线纹等。



[图139]彩绘人物纹木梳、木篦（两面）
—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 M168 出土一对彩绘木质梳篦，背部均用红、黑、金三色彩绘云气纹，左右大体对称。

湖北襄阳擂鼓台汉墓 M1 也出土了一对彩绘木梳篦，上绘左右对称的卷云纹，下绘三角条纹带，背脊上也绘有三角条纹带。

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 84LSIM49 出土一件木胎漆篦，在黑地上用红、黄、绿等色漆绘纹样，一面上饰弯月纹、圆点纹，下饰连珠线纹；另一面上饰连珠组成的方格纹，内填圆点纹，下饰连珠线纹〔图 140〕。类似的彩绘纹饰，亦见于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漆梳上。

宋元时期，梳背上髹漆的作法，较为常见。



[图140]彩绘几何纹漆篦（两面）—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84M49出土

江西德安桃源山南宋周氏墓出土了一个奁盒，盒内盛装三件木梳，一件髹黑漆，另一件髹灰漆，还有一件髹红漆。

内蒙古和林县金代墓出土的木梳，一面涂有红色漆，另一面涂有豆绿色漆。

北京通县金宣威将军石宗璧夫人的墓中出土多件骨梳，有的梳背上涂黑漆并描金线，惜出土时大部分已经剥落殆尽。

在清宫后妃所用的梳具之中，描金彩绘的梳篦，可谓比比皆是。其纹样的题材，大都为凤鸟、蝙蝠、祥云、菊花、莲花、寒梅等寓意吉祥的内容〔图141〕。

巧夺天工的模压

模压主要是运用加热、加压的方法，在金属梳篦或包镶金、银的栉背上塑造出纹样，纹饰样繁缛，富丽堂皇。这种装饰手法，唐代开始盛行，一直持续至明代。

唐代，金属梳篦上的模压纹样，以花卉、飞鸟、飞天的题材，最为常见。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一件金栉背，自上而下遍饰细密的纹样：背脊的边缘用细如棉线的金丝掐编成抱合式卷草纹样焊接其上，并在外围



[图141]描金带彩梳具—北京故宫藏



[图142]花卉纹金栉背—陕西西安何家村唐窖藏出土

以金珠连接出 14 个连弧形边饰；弧线以下又以掐丝焊接出的卷草纹样作底衬，叶片状的花结中填以密满的鱼子般大的金珠；下沿的边饰也以金丝掐编且附以细密的金珠焊缀〔图 142〕。

陕西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出土金栉背一件，两面均有花纹，一面为一对



[图143]飞天纹金梳（局部）—江苏扬州三元路唐窖藏出土

飞鸟衔花，另一面为一对鸳鸯噙莲[1]。

江苏扬州三元路唐代窖藏出土的一件金梳，梳背上装饰有细密的纹样。中心的主题图案为一对飞天，其中一飞天吹笙，另一飞天持板，下为如意，在飞天身旁布满镂空的卷叶蔓草纹；外周为细密的锦纹带；外缘以梅花、蝴蝶相间作为边饰〔图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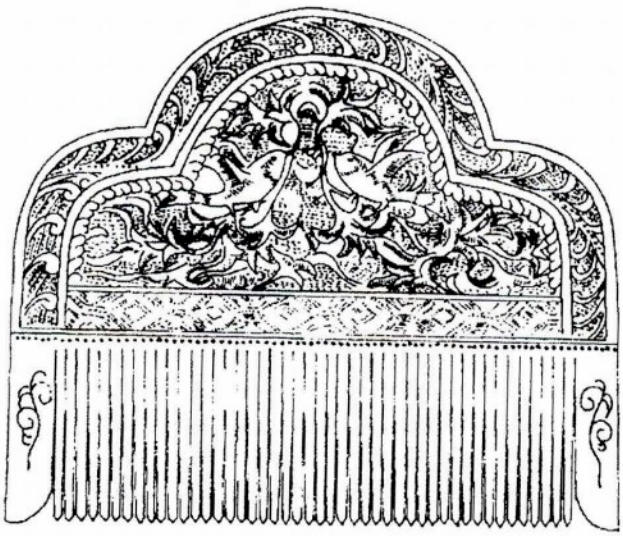
江苏镇西阳彭山唐弘夫人墓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银栉背，栉背两面的纹饰为模压后细部錾刻而成的，一面为四龟莲荷图案，另一面为四凤图案，其边缘均饰以联珠花蕊纹。

湖南保靖唐墓 M43 中出土银梳一件，梳背两面模压相同的花鸟纹饰。梳背的主题图案为双鸟朝阳，以连枝草叶纹作地纹，以连珠纹作间隔界限；外周用单叶草纹勾勒，下部边沿饰以重菱形纹，齿边用简单的缠枝纹装饰〔图 144〕。

湖南长沙市郊五代墓中出土银梳一件，用薄银片压成，梳背上饰卷草形花朵，边缘以连珠纹装饰。

在韩伟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中，介绍了一件唐代伽陵频嘉鸟纹银栉背，卡尔·凯波收藏。长 12.9 厘米，上圆下方，锤击成型。一面中心为坐伎，两侧各一伽陵频嘉鸟，一执琵琶，一执长箫，底衬以忍冬卷草，上面边沿围有团花，下面边沿中心为卷草，每侧各有三只飞翔的小鸟。另一

[1] 张云海：《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 年 2 期。



[图144]花鸟纹银梳—湖南保靖四方城唐M43出土



[图145]花卉纹银梳—江西彭泽宋易氏墓出土

面为相向鼓翼曳足的双鹤，其下有一株折枝，周围饰以山形云头。

宋、元、明代，金属梳篦上的模压纹饰，以花卉图案为主。

江西彭泽易氏八娘墓出土一件银梳，用银片锤錾而成。全器的装饰纹样，从内向外分为四层：第一层饰花瓣纹一圈，正中刻有“周小四记”字样；第二层饰五瓣朵梅花以圈；第三层饰镂空双狮戏球纹一圈；第四层用珠点、四叶纹银皮梳背〔图 145〕。纹饰繁缛，制作精细，颇具唐代的遗韵。

江苏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金栉背和鎏金银栉背各一件，金栉背的两面，是以吹焊法组成的卷草梅花图案；而鎏金银栉背的两面，则是压印五朵牡丹花图案。

河北石家庄后太保村元墓出土金栉背一件，表面压印有缠枝牡丹和莲瓣纹。

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出土的明代金栉背，其上锤錾、錾刻荷叶、荷花、鸳鸯纹，并用荷梗缠绕〔图 146〕。

江苏南京中央门回家山庙出土的明代金栉背，其上锤錾梅花数朵，也以缠枝相绕〔图 147〕。

两宋时期以来，包镶金、银的梳篦开始流行，因此模压这种装饰技法也见于包镶金、银的木质和骨角梳篦之上。

安徽合肥郊区宋马绍庭夫妇墓出土了两件木梳，梳背皆用金箔包镶，金箔的两端为四叶纹，中间九行团状花卉，采用了模压拍打的装饰工艺。

安徽六安花石咀宋元墓中出土角梳四件，梳背上残留镶包的薄金片一段，压印有“尧二郎”三个楷书字样。

江苏无锡窑窝里元钱裕夫妇墓出土一件木梳，镶包银边，其上压印有“陈万四郎”的文字。



[图146]花鸟纹金栉背—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出土



[图147]花卉纹金栉背—江苏南京中央门回家山出土

匠心独运的镶嵌

镶嵌是指将各种光辉耀眼的小型片状或圆状物，嵌到梳篦之上作为装饰，其构思巧妙，明快醒目。镶嵌的材料，主要有金属、玉石、珍珠、珊瑚等。这种装饰手法，自史前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在浙江嘉兴盛家墩良渚文化遗址征集到一件骨梳，梳背的正面有三条横向的凹弦纹带，在弦纹之间的两道凸棱上分别镶嵌着两排圆形红褐色的叶腊石片。这些小石片采用了凹窝嵌粘多方法，即镶嵌之前先在骨梳背上钻凿出两排圆形的凹窝，再将磨制好的石片粘上粘合剂后嵌入凹窝。这样以来，镶嵌后的小石片，其表面基本上与梳背表面平齐〔图 148〕。



[图148]镶嵌石片骨梳—浙江嘉兴盛家墩出土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七郎山北魏墓地 M18 中出土一件木梳，背脊上镶嵌三行横向的小铜乳钉，梳背的正中处还镶嵌有一排纵向的小铜乳钉，乳钉的规格大小相同〔图 149〕。

陕西咸阳唐贺若氏墓出土了一件金栉背，其上镶嵌有绿松石。

甘肃敦煌莫高窟 130 窟壁画中有太原王氏的供养人像，其头上所插的栉背上镶嵌着色泽鲜艳的红绿宝石。据题记得知，王氏为都督晋昌郡



[图149]镶嵌铜钉木梳—内蒙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七郎山北魏墓地M18出土

太守乐延环的夫人。

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画一插栉贵妇，其鬓发的栉背上也镶嵌着十分耀眼的红色和蓝色的宝石。

江苏南京幕府山宋墓发现一件金栉背，其上有七个圆圈，这七个圆圈等距离分布于背脊上端，据推测当为镶嵌珍珠所用，惜因年深月久，珍珠已经朽烂无存。

江苏武进村前宋代墓地 M5 中出土了多件木梳，其中一件插在发髻上，这件木梳的背脊上环嵌有细珍珠。

四川珙县洛表邓家岩明代悬棺墓中出土木梳一件，梳体用黑漆涂过，梳背的两面各镶嵌七个小铜片，小铜片形状为方形和三角形。

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银梳，在梳脊上往往嵌以珊瑚、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在《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 饰物》一书中著录多件银梳，一件梳体呈半圆形，梳背上錾刻蝴蝶纹，两侧各镶一红珊瑚珠〔图 150〕。另有一件梳体亦近半圆形，以錾花工艺成型，梳背的主题花纹为蝴蝶及水纹，背脊上装饰有九颗宝珠〔图 151〕。



[图150]镶嵌珊瑚银梳—民间收藏



[图151]镶嵌宝石银梳—民间收藏

五光十色的盛具

根据古代墓葬的发掘资料，史前时期的梳篦，多数是直接插上死者头上的；西周时期的梳篦，偶见放置于棺外铜盒之中的；东周时期的梳篦，大都放置在棺外的头箱或边箱内，它们往往被盛于用竹、木制作的奁盒之内。秦代以后，还出现了专门为梳篦量身定做的梳妆奁、梳篦盒以及栉袋。这些盛装梳篦的器具，造型优美、结构精巧、做工考究、色彩艳丽，堪称我国古代工艺品中的佳作。

西周时期的妆奁器具，目前发现得很少，陕西宝鸡强国墓地 M20 出土的

铜盒是已知最早用于盛装梳子的器具。这件铜盒的壁用铜圈围成，铜圈上下各有八组钉孔，盒底及盒盖均为木质，已朽。腹壁上部饰一周夔龙纹，夔龙长身，两两相对；中间有两周弦纹；下部饰一周凤鸟纹，两两相对，圆目，勾喙，高冠飘逸，分尾欲飞。出土时铜盒摆放在死者头端的棺椁之间，盒内盛有铜梳两件，还有铜发笄、小刀、凿等小件器物。铜盒已经残裂，经修复成形，高 10.9 厘米、直径 23 厘米。

东周时期，妆奁器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这一时期盛装梳篦的妆奁，主要有竹笥、竹盒，以及漆木奁盒。

湖北江陵九店、雨台山、包山、马山和荆州天星观等地的楚墓中，都发现了盛装梳篦的竹笥。这些竹笥，呈长方盒形，盖、身相套合，器高一般在 4 ～ 5 厘米左右。荆州天星观楚墓 M2 出土的竹笥较大，长 49.5 厘米、宽 26 厘米；江陵雨台山楚墓 M166 出土的竹笥较小，长 14.1 厘米、宽 9.5 厘米。东周时期的竹笥，大多数为素编，只有少量为彩漆。江陵九店楚墓 M410 出土一件彩漆竹笥，器盖和器身的口沿均用两块竹片内外相夹，盖壁的上端、身壁的下端各有竹片一周，竹片以细篾绞锁，盖的表层和器底以黑漆篾片为地，用红漆篾片编织矩形纹、“十”字纹，身壁和里层的编织相同，均由红、黑两色漆篾编成“人”字纹，内装木梳一件〔图 152〕。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 M712 出土一件竹盒，圆形，盖、身相扣合，表层分



[图152]彩漆竹笥—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410出土



[图153]彩漆木奁—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M26出土

别涂红、黑漆，以涂黑漆的篾片为地，用涂红漆的篾片编织花纹。盖面为矩形纹、“十”字纹，盖壁为几何纹。盖上还有用宽篾片编织的边框四道，盖面边缘三道，口沿一道，边框用细篾绞锁。通高 6.8 厘米、直径 16.1 厘米。盒内盛放梳、篦、竹签牌、笄、铜镜。

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多件盛装梳篦的圆形漆木奁盒，这些漆奁均为圆筒状，直口，直腹，平底，盖、身相扣合，内外髹漆。M569 出土的奁盒，器表黑漆上髹红漆，中间绘一只凤鸟，周围有云气所组成的纹样，外圈为二方连续的几何纹。出土时内置铜镜、木梳、木篦、小漆盒、铜刷柄等物。M1195 出土的奁盒，盖顶略凸，盖、底皆内髹红漆，外髹黑漆，整器纹样的特点是呈对称式环绕布局。器盖用黄、褐色彩绘，中部绘有两条对称的 S 形龙纹，龙头用朱线勾勒，线内平涂赭色，龙身用朱、赭色相间并加饰变形云纹，龙身有朱色云纹环绕，龙云交融，浑然一体。漆盒的中心有一圈连弧纹，内绘一马，作昂首奔腾状。器身的外围有三周装饰带，绘二方连续的云纹、菱形纹和变形凤纹，并用朱色勾线，线内平涂赭色和朱色。内置铜镜、木梳、木篦等物。

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地也出土多件漆木奁，M26 出土的奁盒，盖顶以变形凤纹三分圆形画面，器壁为变形云纹、草叶纹和几何形纹，内盛梳、篦〔图 153〕。

安徽青阳龙岗东周墓 M1 出土一件漆木盒，木胎较厚，盖、身套合严密[1]。盒盖为覆斗形状，中部嵌有一铜提环；盒身呈长方形，直壁平底，两长边对置四个铜环。内外髹黑漆，素面无纹，高 16 厘米、长 44 厘米、宽 49 厘米。漆木盒内盛有木篦、铜镞等物。

秦代盛装梳篦的妆奁，多为圆形单层漆奁。这一时期的奁盒，呈圆筒状，由器身与盖套合而成，直壁，平底，顶盖隆起，外表用红、褐漆绘出各种几何纹样。

湖北云梦睡虎地和云梦木匠坟等地的秦墓，出有这种圆形单层的漆奁盒。云梦睡虎地 M44 出土一件漆奁盒，器表用红、褐漆绘波折纹、鸟云纹、菱形纹、点纹等纹样，口径 22.4 厘米、通高 9.2 厘米。出土时，盒内盛铜镜、木梳、木篦各一件。

汉代盛装梳篦的妆奁，多为圆形漆奁。这种圆形漆奁，既有单层的，又有双层的。所谓双层的漆奁盒，通常是由盖、上层〔也有称中层盒〕、下层〔底盒〕三部分所组成的，其上层或下层往往被分隔成几个固定的格子，用于盛装梳篦。湖北江陵凤凰山、荆州周家台、襄阳擂鼓台以及山东临沂金雀山等地的汉墓，多出有圆形单层漆奁。湖北荆州高台和云梦大坟头、江苏邗江甘泉、安徽天长三角圩等地的汉墓，则出有圆形双层漆奁。

湖北江陵凤凰山秦汉墓地 M168 出土一件圆形单层漆奁，薄木胎，卷制，器身与盖相套合，盒身外壁与口沿内、盖内、内底的中部涂黑漆，并在黑漆地上满饰锥画花纹。盖顶共有七圈花纹：中心花纹为一只怪兽，其间填云鸟纹；第二、四圈为菱形纹、波折纹；第三圈绘三只怪兽相互追逐，间饰两只似兔之类的小怪兽和云鸟纹等图案；第五、七圈为云鸟纹；第六圈绘有鸟纹、卷云纹、三角形纹、圆点纹。盖的外壁上半部为云鸟纹，下半部与器内近口沿处均绘菱形纹和波折纹。盖的内里和内底也有锥画的云鸟纹、菱形纹及波折纹等图案。出土时，奁盒内盛放有梳、篦、镜各一，还有细竹签、竹管、竹片及铲形竹器。盖径 17.7 厘米、通高 11 厘米。

湖北襄阳擂鼓台 M1 出土一件单层圆奁，内髹红漆，外涂黑漆，整器遍饰繁缛的图案。盖的内外两面饰有花纹：盖外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云气

[1] 青阳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 年 2 期。

纹、变形鸟纹、波折纹、菱形纹和三角纹等几何纹饰；盖内在红漆地上，用黑漆绘人物和鸟兽等图案，人物面部和衣着及鸟、兽的主要部位填以白漆。盖内的中心花纹为变形鸟云纹等图案，其外圈由四棵树木将画面分成四组，一组为相向而立的男子两人，头戴冠，身穿长袍，腰佩剑；一组为相向拱手而立的女子两人，长发披于脑后，身穿长袍；一组为一男二女，男的抱剑回首，两女子在后紧相跟随；一组为一只人面兽身的怪兽。还有三只形似飞鸟的怪物穿插其间。底的内外两面也有花纹：内底在红漆地上用黑漆饰纹，其中心花纹为变形鸟云纹、圆圈纹等图案，外圈由三棵树分为三组画面，一组三男一女，另两组皆为一男二女和一只人面兽身的怪物，各组人物的衣着装饰与盖内的相同，惟动作略有差异；外底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变形鸟云纹等图案。此外，奁盖的外壁上部和器身的外壁下部，都是在黑地上绘红色变形鸟云纹、菱形纹等图案。盖径 25 厘米、高 9.7 厘米。清理时，奁盒内放置铜镜、木梳、木篦各一件。

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 M1 出土了一件彩绘双层银釦漆奁，薄木胎，平盖，圆筒形器身，盖边与盒口均镶嵌银釦。中层盒的盒身被分隔出三个小格，内装角篦、木篦、木梳各两件。盖面髹朱漆，绘黑色云气纹，周边绘几何纹，中间镶嵌银柿蒂纹。盒外髹黑漆，绘朱色云气纹和两周三角一纹边饰。盒内髹朱漆，素面无纹。直径 12.2 厘米、高 6 厘米〔图 154〕。

江苏邗江甘泉乡六里村左庄汉墓出土彩绘双层漆奁，上层作圆台形，内



[图154]彩绘双层银釦漆奁—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M1出土



[图155]彩绘双层漆奁—江苏邗江甘泉汉墓出土

分三格，出土时马蹄形格中放置木质梳篦五件。奁盖围绕圆心朱绘三辟邪，奁盖外壁朱绘云气纹和辟邪纹。奁身外壁仅底缘朱漆绘一圈勾连菱形纹，内底在褐漆地上朱绘勾连云气纹。直径 13.5 厘米、高 12 厘米〔图 155〕。

荆州高台秦汉墓地 M4，出土一件彩绘双层漆奁，已残，仅存中层下部和底层，奁盖腐朽无存。底层分作三格，其中一格内装木质梳篦各一件。该奁直壁，弧底，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中层外壁下部用红、深蓝和赭色绘云龙纹和逗点纹，但大多已经脱落。底层外壁下部朱绘简单的“B”字形纹样。残高 5.9 厘米、腹径 18 厘米。

汉魏时期，还流行一种多子奁。这种多子奁就是在圆形单层或双层的大奁内再放置多个小子奁盒，最少的有三个，称作三子奁；最多的有九个，称作九子奁。这些放置在大奁之中小奁盒，形状各异，用途亦不一，其中马蹄形的小盒，是专门用于盛装梳篦的，故而也被称作梳篦盒。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九子奁一件，盖和器身为夹纻胎，底为木胎。器分上下两层，连同器盖共由三部分组成。器表髹褐色漆，再在漆上贴金箔，金箔上施金、白、红三色油彩绘云气纹，上层放置手套、丝巾、组带、镜衣等物，下层凿出九个凹槽，槽内放置了九个小奁盒：椭圆形盒二、圆形盒四、长方形盒二、马蹄形盒一。小奁盒均为夹纻胎，器表在黑褐漆地上用金、白、红三色油彩绘云龙纹。大奁口径 35.2 厘米、高 20.8 厘米〔图 156〕。

江苏扬州西湖乡胡场村汉墓出土一件七子奁，夹纻胎，盖顶呈拱形，其上有三道凸脊，大奁内含有七个形状各异的子奁盒。全套器具均内髹朱漆，



[图156]九子奁—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57]七子奁—江苏扬州西湖胡场汉墓出土

外髹褐漆，用赭色在器表绘飞动的云气纹、圆点纹和不规则的几何图案纹饰带。所有盒盖的顶端均嵌柿蒂纹银箔，大奁盒的盖顶、腹壁，还分别贴有四只和三只银箔兽纹〔图 157〕。

江苏扬州邗江甘泉镇姚庄汉墓 M101 出土一件七子奁，木胎，顶盖中心为银箔柿蒂，柿蒂的中心嵌一颗黄色玛瑙，四叶上各嵌一颗鸡心心红黄玛瑙。外围三道银釦，中间夹两道纹饰带，绘如意云气纹，间饰虎、羊、驼、鸟、羽人等金银箔图案。大奁内一套子盒，有长方形盒二件，方形盒一件，圆形盒二件，马蹄形盒一件，椭圆形盒一件。各子盒的顶上亦嵌红玛瑙，器也有银釦，器表饰有银箔纹饰。



[图158]七子奁—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M4 出土一件双层七子奁，木胎，由盖、上层、下层三部分套合而成。漆色内朱外黑，内外皆施锥画云气纹，并加彩笔勾点。上层放铜镜，下层在底板上挖刻七个凹槽，嵌放不同形状的小奁盒：圆形三件、椭圆形一件、马蹄形一件，盝顶长方形二件。各子奁上的花纹与大奁基本上相同。直径 31 厘米、高 20.5 厘米〔图 158〕。

湖北荆州高台 M3 也出土一件双层七子奁，已残，仅剩奁盖的顶部、中层和底层的底部。底层分作形状各异的七格，即矩形大、小各一，圆形大、中、小各一，马蹄形和椭圆形各一。器表髹黑漆，盖内中央和中层的底部中央亦髹黑漆，盖内外圈与中层底部外圈以及底层各分格尼均髹红漆。凡黑漆地上均用锥画手法划刻纹饰和图案，髹红漆的部位则用蓝、黑二色绘纹。通高约 24.2 厘米、腹径 27 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双层六子奁一件，夹纻胎，微拱顶，直壁，平底。器身分上下两层，连同盖共三部分。上层器身的上半部套入盖内，下半部套在下层器身的外面。外表黑漆，内里红漆。盖面中心锥画云气纹，从内向外有十三圈纹饰带，其中有栉纹、飞鸟纹、走兽纹、云气纹以及各种几何纹。中层隔板上下、盖顶内、底内，均为黑地锥画云气纹。出土时奁的中层放置丝织品一束，木骰一枚，角镜一面，角梳篦各二件，木梳篦各一件，铁环首刀一件，丝棉镜擦二件，棕拂二件；下层放置六个小奁盒，盝顶长方形盒大小各一，圆形盒大小各一，椭圆形盒一，马蹄形盒一。

山东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一件双层五子奁，器身的下层内放置五个小奁盒，分布盛装梳篦、铜刷、脂粉等〔图 159〕。



[图159]五子奁—山东日照海曲汉墓出土

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一件五子奁，夹纻胎，由一圆筒形大漆奁和五件子盒套装而成。大奁盖顶中心嵌银质柿蒂形花纹，顶至四壁饰六道银釦，器身饰四道银釦，银釦间均髹赭色漆，盖内顶绘一黑漆“S”形独角游龙。

江苏仪征张家集团山汉墓 M2 出土一件四子奁，木胎，扁圆筒形，盖的上部分三层逐级高起，平顶，盖套扣在器身之上，平底。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并用红漆、褐漆在盖上部和侧面以及奁盒侧面描绘花纹图案，盖上部外圈绘曲线纹、弧线纹和圆点纹；内圈饰几何纹和云气纹，盖侧与盒侧均绘两道云气纹带。大奁内装小盒四件，圆形二件，长方形和马蹄形各一件，各小盒的外表均用红漆和褐漆描绘花纹。大奁口径 30.2 厘米、底径 30.2 厘米、通高 16 厘米。

江苏扬州西湖胡场汉墓 M17 出土三子奁一件，夹纻胎，奁分盖、身两部分，盖顶穹形，直腹，平底。内置圆形、长方形、马蹄形三子奁。器内壁朱漆，外表及内沿、底心皆髹黑漆地，以朱、灰两色漆绘。顶、腹绘云气纹带，并间绘奔鹿、羚羊、鸾鸟、羽人等图案；盖内顶绘变形双龙，内底绘简单云气。顶饰以银四叶、三叶柿蒂，盖边贴三银箔虎，器身外壁贴凤凰、猛兽及羽人骑兽图案。大奁口径 15.5 厘米、高 12.8 厘米。

江苏邗江甘泉乡六里村左庄汉墓出土一件三子奁，夹纻胎，有套盖，内口沿以及顶好底的中部均髹黑漆，余者均髹朱漆。奁身器表饰朱绘云气纹，



[图160]三子奁—江苏邗江甘泉汉墓出土

盖顶饰银四叶柿蒂，从盖顶中部向外朱绘四道纹饰带，分别为云气纹、怪兽纹、几何纹、云气纹贴银箔虎纹。子奁盒三个，分别为马蹄形、圆形、长方形〔图160〕。

江苏扬州西湖郭庄汉墓出土三子奁一件，夹纻胎，由一大漆盒及内装的圆形、长方形、马蹄形三个小漆盒组成。奁盒外髹褐色底漆，上饰赭色花纹，盒内髹赭色漆。盖顶嵌银柿蒂，盖面分别由短线、几何纹、井字纹、飞禽走兽纹和云气纹等形成三道纹饰带。奁身主体为鸟、鹿、龟等飞禽走兽纹饰。大奁口径14厘米、高11.9厘米。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8、安徽霍县迎驾厂汉墓和霍山县汉墓以及南陵麻桥东吴墓等，都出有盛装梳篦的马蹄形小奁盒，这些小奁盒当是从大奁盒中散落出来的，估计这些墓葬原本应随葬多子奁盒。

两汉之际的妆奁，除了上述的圆形漆奁以外，还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漆奁盒，也被用于盛装梳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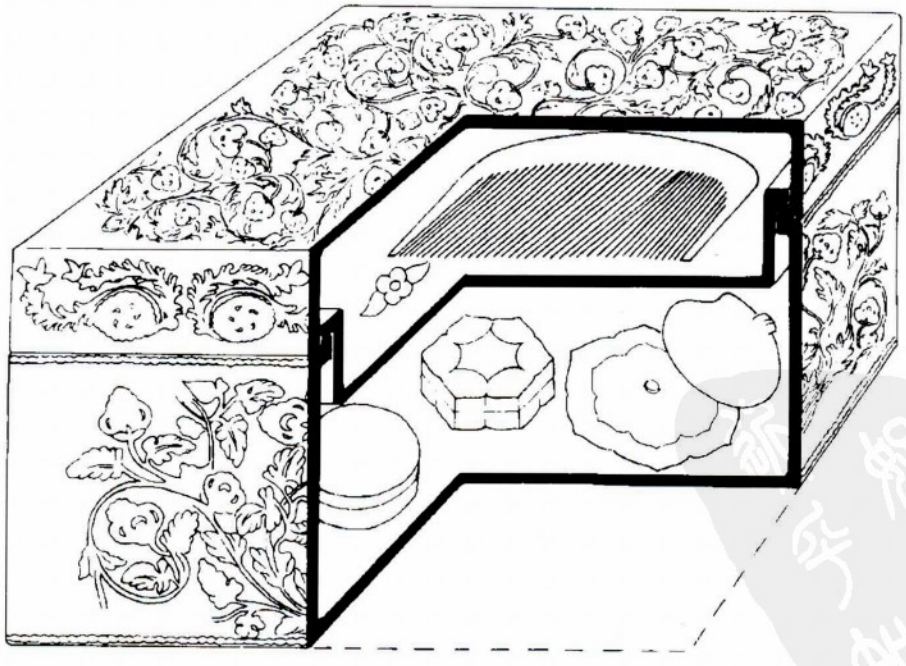
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M9出土两件长方形漆奁，木胎已朽。M9：171，长方形，奁盖四角各有一圆帽铜钉，中部有一铺首。奁前后两侧各有二铺首，左右两侧各有一铺首。奁内套一有盖的长方形盒，盒内分隔成四个小格，内有头发、木梳、木篦、铜刷、丝绵、粉球等。奁内髹红漆，外髹棕色漆，绘几何纹、卷云纹和飞雁、奔鹿、凤凰等动物图案。奁内的长方形盒内髹红漆，

以黑漆彩绘，中部为一凤，四角各有一雁。长 35 厘米、宽 18 厘米、高 10 厘米。M9：172 形制与前者相同，内髹红漆，外髹棕色漆，无彩绘图案，内装铜镜、木梳、木篦等物。长 36 厘米、宽 17 厘米、高 15 厘米。

广州 M4013 是一座东汉前期的墓葬，墓内并列男女。在女棺内出土一件长方形大漆盒，盒内放置有漆套盒、铜镜、木梳、漆篦、铜胎小漆盒、陶盂等物。

唐代盛装梳篦的妆奁，既有方形漆奁盒，又有圆形的漆奁和竹藤奁。

河南偃师杏园唐蒲州猗氏县令李景由墓出土一件漆木奁盒，保存尚好。这件漆盒呈立体方形，分器盖、器身两部分，结合处有子母口，漆盒外表装饰有繁缛的银箔平脱纹样，在极薄的银薄上剔刻出缠枝花卉图案，技法娴熟，纹饰细密。盒内物品分层存放，上层加一木屉，屉内装有骨梳及金钗饰物。木屉之下放置有圆形漆粉盒、鎏金银盒、小银碗和鎏金铜镜等。木漆盒的长、宽均为 21 厘米、通高 12 厘米〔图 161〕。河南郑州二里冈一座唐代小型砖室墓中也曾出土一件方漆盒，其主体花纹和尺寸大小，与李景由墓的漆木奁盒



[图161]方形漆盒（内部结构示意）—河南偃师杏园唐李景由墓出土

相近。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出土的漆木和竹藤梳妆奁，均呈圆形，子母口，内置木梳、粉袋、铜镜、铜钱等物。

宋元时期，主要流行一种花瓣式筒形奁盒，这种奁盒器身有的为六棱莲瓣式，有的八棱莲瓣式，还有的为十二棱莲瓣式。

江苏武进村前乡南宋五号墓出土一件漆奁，作十二棱莲瓣式，分盖、盘、中、底四层。器盖用弧形莲瓣为肩，盖面上戗刻园林仕女图案，仕女二人，梳高髻，着花罗直领对襟衫，手中执团扇、折扇，挽臂而行，旁有女童。园中铺石径，设藤凳，有山石、柳树相衬。自盖至，底，各层器口用银釦镶口，器身上细刻对称的荷叶、莲花、牡丹、山茶、梅花等六组折枝花卉。盖内侧用朱漆书写“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款。全器直径 19.2 厘米、通高 21.3 厘米〔图 162〕。



[图162]筒形漆奁—江苏武进前村南宋墓M5出土

江苏江阴文林南宋墓出土一件漆奁，器身为八棱莲瓣式，莲瓣内曲，亦分盖、盘、中、底四层，每层口沿及底足边缘都镶有银釦。通体髹黑漆，光素无纹。全器口径 17.4 厘米、高 19 厘米。同样形制的漆奁，也见于福州南宋黄升墓，可知这种

漆奁在南宋时期颇为盛行。

江苏苏州元代吴王张士诚之母曹氏墓出土银奁一件，通体葵状六瓣形，上下三层，有子口相合。盖面和器身四周皆刻牡丹、迎春、日葵等花草纹。出土时上层盛银剪刀一把，银刷两把，银薄片刮器一件，银镜一面；中层放有银圆盒四件，小银罐一件，大小银碟各一件；下层盛有银梳一件，银篦一件，银针六支，银小剪刀一把，银水盂一件。全器高 24.3 厘米〔图 163〕。



[图163]筒形银奁—江苏苏州元墓出土

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盛装梳篦的梳妆箱，或称镜箱。箱体为方形，内置有抽屉，以盛装各种梳具。

江苏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镜箱一件，木胎，长方形，黄漆地。上部有两层套盘，一层套盘内盛铜镜一面；另一层套盘内置镜架，可以支撑。箱内设两抽屉，抽屉中盛放木梳、竹篦之类梳妆用品。箱盖上有云纹图案，抽屉板上有柿蒂纹铜环。镜箱长 16.7 厘米、宽 11.5 厘米、高 12.5 厘米〔图 164〕。

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一件镜箱，木胎，长方形。镜箱有盖，子口，口部套一浅盘，内置铜镜，下有三个小抽屉，分别放置香粉、粉扑、梳篦之类。镜箱通体剔刻云纹，一部分已浮脱，长 25 厘米、宽 18 厘



[图164]漆木镜箱—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出土

米、高 22 厘米。

清宫中的梳妆箱，多为方形。清中期的黑漆描金梳妆箱，顶端可以摆放镜架和镜体，箱内设有放置梳具的抽屉〔图 165〕。清晚期慈禧太后所用的象牙雕花梳妆匣，匣盖上雕有丹凤朝阳、喜鹊登梅、鸳鸯戏水、鹤鹿同春等吉祥图案，匣内的抽屉之中，除放置梳具以外，还放有盛装香粉、胭脂的牙雕盒〔166〕。

栉袋，系指专门用于盛装梳篦的袋子，其材质有毛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有人将这种袋子称作鞶囊，而鞶囊乃是古人佩于腰间用以盛手巾细物的小囊，或许这种小囊也可以用来盛装梳篦吧。栉袋，最早见于汉代，明清时期一直还在使用。

汉魏时期的栉袋，按照其形制，大体可分为双袋形和单袋形。这两种类型的栉袋，均见于新疆的洛浦、民丰和尉犁等地。

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已发现了 10 余件栉袋，以双袋形为主，单袋形较少。这里的双袋形栉袋，属于折叠式，展开呈圆角长方形，有两袋，一袋盛梳，一袋盛镜。编号为 84LSIM02：111 的栉袋，用料有绛红色和深蓝色毛布、原白色毛毡，镶边和系带为黄色绢，长 24.2 厘米、宽 11.5 厘米。编号为 84LSIM01：362 的栉袋，镶两色锦边，长 22.5 厘米、宽 9.6 厘米。编号为 84LSIM02：89 的栉袋，袋面用锦和绮，内衬毛布，周边镶红绢，长 21 厘



[图165]漆木梳妆箱—北京故宫藏



[图166]象牙梳妆箱—北京故宫藏

米、宽 10 厘米〔图 167〕。编号为 84LSIM01：142 的栉袋，袋面用“长孙”锦，内衬黄色毛布、绢、毡片，袋缘镶棕黄色绢，袋口为深绿色绢，黄色绢缝作系带。长 17 厘米、宽 8.5 厘米。这里的单袋形栉袋，完整者仅见一只，编号为 84LSIM02：112，一端呈椭圆形，一端呈方形，用毛布缝制，长 15.7 厘米、12.6 厘米〔图 168〕。

新疆民丰尼雅墓地出土的栉袋，均系双袋形，也属于折叠式，展开呈圆角长方形，或抹角长方形，有两袋，一袋盛梳，而另一袋盛篦。1995 年发掘的 1M 3 出土了两件栉袋，一件用蓝色毛毡缝合而成，中腰宽而两端椭圆，外缝黄色宽条形绢带一道，系带交结处还缀饰一黄白色蜻蜓眼料珠，长 18 厘米、宽 8 厘米；另一件用动物纹锦缝制，为四重经锦，颜色有绛红、海蓝、深蓝、黄四种，纹样中有龙、虎、象等图案。M8 出土一件栉袋，正面用蓝地瑞兽纹锦缝制，里面用红色毛部缝制，内置木梳、木篦各一〔图 169〕。M5 出土一件栉袋，正面中部纵向缝一条绢带，中间留有套环，面、里均为红毛布，周镶绿



[图167]锦绮栉镜袋（两面）—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84M02出土



[图168]毛布栉袋—新疆洛浦山普拉墓地84M02出土

色绢边。

新疆尉犁因半墓地 M5 出土的栉袋，属于单袋形，呈长方形，用锦缝制。长 11.5 厘米、5.5 厘米。

金代的栉袋，仅见于黑龙江阿城金墓。该墓出土一件双袋形栉袋，两袋



[169-1]



[169-2]

[图169] 锦栉袋正面、里面

1. 锦栉袋正面—新疆民丰尼雅墓地 95M8 出土
2. 锦栉袋里面—新疆民丰尼雅墓地 95M8 出土

分衩相连，用绛色暗花罗缝制。袋口用喇叭形花状小套袋扣盖，上缘套穿彩丝绳，袋边及套盖均用珍珠钉缀饰边。上宽 5.3 厘米、左袋下宽 10.6 厘米、右袋下宽 12.8 厘米、套盖高约 9 厘米、通高 15.3 厘米〔图 170〕。出土时袋内装有象牙梳子两件，象牙骰子两枚，还有死者脱落的牙齿等物。

明代的栉袋，在广东和山东均有出土，惜已大都腐朽殆尽了。

广州明戴缙夫妇墓中发现两件栉袋，其中一件为褐色麻布袋，内装两把黄杨木梳；另一件也为布袋，内装木梳两把。

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由木墓内发现一纱布梳妆具袋，内装铜镜、骨梳、骨篦、骨柄毛刷、银柄毛刷等物。

清代的胡梳，多配以绣花小栉袋，形状各异，系带交结处还缀以翡翠、玛瑙，成为男子的心爱饰物。在《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 饰物》一书中，收录了多件绣花小栉袋，其上绣花卉，或绣吉祥文字，十分精巧〔图 171〕。



[图170]花罗栉袋—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



[图171]绣花栉袋—民间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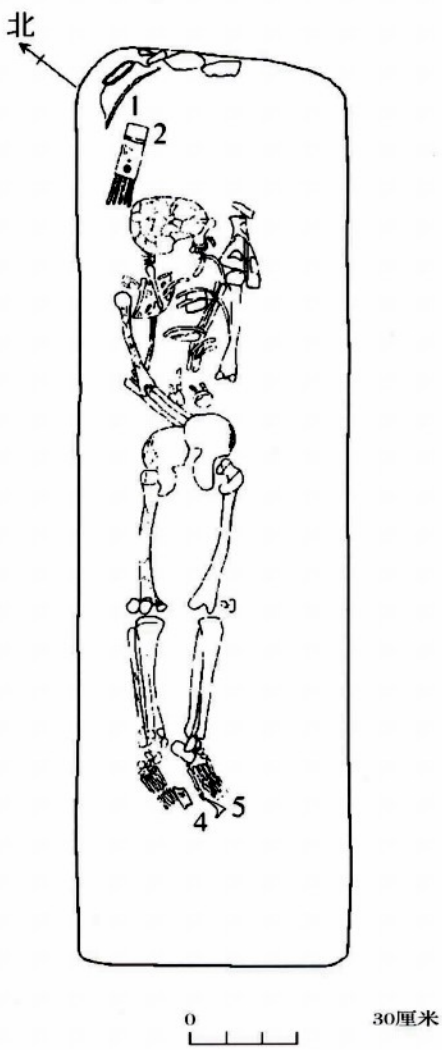




纷至沓来的用途



梳篦是人类特有的生活技能与聪明才智的产物，也是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结晶。梳篦在中国的出现、使用及其造型的千变万化，无一不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随着我国古代文化的日益丰富与不断发展，梳篦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亦愈来愈广泛，描绘出一幅又一幅崭新的历史画面。



[图172]象牙梳的出土位置—浙江嘉兴吴家浜M2

以栉为冠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6000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梳子。关于史前时期梳子的使用情况，通过对这一时期随葬梳子遗存的观察，大体可见一斑。

浙江嘉兴吴家浜马家浜文化墓地M5，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2.68米、宽0.75米、深0.6米。墓内埋葬一成年男性，死者头部的上端放置一件象牙梳〔图172〕。

江苏昆山绰墩马家浜文化墓地M73，为一座长方形浅穴土坑墓，墓口长1.9米、宽0.56米、深0.11米。墓内埋葬一壮年女性，死者的头顶上放置一件象牙梳〔图173〕。

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墓地M26，为一座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的规模为2.65×0.85米。墓

内埋葬一成年人，在死者头骨的左侧放置一件象牙梳，墓中还随葬彩陶壶和象牙琮及骨雕筒等，随葬品共达60余件。在同一墓地的另一座大型墓M10中也发现一件象牙梳，出土时位于死者的头顶处，墓主为一成年女性，随葬品多达上百余件。

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地79M19，为一座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为3.3×1.6米。该墓人骨的头顶处出土一骨梳，墓主为一成年男性，墓内随葬陶高柄杯、大口尊和带骨镞的石钺等，随葬品共计70余件。在同一墓地的另一座大型墓葬79M12中也发现一件骨梳，出土时亦放在死者的头顶处。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墓地M271的墓圹长2.5米、宽1米。墓主为一成年男性，死者人骨的头顶上出土一石梳，随葬有石镯、石钺等和玉琮等。在同一墓地的M 282和M1364也各发现一件石梳，在M276还发现一件玉梳，出土时亦都位于死者人骨的头顶处。

甘肃永昌鸳鸯池马厂文化墓地、宁夏海原切刀把墓地发现的梳子，出土时同样都位于人骨的头部。

通过对良渚文化玉质梳背饰随葬情况的具体分析，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使用者的身份。作为良渚文



[图173]象牙梳的出土位置—江苏昆山绰墩M73

化最具代表性的玉饰，凹字形和凸字形的玉质梳背饰，广泛见于长江下游地区。不过，在江苏吴县、武进、常熟、昆山和浙江桐乡、海盐以及上海等地的良渚文化墓地，往往只有少数墓葬随葬这种玉饰，惟有浙江余杭瑶山和反山这两处墓地的墓葬几乎均随葬这种玉饰。

江苏吴县张陵山上层墓地，发掘了多座墓葬，只有规模较大且有葬具的M4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江苏常熟罗墩墓地发掘了10余座墓，只有规模最大的M7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余杭吴家埠发掘了20余座墓葬，只有M8和M15两墓各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这两座墓在同期的墓葬中不仅规模相对较大，随葬品亦较为丰富；桐乡普安桥墓地发掘了10余座墓，只有M11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这座墓不仅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品较多；上海青浦福泉山墓地发掘了数十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只有M60、M109和M74、M101各出土一件玉质梳背饰，而这四座墓无论墓葬的规模还是随葬品的数量，在同时期的墓葬之中均可谓佼佼者。

座落于天目山余脉凤凰山麓的浙江余杭瑶山墓地，共发现了13座大墓。从平面的布局来看，整个墓地的墓葬分成南北两排，较为整齐地分布在由红烧土构成的方形祭坛的南面〔图174〕。这两行墓葬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随葬品组合，南边的一排随葬玉琮、钺、三叉器等；北边的一排则随葬玉璜、圆



[图174]出土梳子的墓地—浙江余杭瑶山墓地

牌形饰等。类似的随葬情况，也见于余杭反山墓地。按照已有的认识，良渚文化玉器的不同类别，在区分墓主人身份、职能以及性别方面具有一定的标识作用。例如，使用琮随葬者，可能掌握宗教祭祀权；使用钺随葬者，可能掌握军权。一般来说，琮、钺或三叉器多用于男子，而璜或圆牌形饰多用于女子。余杭瑶山墓地和反山墓地是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墓地，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这两处高等级墓地里，玉质梳背饰的使用者，不仅涵盖了拥有不同职能和权力的人们，同时也包括了不同性别的人们，不过每人只能使用一件，鲜有例外者。

通观史前时代的墓葬不难发现，梳子的应用尚不十分普及，一般只限于规模较大且随葬品相对丰富的墓葬，每墓只随葬一件，而出土位置明确的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放置在人头部附近。显而易见，当时的人们是将梳子插在头上的，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插梳，只有少数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够享用。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形表明，梳子俨然已经成为标识墓主人身份的一种重要标志，因而被安排在人体最为醒目的位置——即插于头上。

与这种插梳之俗相对应的是，史前时期的梳子大都偏重对梳背部分的加工与装饰。譬如，大汶口 M26 的象牙梳，其梳背的高度不仅两倍于梳齿部分，而且雕镂出非常复杂的纹样；在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崇玉的人群集团中，更是采用刻意加工的美玉来装饰梳背。然而这些拥有精美背饰的梳子，其梳齿的制作却比较粗糙，有的深浅不一，有的参差不齐，通常并不适于梳理头发。由于史前时期的梳子，最重要的功能乃是插在头上作为标识物，所以暴露于头发之外的梳背部分，理应成为器具的主体而倍受注重。

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流行着一种神人纹样。这种神人往往头戴“凸”字形的羽状大冠或倒梯形的冠状饰物，给人以强大的威慑之感。良渚文化的“冠状饰”，即玉质背梳饰，同良渚文化神人头上所戴的冠状饰物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联系，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换句话说，良渚文化神人头上的冠状饰，应当就是插梳之习的真实写照。这种头戴冠状饰物的神人图像，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具有类似头冠作用的梳子，在史前时期人们心目之中的重要地位。

甲骨文中冕字的字形，形状颇似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骨梳。据《释名》的解释，“冠者，贯也，所以贯韬发也”。可知最初的冠，应是用来固定头发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史前时期大多数插在头上的梳子当系



[图175]戴冠玉人首—北京故宫藏

冠饰的一种。这种冠饰，犹如《淮南子·人间训》所讲的那样："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其主要的功能不是实用性的，而是礼仪性的，即用于区别人们的身份。而中国古文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传统就是"礼不下庶人"，那么插梳的使用者，只能是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少数人。如此看来，等级社会中的冠冕制度，实乃缘于史前时期这种头冠之饰。

自20世纪50至60年代开始，在湖北荆州地区罗家柏、六合、枣林岗、肖家屋脊等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存中[①]，陆续发现了一些各种头戴冠饰的人面形和兽面形玉器。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一书中，著录了一件玉人首，器体为半圆雕，梭形眼，三角形鼻，长方形大嘴中露出四枚獠牙，头顶戴"凸"字形冠，被视为石家河文化之物〔图175〕。依据伴出的陶器分析，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年代，应当已经进入了夏代的纪年。

商代的玉器和青铜器上，亦流行着各种神面形的纹样或造型。这些神

①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面大都头戴各种冠状饰物，有的呈“凸”字形，有的呈“介”字状，有的高耸，有的低平，还有的似鸟羽状〔图 176〕。石璋如先生在《殷代头饰举例》一文，曾从上千座殷墟墓葬的材料中归纳出椎髻饰、额箍饰、髻箍饰、双髻饰、多笄饰、玉冠饰、编石饰、雀屏冠饰、编珠鹰鱼饰、织贝鱼尾饰、耳饰、鬓饰、髻饰等十余种较为典型的头饰形式。在殷商时期的头饰之中，不乏片状的“凸”字形或“介”字形的冠饰，有的甚至可能就是梳子的缩影。

从甘肃灵台白草坡和河南洛阳庞家沟[1]等地出土的西周时期人物雕像来看〔图 177〕，当时人们头上大都戴着环状的高冠，史前时期至夏商时期流行的那种“凸”字形和“介”字形的片状梳形冠饰，已经很难寻觅了。西周时期梳子的出土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陕西宝鸡竹园沟殽国墓地共出有 17 件梳子，除了 M1 的两件梳子因被扰动而位置不明以外，其余 15 件梳子的出土位置大都较为明确。其中五件出于棺外头端的棺椁之间〔两件是放在铜盒里的〕，五件出



[图176]戴冠玉人—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图177]戴冠铜人—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

(1) 魏怀珩等：《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 年 12 期；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 年 10 期。

于足端或足端一侧的二层台上，五件出于棺内的头端。在出于棺内头端的五件梳子中，有四件梳子是与铜罐、浅盘或勺、斧等容器或工具放在一起的；只有 M6：8 这一件尺寸最小的铜梳子是与铜笄放在一起的，可能放置于头部附近，墓内的人骨架腐朽殆尽，因墓中未见兵器，故发掘者推测该墓可能是女性墓。可见，西周时期出土的梳子，大都不是放在人骨头部的。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不流行插梳之习了。

西周伊始，商代早已存在的首服等级差别，更加制度化了，使之界限分明、等级森严。《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衮冕黼珽，带裳幅舄。衡纩纮綖，昭其度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西周青铜重器——毛公鼎上也出现了"虎冕练里"的铭文。从文献中关于冕服的记述来看，在周代的礼制之中，对于冠的高度、大小，以及颜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种依冠式以序等列的首服之制，当发轫于史前时期，廓立于殷商时期，而完善应在两周时期。随着周代首服之制的制度化，冠冕的形状亦日趋规范化，于是梳子便从冠饰之中被解放出来了。从此，戴冠之礼变成了男子的专利，而插梳之习则逐渐变成了女性的时尚。

诚然，西周以后的男子冠梳，并没有完全消失。1978 年在湖北随县城关镇西北郊擂鼓墩附近发掘一大型木椁墓，墓主曾侯乙，男性，45 岁左右。在墓主人的头下，出土了一件玉梳。据墓葬的规模与用鼎制度推测，墓主可能是东周时期曾国的国君。《梁书 · 侯景列传》记载，侯景，字万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魏明帝时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548 年景立萧正德为帝，自为相国、天柱将军。后来，景自加冕，建天子旌旗，矫诏，禅位于己，改元为太始元年。"自篡立后，时著白纱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宋史 · 李衡列传》记述，李衡，字彦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后知溧阳县，后定居昆山，结茅别墅，杖履徜徉，聚书逾万卷，号曰"乐庵"。自宣和间入辟雍，虽博通群书而以《论语》为根本。"临没，沐浴冠栉，翛然而逝"。不过自西周以降，男子冠梳毕竟鲜见，上述这几例偶见的男子冠梳，只能视为远古冠梳之礼的孑遗。

以栉为饰

史前时代的冠梳，固然有审美的取向，但其主要的用意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区别人们的身份。

河南殷墟妇好墓，是殷商时期女性贵族的墓葬。这座墓中发现了多件梳子，尽管由于墓葬被扰乱，这些梳子的出土位置不详，但从梳子的形制来看，背脊突出且装饰精美，似乎正是为了便于插在头上而设计的。这座墓女性墓葬所随的梳子，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同时期的男性墓葬。因此推测，具有装饰意味的女性插梳，很可能是从商代后期开始的。

两周时期，女性插梳的实例，在吉林永吉星星哨石棺墓群之中虽有所发现，但并不普遍。该墓地 D 区 M16 中发现了一件包铜木梳，出土时梳子位于死者的枕骨之下，墓主为女性，墓内的随葬品共有 16 件。这座女性墓是整个墓地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年代大体相当于东周时期。

四川西昌、凉山等地的大石墓中还常见一种铜发饰[1]，形状颇似早期的梳子，首部略成牌状，下有三至五枚发针。首部上大下小，多近梯形，其上往往饰有圆点纹、三角形条纹、三角形镂孔、回形纹等，边长 3 ～ 4 厘米、宽 2 ～ 4 厘米左右，发针的长度多在 5 ～ 6 厘米以上。这种大石墓主要分布于四川西南一带，被视为古代濮族的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末至西汉时期。

根据考古发现，两周至秦汉时期，插栉之习尚不流行。直至晋代，插栉之习才逐渐风行起来，到了唐、宋时期，更是盛极一时。

十六国时期的女侍俑、女乐俑的头上就插有梳子。2001 年在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平陵乡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编号为 M1。墓内出土了大量陶俑，在女侍俑、女乐俑的头上均有插梳。其中女侍俑粉面红靥，朱唇凤眼，头戴黑色蝶状发冠，冠下凸起一方形台座，额发由中间整齐地梳向两端，两侧鬓发垂过耳际，脑后插一把马蹄形梳子〔图 178〕。该墓地年代被推定在前秦、后秦

[1] 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 年 2 期。



[图178]插梳女侍俑—陕西咸阳平陵M1：34

时期。在陕西咸阳师专等地十六国墓葬中，也同样发现了插梳的女侍俑。

隋代明确的插栉实例，见于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和河南安阳隋张盛墓。

李静训墓为一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是石椁和石棺，内葬一人。在死者的头顶上有木梳一件，棺内的随葬品中还有骨梳等。从墓志记载得知，死者为李姓小女孩，名静训，陇西成纪人，年仅 9 岁[1]。

张盛墓为一方形砖筑单室，内葬两人。墓中出土了 95 件各种佣类，其中有一组八件伎乐女俑，头梳平髻，脑后均插有一把梳子〔图 179〕。张盛其人正史无传，据墓志，隋开皇十四年〔594 年〕卒于相州安阳修仁乡；夫人王氏先卒于开皇六年，合葬于此[2]。

在唐、宋时期的考古资料中，女性头部插置梳篦的情形，已经相当普遍了。

河南陕县南关庙底沟唐墓，死者的头部出有骨梳两件，伴出的还有铜钗、银钗、螺钿花钗、玉饰等。在陕县刘家渠唐墓 M98 和 M103 中，人骨架的

[1]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 9 期。

[2] 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 年 10 期。

头上都插有好几件骨梳。根据墓中的随葬品推断，这些墓葬的墓主均为女性。

河南偃师杏园村唐代墓地发现了有多件梳篦，M1435 出土一件骨梳，墓主为陈郡袁氏；M5036 出土角梳一件，墓主为郑洵夫妇；M2603 出土骨梳一件，墓主为李景由夫妇；M1819 出土骨梳三件，墓主为李归厚夫妇。这些墓葬的梳篦，出土时无一例外地都放置在女性墓主的头部附近。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唐墓，墓主为王逆修及其两位夫人和一婢女。墓内出土木梳、角梳各一件，还有一件玉栉背，出土时梳子均放在女性的头侧。

江苏武进村前乡蒋塘村宋墓发现一件木梳，梳背上环以细珍珠梳子，出土时乃是插于死者发髻上的。

江西德安桃源山南宋周氏墓发现多件梳篦，出土时死者的两鬓和后脑各戴两把木梳。

福建福州南宋黄升墓发现多件角质梳篦，出土时有四件角篦是插在死者发髻的前后与左右四方的。

这种以栉为饰的习俗，不仅愉悦了人们的身心，也引发了人们的灵感。唐人王建《宫词》中的“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鬓虚；舞处春



[图179]插梳陶俑—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

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之语，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之语，元稹《梦游春七十韵》中的“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屐”，及《恨妆成》的中“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之语，都是针对当时妇女发间的插栉而咏。

唐代妇女不但喜欢插梳，同时还喜欢插篦。当时梳篦的工艺考究，制作的材料丰富，从唐代的诗词中也可略知一二。玉梳，见元稹的《六年春遣怀八首》：“**玉梳**钿朵香胶碰，尽日风吹玳瑁筝”；犀梳，见杜牧的《张好好诗》：“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象梳，见毛熙震的《浣溪沙》：“慷整落钗金翡翠，**象梳**欹鬓月生云”；金篦，见李商隐的《和孙朴韦蟾孔雀咏》：“约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银篦，见花蕊夫人的《宫词》：“斜插**银篦**慢裹头”；白角篦，见罗隐的《白角篦》：“白似琼瑶滑似苔，随梳伴镜拂尘埃；莫言此个尖头物，几度撩人恶发来。”在唐代的诗词中用玉、水犀、象牙、金、银、白角等各种材料制作的梳篦，可谓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宋代妇女崇尚插梳不亚于唐代，而且喜欢插大梳。宋人苏轼在《於潜女》诗云：“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女霜不穿履，角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并自注：“於潜女皆插大银栉，长尺许，谓之蓬沓。”陆游在《入蜀记》中写道：蜀地“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据《长编》记载，北宋仁宗时，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相仿之，梳子的长度有的逾尺。北宋时期，京都的妇女极尚冠梳之风，因而《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记述，街上小手艺人中，就有“补修觥冠、接梳儿、染红绿牙梳、穿结珠子……修磨刀剪、磨镜，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到了南宋时期，乡村的女子亦戴白角冠、象牙梳。毛诩《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诗云：“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两宋时期，主要流行以金属、白角、象牙、鱼觥、玳瑁等珍贵材料所制作的梳篦。

关于唐、宋时期的插栉之习，在绘画资料中也有所反映。通过对于这一时期绘画资料的梳理，大体得知当时较为流行的插栉方式，至少有如下几种。

其一，在前额上方正中插一把栉。这种插法十分普遍，既见于张萱《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贵妇，又见于五代冯晖墓、王处直墓壁画中的侍女〔图 180〕，还见于敦煌莫高窟第 107 窟东壁婢女供养人像，而牟益《捣衣图》和传周文矩《宫中图》中的妇女也是如此，只是栉背的形状不同

而已〔图 181〕。

其二，在前额上方正中插一对栉，两栉一上一下对而插。这种插法见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妇女〔图 182〕。

其三，在前额上方的一侧斜插一把栉。这种插法见于五代王处直墓壁画上的侍女，该墓后室的东西两壁为奉侍图和散乐图，图中梳高髻或单髻者，其头上均斜插一把栉〔图 183〕。

其四，头脑两侧上各插一把栉。这种插法见于《宫乐图》中的侍女和《捣练图》中的小侍女〔图 184〕，也见于《调琴啜茗图》中的侍女〔图 185〕，还见于五代王处直墓的壁画上的小侍女。从这些侍女的发式和装束来看，这种发式与插栉应为未婚少女的妆束。

其五，在前额上方与两鬓上共插三对栉，每对栉均一上一下相对而插。这种插法见于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曹氏家族供养人像和榆林窟壁画的供养人像〔图 186〕。从壁画上的墨书题记和这些女子的着装来看，这种插栉当为新娘的妆束。

其六，在前额上方与头两侧各插一栉。这种插法见于敦煌莫高窟第 103 窟壁画太原王夫氏供养人像〔图 187〕。

其七，在后脑插一把栉。这种插



[图180]前额上方插一栉—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奉侍者（局部）



[图181]前额上方插一栉—宋人《捣衣图》（局部）



[图182]前额上方插一对栉—唐人《挥扇侍女图》（局部）



[图184]侧脑插栉—唐人《捣练图》（局部）



[图185]侧脑插栉—唐人《调琴啜茗图》（局部）



[183-1]



[183-2]

[图183]前额上方斜插一栉
1. 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奉侍者（局部）
2. 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奉侍者（局部）



[图186]前额上方插三对栉—甘肃敦煌榆林窟壁画女供养人像（局部摹本）



[图187]前额和头两侧各插一栉—敦煌莫高窟第103窟太原王夫氏供养人像(局部)

法也较为普遍，既见于传唐人《调琴啜茗图》和《捣练图》中的贵妇、侍女，又见于王居正《纺车图》中的村妇〔188〕。

其八，后脑插多栉。这种这种插法见于《宫乐图》中的贵妇〔189〕。

元代伊始，插梳之习虽已渐趋式微，但从元代杂剧中仍可寻到端倪。关汉卿在《救风尘》中写道“提领系整衣袂，戴插头面整梳篦”，这里所提及的“梳篦”，当是指作为首饰打扮装点之意。元散曲《商挺 · 小令》中“包髻金钗翠荷叶，玉梳斜，似云吐初生月”的词句，也是对插梳的形象描写。



[图188]后脑插一栉—宋人《纺车图》（局部）

据《明史 · 舆服志》记载，明朝命妇的冠服中尚有梳饰。如，一品礼服后鬓：珠翠梳四，珠帘梳一；一品常服边鬓：小珠翠梳一双，金脑梳一。五品礼服后鬓：小珠帘梳一，小珠梳环一双；五品常服边鬓：梳一。六品礼服后鬓：翠梳四，珠缘翠帘梳一。八品、九品常服边鬓：银间镀金脑梳一。

元代和明代的插梳实例，在考古资料中尚可见到。河北石家庄后太保村元代墓地发现多座墓葬，其中 M2 内葬一人，女性，人骨朽蚀严重，但头发尚保存完好，颜色黑中泛黄，系两根主辫交错盘于头顶，再用簪子和

梳子固定。这件梳子为金背，木质的梳体已不复存在了。安徽合肥市区发现一座明墓，内葬一老年女性。出土时，死者的头发束于脑后，发髻上插一把包金角梳。据墓志得知，墓主何杨氏，“因子有功，追封淑人”，洪武年间“以疾终”。

明代晚期以后，这种以栉为饰之习，差不多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图189]后脑插三栉—《宫乐图》（摹本局部）

以栉为具

从实用器具的角度而言，梳篦既是整发理容的工具，也是除垢保洁的用具，又是医疗的器具，甚至还是刑具等。梳篦，与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中国古人对身体“无不用其洁”，因为身体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属于家族的，承担着延续祖先命脉的重任。先秦时期，古人盥沐、理发之事，以《礼记》的记载，最为详细。

关于理发、沐发的次数，《礼记·内则》云，“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每日晨起，须理发一次。《内则》又云，“五日则鬋汤请

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覃潘请醧”。覃，温也；潘，米汁；醧，洗脸。即五天要烧一次温水请父母洗浴，三天洗一次头发，在这期间脸上有污垢，要用温热的淘米水洗净。因发沐待干，干而梳理，须隔三日。

关于沐发后的梳发，《礼记 · 玉藻》称，“沐稷而醧粱，栉用櫛栉，发晞用象栉”。櫛，白理木也；晞，燥也。即用稷的汤汁洗发，用高粱的汤汁洗面，先用白木梳梳理湿发，发干后再用象牙梳子梳理。沐发后，因湿发滑淄要用木梳，而干发涩滞则要用象牙梳，古人已知针对头发的不同状况，采用不同的梳子梳理之道。

关于沐浴、沐发的说法，《礼记 · 儒行》谓，“澡身而浴德”。古人沐浴、沐发，除了清洁身体之外，还有道德品格的自律，即具有保持身心清洁的涵义。

秦汉以来，梳发、理容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梳理和装饰头发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从古代的绘画、雕塑等图像资料中，大体可以管窥当时妇女的梳妆情形。

传晋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中描绘了贵妇梳妆的场面：一贵妇人端坐在带架子的镜前，其身后站立一侍女，一手持发，另一手持梳，正在为贵妇人梳头〔图 190〕。她们的面前放置一启开的圆形奁盒，内盛有梳妆用品。这种圆形奁盒，在汉晋时期十分常见。

湖北武昌何家垄出土了一件唐代梳发女陶俑，陶质灰白，通高 18.9 厘米。女子身着紧袖尖领群衫，长裙拖地露出双脚，足登圆口花鞋。头略前倾，长发下垂，右手握发，左手持梳，作梳发状。前置一小簸箕，内放梳妆用品。女子手中的梳子，很像一把骨梳〔图 191〕。

据《朝野佥载》记述，东海人马待封，为唐开元年间的工艺发明家。他“其巧逾于古”，曾为皇后造一梳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皇〕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持巾栉至。〔皇〕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角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即闭，如是供给皆木人。〔皇〕后既妆罢，诸门皆阖，乃持去。其妆盒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唐代宫廷贵妇的豪华梳妆用具，跃然纸上。

宋人《半闲秋兴图》中有妇人照镜理容的场面，花边形的明镜中映照出妇人秀丽的脸庞〔图 192〕。镜子被安放在一精巧的镜架上，镜旁有一花瓣式



[图190]梳妆—晋《女史箴图》（局部）



[图191]梳发女陶俑—湖北武昌何家垄出土



[图192]梳妆—宋人《半闲秋兴图》（局部）

筒形奁盒。在江苏苏州元墓中曾发现过精巧的镜架实物〔图193〕，而花瓣式的筒形奁盒，更是宋元时期盛行之物。

清人《乾隆妃梳妆图》中，身着华美服饰的佳人正对镜插钗〔图194〕。清宫后妃的梳妆用具，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图195〕。

对于男子来说，不但是整理头发，整理胡须也是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从文献记载来看，人们一向重视胡须。

《左传》昭公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杜预注："鬣，鬚也。"这是以长鬚为美，故使相君行礼。

《释名·释形体》称，"髭，姿也，为姿容之美也"。汉魏时期，人们通常用褒扬的语言赞美须眉浓密者。如，刘邦"美须髯"，刘秀"美须眉"，马援"为人鬚髯"、"眉目如画"，关羽"髯之绝伦"等等。

南北朝时期，人们呵护须发的方法是以绳或丝帛将其缠裹起来，以免玷污。《晋书》记载，张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南史》记载，刘文仲"尝献〔齐〕高帝缠须绳一枚，上纳受"。

唐代的诗词之中，不乏赞扬须髯的词语。李白的《司马将军歌》中有



[图193]银镜架—江苏苏州元墓出土

“身居玉帐临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的诗句；钱起的《送裴硕侍御使蜀》中有“柱史才年四十强，须髯玄发美清扬”；杨嗣复的《赠毛仙翁》中有“童姿玉貌谁方比，玄发绿髯光弥弥”的诗句；殷文圭的《赠战将》中有“绿沈枪利雪峰尖，犀甲军装称紫髯”的诗句。



[图194]梳妆—清人绘《乾隆妃梳妆图》（局部）



[图195]清宫后妃梳具—北京故宫藏



[图196]清宫皇帝梳具—北京故宫藏

宋代的诗词之中，更有以梳头理发为描述对象的作品。杨万里的《梳头有感》诗云："身在荷香水影中，晓凉不与夜来同。且抛书册梳蓬鬓，移转胡床受小风。同郡同年总八人，七人零落一人存。如何独立薰风里，犹恐霜华点鬓根"。范成大在《睡起理发》诗中写道："老态随年觉，新凉与睡谋。鹊惊茅屋晓，臂冷葛衣秋。远岭元无约，开门便见投。闲中多事在，一日一梳头"。

明清时期以来，还出现了专门用于整理须髯的胡梳。这种胡梳不仅民间使用，清宫的皇帝亦使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皇帝梳具中，就有以象牙制作的胡梳〔图 196〕。

当然，梳篦不仅用于梳理发须，还被用于除垢保洁。《字彙》称：篦，以竹为之，去发垢者。篦子是由多齿的梳子发展而来的，最早的多齿梳子可上溯至距今 5000 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但齿缝较稀疏。齿缝较稠密的篦子，至迟战国时期已经普遍出现，而篦中的箆就是专门用来取虱虮的。



[图197]梳妆用具—湖南长沙马王堆M1出土

据文献记载，古人多虱。《符子》载，齐鲁争汶阳之田，周丰曰："臣尝昼寝，有群虱共斗乎衣中。"《史记 · 平津侯主父列传》谓，齐人严安上书曰："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纵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三国志 · 吴书》称，"昔高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晋书》记述，王猛见桓温，"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王建的《照镜》诗云，"痒头梳有虱，风耳炙闻蝉"；姚合的《病中书事寄友人》诗云："疮头有虱，风耳乱无蝉。"《墨客挥麈》："王荆公召对时，虱缘须上，上顾而笑"。还有陈善的《扪虱新语》等等，不胜枚举。自宋以后，有关虱之记录见于卿大夫者甚少，恐怕渐以为秽矣。

由于篦子的齿缝较密，可以剔除发垢，因而篦梳又名"落尘"，或称"洛成"。宋人《奚囊橘柚》中有这样的记载，"丽居，孙亮爱姬也，鬓髮香净，一生不用洛成。"

在古代墓葬之中，常与梳篦伴出的有：铜镜、化妆品、香料、刷、镊、削刀、眉笔、笄等物〔图 197〕。而刷，同梳篦的关系甚密。《释名 · 释首饰》曰："刷，帅发长短皆令上从也。"《文选 · 稽康养生论》称，"劲刷理鬓"。注引《通俗》云："所以理鬓为之刷。"《三才图令 · 器用 · 梳帚》谓："刷

与剔，其制相似，俱以骨为体，以毛物粘其首，剔以掠发，刷以去齿垢，刮以去舌垢，而帚则去梳垢。”

汉代常见的刷子，为烟斗状的铜质刷柄，其前端有圆斗，可装毛发或者纤维，后端为扁平形，便于手握。梳篦在使用过程中，其齿上很容易积下垢腻，这种刷子应是清洁梳齿的工具，即《三才图令》中所说的“梳帚”。

辽代常见的刷子，为长条形的骨质刷柄，其前端有两排小孔，可置刷毛，形似现代的牙刷。故而，以往曾被误认为牙刷。1990 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距离辽上京遗址 20 公里处的滴水壶山谷发现一座辽代壁画墓，墓室的北壁上为“梳妆侍奉图”，图中有一女子身着汉人装束，躬身跪于小木桌前，专注于桌上的红色木盘，盘内放置四种梳妆用具[1]。她左手捺着黑色粉盒，右手拿起粉盒盖。盘内还有一白色粉盒，长柄骨刷和梳子各一把〔图 198〕。根据骨刷的形制，这类骨刷并非牙刷，应是梳洗时用于擦拭清水或者发油的工具，即用刷子蘸油轻刷头发而使之平整光亮，并起到固发的作用。即



[图198]梳妆具–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墓室北壁壁画（摹本局部）

[1] 巴林左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考古》1999 年 8 期。

《三才图令》中所说的“则”。

梳篦，还是古代医治眼病的器具。唐杜甫在《谒文公上方》中诗云，“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李商隐在《和孙朴事蟾孔崔咏》中诗云，“约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刘禹锡在《赠眼医婆罗门僧》中诗云，“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宋苏舜钦在《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中诗云，“病膜谁将宝篦刮？痒背恰待仙人抓”。这些诗句中的篦，通鎞，为治疗眼病的一种掠器。

梳篦，也是古代的一种刑具。《辽史 · 穆宗本纪》载，穆宗十五年三月“祭巳，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辽史 · 刑法志》载，〔穆宗〕“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付……掌酒等人，从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逾期召不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水浒传》第四回中说道：“你须不瞎，也见库局里贴的晓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

梳篦，又是古代的一种指读工具。《宋史》卷一一四《志》第六十七中有这样的记载，御集提举诸司官于《孝宗御集》匣前，搢笏，启封，开钥讫，出笏，归侍立位。……进读御集官搢笏稍前，取篦子指读，逐版揭册指读，并如上仪。俟进读毕，皇帝复坐，进虞御集官置篦子于御案上。

以栉为喻

随着梳篦被长期广泛地使用，其超越自身使用范畴的社会功能亦日益显现出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

梳篦被作为一种见解、决策之载体，用以发表政见，阐明哲理。

《新唐史 · 吴兢列传》记载，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又曰，“朝有讽谏，犹发之有梳”。这里把讽谏，比喻作梳发。

《北堂书钞》中引崔寔《正论》称：“无赏罚，是无君。苟欲治之，是犹不蓄梳而欲发之理也。”这里将治理，喻为梳发。

《元史 · 许衡列传》记载，至元二年，衡乃上疏曰：“中书之务不胜其

烦，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发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栉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虽不能，而用栉与匕，是即手之为也。上之用人，何以异此。”这里通过栉发，阐述用人之道，梳篦成为必不可少而又恰如其分的载体。

根据梳篦的性能，引申出疏通、疏导、清理、整理等各种不同的含义，用于比喻理事。

宋罗泌的《路史 · 后记 · 夏后代》谓，“南至于华阴，东至底柱，鑿孟津，梳三门，以奠西河”。这里的“梳”，即疏通、疏导之义。

唐韩愈的《昌黎集 · 送郑尚书序》谓：“蜂屯蚁杂，不可爬梳。”《宋史》记载，淳熙年间，建安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朱熹称其“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爬梳剔抉，参互考寻，推原本根，比次条理，管括机要，阐究精微”。文中的“爬梳”，当为清理的意思。

《清史》记载，胡承珙，字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承珙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诗传，又以郑君注仪礼参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取注中叠出之字，并“读如”、“读为”、“当为”各条，排比梳栉，考其训诂，明其假借，参稽旁采，疏通而证明，作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又载，凌曙，字晓楼，江都人，国子监生。其好学根性，年二十为童子师。及入都，为仪徵阮元校辑经郛，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这里的“梳”、“栉”，均喻为整理，使文章有条理，不紊乱。

梳篦的外形，也常被借用，多用于形容各类物体和人体之间密接相连，犹如栉齿般紧密排列之貌。《诗 · 周颂 · 良耜》云：“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文选 · 汉王子渊 · 四子讲德论》称：“甘露滋液，嘉禾栉比。”《洛阳伽蓝记序》述：“招提栉比，宝塔骈罗。”唐李贺的《秦王饮酒》中咏叹，“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元稹的《连昌宫词》中咏叹，“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娇痴缘树木”；杜牧的《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中咏叹，“樯形栉栉斜，浪态迤迤好”。《明史 · 列传》记述，时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兵士如剃”。

数千年来，梳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已在人们的心灵上打下极为深刻的印记，于是不少文人墨客有感而发，写出了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梳篦的

故事。以梳篦为题材的故事和传说，大都寓意深远，现择要几则，录列于下。

栉风沐雨 《庄子 · 天下》中描写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墨子曰："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晋书 · 列传》云："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公免胄于邵陵，晋文公擐甲于承筐。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失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古时圣贤之人以风梳头，以雨洗面，比喻不避风雨，奔波劳苦。

不栉不沐 《礼记 · 曲礼》称："父母在疾，冠者不栉。"《晋书 · 列传》谓："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乡亲称之。"《宋书 · 列传》云："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也。……及高祖领兖州，廓为别驾从事史，委以州任，寻除中军咨议参军，太尉从事中郎。未拜，遭母忧。性至孝，三年不栉沐，殆不胜丧。"又云："述，字景先，少有志行……。及景仁有疾，述尽心营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后进，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怀感愧。"《梁书 · 列传》载："荀匠，字文师，颍阴人，晋太保勖九世孙也。……居父忧并兄服，历四年不不出庐户。自括发后，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历代孝行者，凡遇亲人有疾或丧没之际，皆不梳发、不洗面，以示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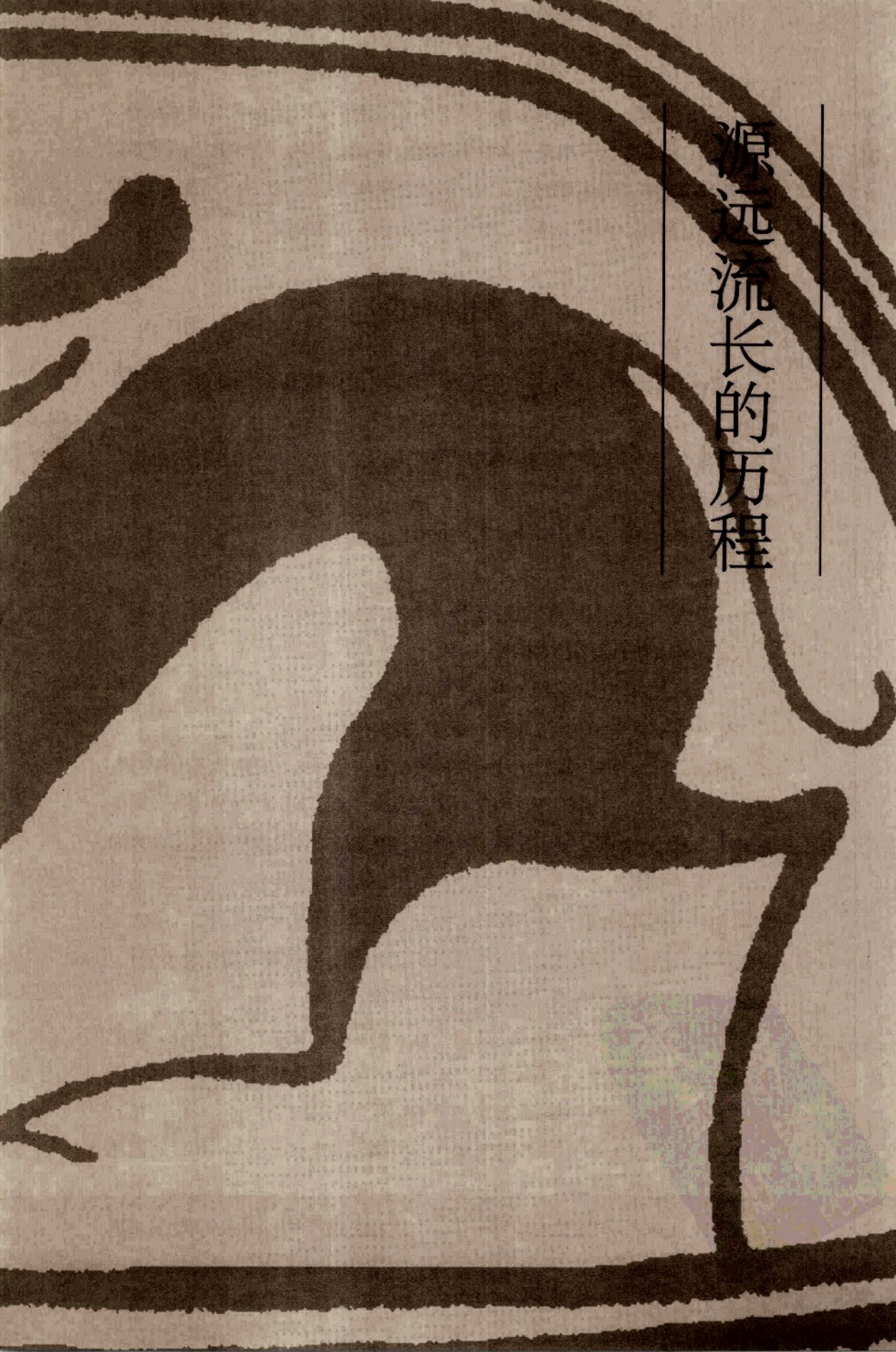
另据《后汉书 · 东夷传》记载：〔倭〕"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

玉梳化月 据《金史》记载，"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时，尝梦二玉梳化为月，已而生二后，及没，有芝生于柩"。

掷梳拒辱 《明史 · 烈女传》记载，"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锦琴。洪武中，方为山东佥事，坐法死，妻子当没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监护者见丁色美，借梳掠发，丁以梳掷地，其人取掠之，持还丁，丁骂不受，谓家人曰：'此辈无礼，必乳我，非死无以全节。'肩舆过阴泽，崖峭水深，跃出赴水，衣厚不能沉，从容以手敛裙，随流而没，年二十八，时称其处为夫人潭"。同传又载，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张氏者，嫁汪客之子。诸恶少中有胡岩者，最桀黠，群党皆听其指挥。"一日，呼妇共坐，不应。岩从后攫其梳，妇折梳掷地。顷之，岩径入犯妇，妇大呼杀人，以杵击岩，岩怒走出，妇自投于地，哭终夜不绝"。

箱中藏篦 《养疴漫笔》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祖母的房间里放着一个箱子，她说，“如我出，慎勿开此箱，开则我不回也”。诸孙中有一无赖者，一日醉酒而归，见祖母不在家，径直走到床头，取封锁柳箱开之，其中只见一小铁篦子，余无他物。然而，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源远流长的历程

中国的梳篦，自遥远的史前时代一直沿用至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宏富，积淀了数千年来古老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明，因而能以举世独步的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内涵昭示天下。我国古代梳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浑朴、斑斓、大同、奢华、敦厚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浑朴的时代

这一阶段自距今 6000 左右年至商代末期，大体经历了 3000 余年漫长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曾经将中国史前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 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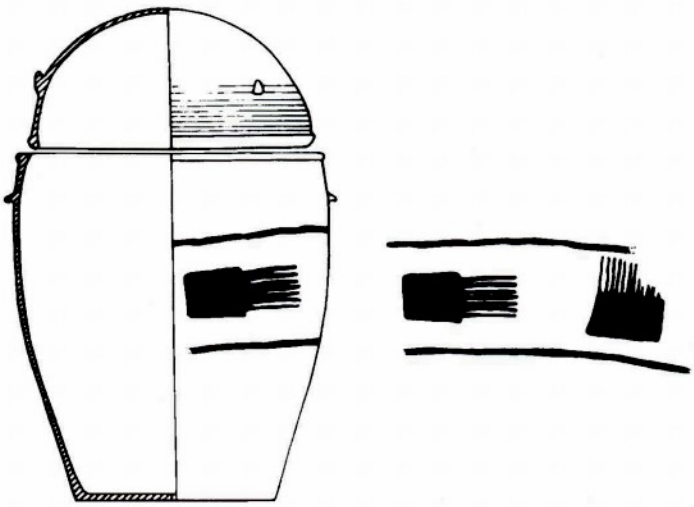
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 以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史前时期的梳子以东方地区、东南地区出现的最早，而北方地区、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出现的较晚。史前时期的梳子，材料有骨质、牙质、木质、玉石质等，以骨梳、象牙梳，以及镶嵌着玉质梳背饰的骨牙梳子应用较为广泛。这一时期的梳子，以长方形为主，还有为数不多的扁方形，造型较为单一。一般通高 16 ～ 8 厘米，宽 5 ～ 6 厘米。大多注重对梳背部分的加工与装饰，梳齿的加工较为粗糙。时代较早者，梳齿较长，齿缝稀疏；而时代较晚者，梳齿稍短，齿缝较密。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格局，决定了这一时期梳子发展的不平衡性。史前时期的梳子，在地区上的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梳子出现的时间较早，种类较多，结构复杂，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梳子，如大汶口文化的扁方形骨梳、良渚文化“凹”字形与“凸”字形玉背饰梳子等。中原和西部地区梳子出现的时间稍晚，种类较少，结构简单，只有陶寺文化的长方形玉石梳子较为突出，但数量发现得不多。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梳子实物虽未见



[图199]彩绘梳纹—河南汝州洪山庙W32：1

出土，不过在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却发现了彩绘的梳子图案。汝州洪山庙遗址发掘出136件陶瓮棺，这些瓮棺均为大口直壁缸，内盛人骨。编号为W32：1的大口缸上，用白彩绘出一周宽带纹，上下用黑彩画两条平行线。白彩之上用黑彩画出三组图案，因器物表面严重剥落，仅可辨识出一组图案的内容为两个梳形纹〔图199〕。梳子的形状呈长方形，一件有7枚齿，另一件有12枚齿。同样的图案还见于W69：1等陶器。这些图案应是当时梳子的真实写照。

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贡》将这时的地域称为“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诗经·商颂》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代的疆域主要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安徽和江苏、浙江的一部分，以及江西、湖南与内蒙古的某些地方。

夏时期的梳子，出土的数量很少，仅见于夏人活动的中原地区。商时期的梳子，出土的数量较多，既见于商王朝统治中心的王畿，又见于北方的重镇，还见于东土和西土的方国，尤以河南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现最为丰富。夏商时期的梳子，材料有骨质、牙质、玉质、铜质等，以骨梳和牙梳应用较为广泛。



[图200]商代玉梳—上海博物馆藏

夏商时期的梳子，大都属于长方形，一般通高 11 ～ 7 厘米，宽 4 ～ 5 厘米左右，梳背多呈倒梯形或风字形。商代前期，主要流行平脊的梳子，梳背通常略高于梳齿，梳背上饰以数道凸凹弦纹或方格、斜线等几何形的纹样〔图 200〕。无论在形制特征上，还是在装饰手法上，这一时期的梳子与史前时期的梳子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代后期，古朴的平脊梳子已经很少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凸脊和丫角脊饰的梳子，这些背脊新颖的梳子，梳背明显高于梳齿，加之背脊上站立的飞鸟和突起的钮饰，背齿之间在高度上的差距越发悬殊了，而这种背脊突出且装饰精美的梳子，似乎正是为了便于插在头上而设计的。这一时期的梳背上，往往以兽面纹和三角形纹为饰，其装饰风格同殷商青铜器、玉器上的纹样如出一辙，体现了殷商一代的典型风格。

夏商时期，各地区的文化辐辏于中原，在史前时期六大区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当时各地区间的交往中，中原地区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枢纽作用或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强烈，从而奠定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中原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突显，其物质文化也因之丰富多彩。夏商时期的

梳子，既传承了史前传统古朴的造型特征，又开启了时尚新颖的装饰风格，特别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兽面纹，虽然只是器物上的附加装饰，却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史前时期至商代这一阶段，人们主要是将梳子插在头上作为冠饰的。考古发现的迹象表明，迟至距今5500年左右，包括插梳在内的头冠之饰，已经构成了当时服饰仪态的重要环节。到了商代，这种依冠式以序等列的首服之制，已规度初显，其章其式，可稽而窥。诚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插梳，当时的插梳习俗只为少数权贵或上层社会阶层的人们所享用，并成为他们和她们标识身份的一种重要标志。从梳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梳子，造型古拙，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浑朴时代。

斑斓的时代

这一阶段包括西周和东周时期，大体经历了800余年的历史。西周时期，自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开始，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周王朝迁都今天的洛阳为止；东周时期，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而结束。史学上一般又将东周时期划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的年代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战国的年代从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

西周时期的都城在丰京与镐京，位于今陕西长安县范围内的沣水流域，同时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建有东都。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不再具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诸侯力政的局面，整个东周时代，当时的都城〔今洛阳一带〕仅在名义上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西周时期的梳子，主要发现于中原的王畿地区和北方的燕国地区，其中陕西宝鸡強国墓地的出土数量最多。东周时期的梳篦，在王畿地区、周边列国地区，乃至边远的北方和西北等地都有发现，尤以湖北江陵楚故城周边楚国墓地的发现最为集中。两周时期的梳篦，材料有骨、牙、角、玉、木、竹、陶、铜质等，以骨梳和木梳篦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这一时期的梳篦，有长方形、扁方形、鱼尾形、六边形、亚字形、马蹄形、联背形等，造型丰富多彩。

西周时期，主要流行各种凸脊的梳子，背脊的中央往往突起一块。〔图



[图201]西周骨梳—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M206:143

201〕春秋时期，以平背的梳子为主，背脊两端的鸟饰较为发达。战国时期，弧背的梳篦崛起，并迅速发展起来。在装饰手法上，西周早期的梳子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商代后期梳子的特点，而西周中期以后的梳子基本上摆脱了拘谨、呆板的传统，东周时期的梳篦更给人以舒展、活泼的明快之感。

周人的始祖发迹于邰〔今陕西武功一带〕，最初的活动在泾渭流域。周人灭商后，实行同姓分封，给这些分封的诸侯国输入了大量的周文化，从而将周文化扩张到陕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梳子，其形制、纹饰与西周都城丰京所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梳子基本相同，这些现象大致反映了历史的事实。

周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诸侯兴起，政治上的长期对立，因而导致了文化方面地域性差异的出现。这一状况在梳篦的造型上亦有所反映。双鸟式鱼尾形梳篦，主要流行于春战之交的泗上诸侯列国地区，这种以鸟为饰的装饰风格，在该地区春秋时期的铜器上也颇为流行。亚字形梳子，盛行于齐国地区，并成为这一地区东周时期梳子的主要款式。马蹄形梳篦，集中发现于

楚及其以北列国地区，这种形制的梳篦已经构成了楚国漆木器的主要品种之一；扁方形组合式梳子，则是西北天山东南一带极富有特色的器具。各种不同的造型，在各地区竞相出现，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梳篦发展史上斑斓的时代。

随着首服之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昔日那种“插梳为冠”的俗尚，已不再流行了。两周时期的梳子，以梳理头发作为主要的功能。用来取虱虮的篦子的发明，成套梳篦的出现，以及盛装梳篦的竹笥、竹盒及漆木盒等妆奁器具的使用，都充分说明彼时的梳篦已经步入了专门梳妆用具的行列。

大同的时代

这一阶段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陈国灭亡为止，包括秦、西汉、东汉、王莽政权、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前后经历了800余年。

据文献记载，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何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汉反击匈奴，屯田戍边；征楼兰、伐大宛、破姑师，通西域；出使夜郎，开发“西南夷”，从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统一的思想文化。

秦代的梳篦，仅见于中原和西南地区。汉代的梳篦，广泛见于东、南、西、北及中原各地，尤以西南、东南和西北地区的发现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梳篦，主要发现于东南、南方、北方、西北等地，又以江苏南京、江西南昌和新疆尉犁、民丰、洛浦等地的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的梳篦，材料有木、骨、角、象牙、玳瑁、铜、铅、银等多种质地，其中木质梳篦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

秦代的梳篦，属于清一色的马蹄形。两汉的梳篦，以马蹄形占大宗，仅有少量的长方形、扁方形、六边形，以及联背形和不规则形。魏晋以后的梳篦，大都属于弧背，除了马蹄形之外，还出现了箕形。马蹄形梳篦，可谓这一阶段的主流样式。这种形制的梳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布范围亦不断地扩大，秦时主要集中于中原和西南地区，西汉开始遍及中原、东南、西南、南方、北方地区，东汉以后又扩展到西北的甘青和新疆，进而覆盖了全国各

地。随着不同地域之间差异的逐渐缩小，中国梳篦发展史上迎来了大同的时代。

秦始皇对全国的统一，标志着地方割据时代的结束，从此统一的格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以王朝为尺度，秦朝可以被看作一个时间段落。但从主流梳篦演变的角度而言，自战国中晚期开始，彼时的马蹄形梳篦已占据了西南、东南、中原等大半疆域，这种内在的一致性是前所未有的，为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马蹄形梳篦，主要因袭了战国时期的传统造型；魏晋时期的箕形梳篦，则是在马蹄形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这一时期的梳篦，既拘泥于旧法，又力图创新，处于潜移默化的发展时期。不过，在那微波荡漾的表层之下，已经涌动着变化的暗流。

秦汉之际，人们十分注重装束，梳妆用栉已成惯例。晋代伊始，妇女插梳之习开始兴起〔图 202〕。这一阶段的梳篦，通常是成组配套使用的，有的一套为两件，即一梳一篦；有的一套为三件，即一梳二篦或二梳一篦，这些梳篦大都盛于专门为其量身定做的梳妆奁、梳篦盒以及栉袋之中。秦代流行圆形单层漆奁，汉代既



[图202]插梳女俑—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

有圆形单层漆奁，又有圆形双层漆奁，还有长方形的漆木奁；汉魏时期，西北的新疆地区还出现了一种用毛毡或锦绸作成的栉袋。各种化妆品、香料、刷、笄、铜镜、镊、削刀、眉笔，也是梳妆奁中的常见之物。可见，当时的梳妆用具已经相当齐备了。

奢华的时代

这一阶段从581年隋建国开始，至1279年南宋灭亡为止，包括隋、唐、五代、北宋和南宋五个时期，大体经历了近700年。

隋朝的统一，开启了隋、唐复兴之盛运。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政治制度日益完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社会生活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壮观景象。两宋时期，虽然始终未能统一，但社会的风尚大体因袭了旧制，一切文化生活朝向世俗化的方向普及与深入。

隋唐时期的梳篦，主要发现于中原、东南、西南、北方、西北地区，尤以陕西西安和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出土数量较多。两宋时期的梳篦，主要发现于中原、东方、东南、西南和南方地区，以江苏无锡、武进一带的出土数量较多。这一阶段梳篦的材料有木竹、兽骨、牛角、象牙、鱼骨、玉、水晶、滑石、玛瑙、琉璃、琥珀、金、银、铜等，种类之丰富，可谓空前绝后。

隋唐时期，弧背的箕形梳篦十分流行，平背的梳篦已很少见了。唐代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弧背的半圆形梳篦。五代伊始，半圆形的梳篦发展势头迅猛，很快便取代了箕形梳篦。到了两宋时期，传统的箕形已经走到了尽头，半圆形的梳篦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又涌现出椭圆形、抹角长方形等造型新颖的梳篦。

箕形梳篦，在造型上虽然继承了马蹄形梳篦的衣钵，但在形制上却明显地朝横长的方向发展。半圆形梳篦，宽度显著加大，器体更加扁平，属于名副其实的横长形态了。当然，箕形梳篦和半圆形梳篦的差别，不仅在于整体的形状上，更在于齿根的形态上。前者的齿根平齐，梳齿的长度相等；后者的齿根弧曲，梳齿的长度由中央向两侧依序递减。这种变化，反映了梳篦加工技术的进步。

自隋朝以来，梳篦往往被用作妇女的首饰，女性头上插栉，业已成为一

种社会的风尚。隋唐时期，插栉主要是贵族妇女时兴的装束。到了两宋时期，无论都市妇女，还是乡村的妇女，皆时兴戴冠插梳的装束。唐、五代时期，流行插小梳，插多梳，前额的上方、一侧和两鬓及后脑皆可插之〔图 203〕。两宋时期，流行插大梳，通常在后脑插一把大梳〔图 204〕。当时插戴于发髻上的还有金、银、珠、玉、角等做成的各种簪、钗、步摇等，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审美情趣。



[图203]插小梳瓷俑—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

由于妇女头上插饰之习盛行，以至于社会奢靡之风横行，中国梳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奢华的时代。为了限制这种奢侈的趋势，朝廷不得不颁布禁侈令。史载唐文宗在太和二年〔828 年〕曾专门对公主宣旨道："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过，从敦煌高窟第 61 窟曹氏家族供养人和榆林窟壁画的供养人头上的插栉多达六件来看，五代时期"广插钗梳"的风潮，似乎有增无减。北宋时期，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相仿之，梳子的长度有的逾尺，甚至影响乘轿和走路。皇祐年间，宋仁宗曾下诏规定："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但仁宗以后，奢靡之风又盛，将白角改作鱼魦，又易作

象牙、玳瑁。《古今事物考》谓，象牙：南番者长大，广西安南者短小，新锯开粉红者最佳。云南麓川出，作梳子，直者好，横者易断。玳瑁：南番山海中大龟背文为玳瑁，有黄多黑少者，有黄黑相半者。其黄好密。黑如漆，最佳。至于鱼魦，相传南番大海中有鹤鱼，顶中红如血，可作带，曰鹤顶红。若以其鱼魦作梳，则号鹤顶梳。可知，象牙、玳瑁、鱼魦，皆为珍贵的材料。北宋晚期，又盛行“太妃冠”，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或以珠玑缀之。各地宋墓出土的金背木梳，或木梳背包金、银者，应为这种俗尚影响的真实写照。尽管从北宋的太宗到南宋的宁宗，都颁布过奢侈禁止令，但有宋一代，侈靡之风终未能禁。这一阶段中国古代梳篦的发展，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奢华的时代。



[图204]插大梳瓷俑—江西景德镇宋墓出土

敦厚的时代

这一阶段包括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从907年辽建国，到1911年清朝灭亡，大体经历了1000余年。

契丹、女真两族，先后割据东北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而蒙古又进入关内并横扫了欧亚大陆，最后满洲颠覆明室，形成一个部族狭义的政权，



[图205]清描金带彩黄杨什锦梳具—北京故宫藏

绵延了 240 余年之久。北方民族的不断兴起，改变了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为人们的世态风情和生活习俗带来了新的特色，加强了各民族的融合。

辽金时期的梳篦，主要发现于北方及东北地区，以河北宣化和北京郊区等地出土的数量较多。元代的梳篦，多见于中原、北方、东方和东南地区，以河北石家庄等地出土的数量较多。明代的梳篦，主要发现于东方、东南、西南和南方地带，以南京和上海一带的出土数量较多。这一阶段梳篦的材料，主要有木、竹、骨、角、象牙、金、银、玳瑁等，清代后期还出现了用化学材料制作的梳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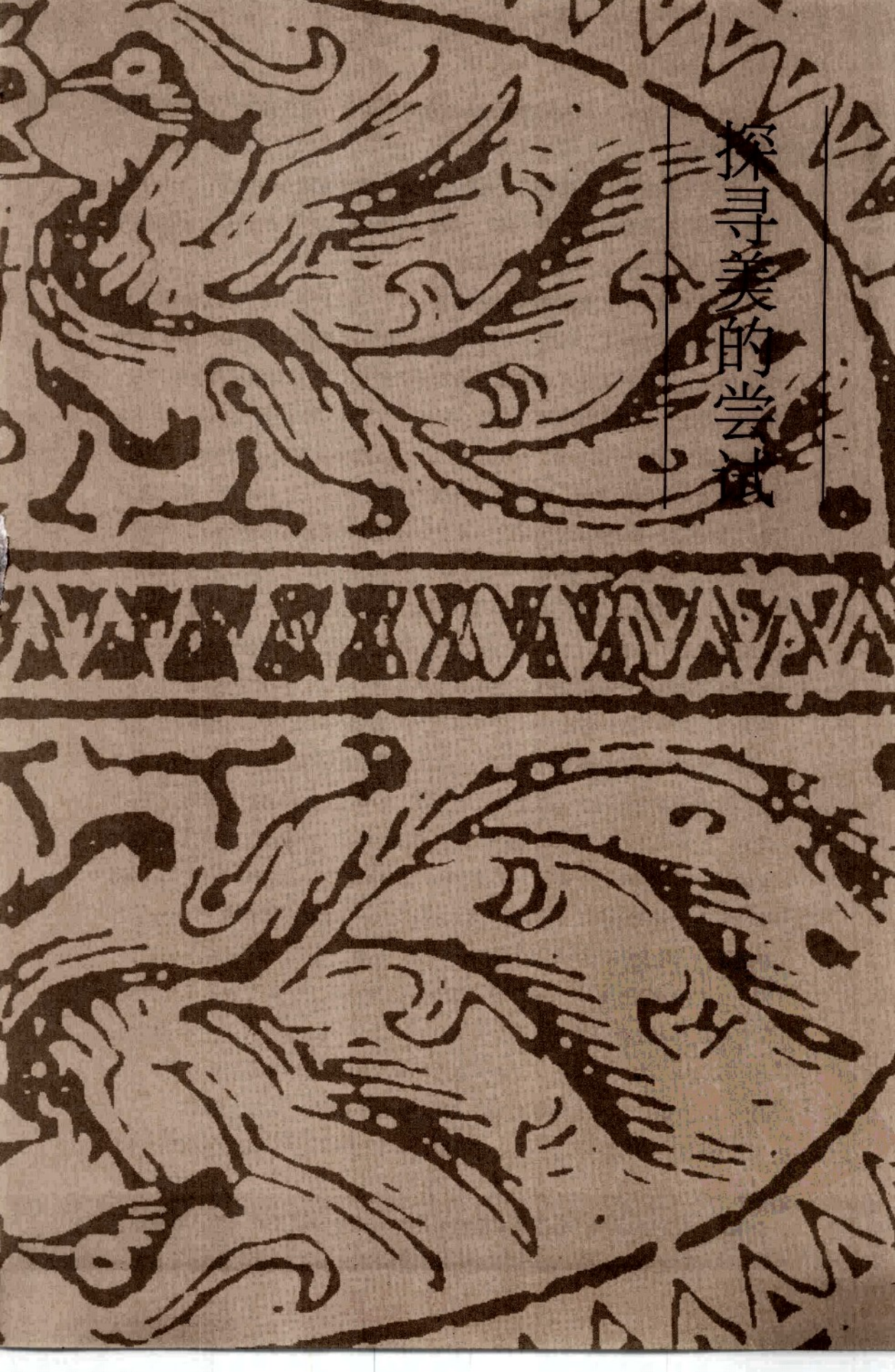
辽金元时期，弧背的半圆形梳篦最为盛行。明清时期，弧背的弓形梳篦异军突起，开始与弧背的半圆形梳篦平分秋色。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弧背拱形、弧背鱼鳍形、平背扁方形，以及葫芦形等形状不甚规则的梳篦〔图 205〕。

五代以降，横长的弧背造型，成为时尚梳篦的主流。辽金时期，弧背的半圆形梳篦，有宽背和窄背之别，其中宽背式半圆形梳篦，梳背与梳齿间的界限往往不甚分明，齿根部参差不齐，既不同于箅形平行等长的形态，又区别于窄背式半圆形依序递减的形态，在造型上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进入元代，弧背的半圆形梳篦，无论宽背式，还是窄背式，梳背与梳齿间的界限均已相当分明，梳齿的长度皆由中央向两侧依序递减。明清时期，弧背的半圆形梳篦，背部大都较宽，形体更加规整，有的还在一侧加上把手，而平背的扁方形梳

篦，以厚重的圆柱状梳背取代扁薄的长条状梳背，更加利于手握。这一阶段的梳篦，既有继承、又有舍弃、还有创新，体现了一种敦厚的时代风格。

从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的花罗栉袋、江苏苏州元墓出土的银镜架等实物资料来看，当时人们对于梳发、理容十分重视，辽代壁画中的“梳妆侍奉”、明《千秋绝艳图》、清《月曼清游图》等绘画资料也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由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提倡节约，并保持了纯朴的旧风，衣冠服饰比较拘谨和保守，给人以质朴、简洁和自然之感。元代伊始，插梳之习渐趋式微，到了明代，更是日薄西山了。




探寻美的尝试

本书是笔者关于人体饰物研究的首部系列论著，也是探索人们审美情趣的一次尝试。

我并不是专攻人体饰物的，之所以选择以古代梳篦作为论题，是由于从考察史前时期玉器的过程中得到了启发的缘故，而从事史前时期玉器的研究则完全囿于研究生指导教授的“逼迫”。

1988 年 9 月，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第 6 年，早已习惯了安逸生活的我，鬼使神差地再一次跨入了母校——吉林大学的校门，开始了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紧张生活。导师就是张忠培先生，当时他已经担任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还担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起初，对于我硕士论文的方向，他一直没有明说。1989 年的春天，当我正式提出准备搜集良渚文化的资料，并试图研究良渚文化问题之际，他只是淡淡地说：“你先交来一篇东西，我看看再说。”利用这一年的暑假，我完成了关于良渚文化分期研究的初稿〔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后来以《论良渚文化的分期》为题，发表于《东南文化》1991 年第 6 期上〕，原本以为自己的主张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但看罢了我的作业，张先生沉思了半晌后才说：“你论文的方向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玉器研究，要以陶器的分期研究作为玉器研究的基础……，今后希望你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从事玉器的研究工作。”听了他的一席话，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一般。那时自己的情趣是陶瓷器，况且关于陶器的研究已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于玉器所知甚少，能否完成他所要求的硕士论文，简直一点儿底气也没有。可是先生的脾气众所周知，一旦他决定的事，如同板上钉钉，若要改变的话，真可谓难于上青天。于是，我默默地转向了先生指定的目标。1990 年的夏天，当我修满了 44 学分〔学校规定：硕士课程只须完成 35 学分〕且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被获准提前一年毕业之时，由于“六 · 四”的原因，张先生的故宫院长职务已被停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关于我的工作去向，他仍挂在心上，还是主张我到故宫来工作。为了不给落难的先生增添麻烦，当时我选择了去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即现在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尽管当时工作的内容与玉器毫无关联，可是先生的嘱托一直未敢忘记。

2000 年 4 月，在张忠培先生的一再提议下，我被调入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一边协助先生的工作，一边从事自己的研究。同年的 5 月，夫君乔梁到浙江省出差，带回来了浙江海盐周家浜遗址出土一件象牙梳子的信息。看到这件

象牙梳子背上所镶嵌的冠状玉饰，我眼前一亮。10 年前在考察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时，我就注意到这种玉饰，从其形制特征和出土位置方面考虑，似乎应当属于人体上的一种饰物，奈何人骨不存无从考证。这件玉背饰象牙梳子的发现与研究，不仅将解决一直悬而未决的“冠状饰”的定名问题，对于认识良渚文化玉器的功能也应是很有裨益的。于是，我很快地整理出良渚文化冠状饰的资料，同时参照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还对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兔饰”、红山文化的“三孔器”等相关玉器的形制特征、使用方法进行了探讨。当我写出了《良渚文化玉质梳背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这篇小文〔后来刊于《文物》2002 年第 11 期上〕，并将视野由史前时期玉石梳子转向先秦时期木、竹、骨、铜等各种不同质料的梳子时，意想不到的是，各地区各种不同质地的梳子，在用途上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况且从史前时期到西周时期，一些梳子的造型竟然是一脉相承的。从此，首服、首饰等有关人体饰物的课题便开始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之中。

2001 年 10 月，我应邀赴香港作了题为“中国古代梳子的发展历程——以先秦时期为中心”的讲演报告。2003 年 3 月，我又以《中国梳篦六千年》为题，申请了故宫博物院的科研课题，计划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四、五篇系列论文，试图通过对各时期不同地区梳篦形制与结构的研究，进而探索我国古代梳篦的发展过程。

2004 年底，因身体不适，我没能参加一年一度照例举行的研究室年终总结会，只是提交了总结报告。总结会上主管研究室的李文儒副院长在审阅总结报告时，了解到我的研究现状，给予了很大的鼓励。2005 年 3 月，我参加了由李院长主持的紫禁城出版社作者座谈会，在李院长的热情启发下，萌生了将原来的系列论文串联撰写成书稿的想法。

2005 年的夏天，我已按原定计划写完了大部分内容，可是仔细思量，总感觉原有的框架结构过于呆板，无法跳出考古学论文的巢臼。当时还在台湾讲学的张忠培先生得知此事后，多次告警我：要深思熟虑，不要急欲求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在张忠培、徐启宪两位先生的勉力下，我毅然推翻了原来的设想，开始重新构思，决定化呆板为灵活，抓住“种类”、“造型”、“装饰”、“用途”这几个层次和侧面，既揭示出上下数千年梳篦自身的演变轨迹，又反映出纵横数万里不同人群的审美情趣，作一次探寻美的尝试。不

过，本书稿从创意到交付出版，不足一年的时光。由于琐事缠身，撰写的时间比较仓促，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必须郑重说明的是，除了上面提及的各位先生以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和梁中合、故宫博物院李季、上海复旦大学高蒙河、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宋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曹玮、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张玉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德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樊昌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和刘斌、贵州省博物馆梁太鹤、科学出版社宋小军等诸多位先生无私的帮助。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谢忱！另外，笔者搜集的梳篦图片，大部分是夫君乔梁在晚上使用家用电脑录入的。正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眼睛开始花了。对此，我一直深怀歉意。此书的出版，无疑有他的一份贡献。

杨　晶

2006 年 3 月

主要参考文献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年书馆 1994 年。

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

周讯、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南天书局（台北）1988 年。

赵超：《华夏衣冠五千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 年。

《中国历代妇女形象服饰》，中国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编辑，2001 年。

《中国历代侍女画集》，天津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1998 年。

《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湖北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辑，1994 年。

滕壬生编著：《楚漆器研究》，两木出版社（香港）1991 年。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General Information]
淘宝助手、yaowohaobaobei荣誉制作
QQ: 1583929799
旺旺：yaowohaobaobei
淘宝书不缺网：http://shubuque.taobao.com
您身边的电子书专家

简介：

千万本电子图书任你选，您只需提供书名、作者、出版日期 即可：

电子图书选购网站（校内网用户）：

超星： http://www.ssreader.com/

中美百万： http://www.cadal.net/

国家图书馆：http://res4.nlc.gov.cn/home/index.trs?channelid=19

以上资源库，只要能搜到的书，均可PDF格式提供

指针：http://www.zhizhen.com/

读秀：http://www.duxiu.com/

书生：http://www.souba.org/sou/

圣才：http://library.100xuexi.com/video/

以上网站中所有有试读页的图书均可PDF格式提供！

如果您在校外网，以上部分资源库登陆不了，请登陆：

指针：http://www.zhizhen.com/

读秀：http://www.szdnet.org.cn/

这两个网站是面向全部网络用户的开放的

欢迎广大书友对本人制作书籍提供宝贝意见

联系QQ：1583929799；旺旺：yaowohaobaobei；

网址:http://shubuque.taobao.com；

博客：http://blog.163.com/hhxytyxyt@126/blog

封面
版权
序&张忠培
美从头上起步
扑朔迷离的名称
历代典籍的定名
出土文献的称谓
本文拟定的名称
形形色色的种类
古朴端庄的骨牙角类
轻巧秀雅的木竹类
温润光泽的玉石类
灼灼生辉的金属类
各式各样的造型
引领风骚的长方形
绵延不绝的扁方形
独树一帜的鱼尾形
别具一格的六边形
流光异彩的亚字形
蔚为大观的马蹄形
洋洋洒洒的箕形
欣欣向荣的半圆形
后起之秀的弓形
气象万千的联背形
多姿多彩的装饰
细致入微的琢刻
神工鬼斧的镂雕
妙笔生花的彩绘
巧夺天工的模压
匠心独运的镶嵌
五光十色的盛具
纷至沓来的用途
以栉为冠
以栉为饰
以栉为具
以栉为喻
源远流长的历程
浑朴的时代
斑斓的时代
大同的时代
奢华的时代
敦厚的时代
探寻美的尝试
主要参考文献